

K250.3

1  
2:8

# 文化史料

丛刊

第八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

B 365162



K250.3

1  
2:8

# 文化史料

丛刊

第八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

B 365162



## 目 录

- 田汉同志所走过的道路 ..... 阳翰笙 (1)
- 田老轶事三则 ..... 陈白尘 (14)
- 纪念田汉同志八十五诞辰
- 田汉与越剧 ..... 袁雪芬 (24)
- 中国舞台协会演出始末 (续) ..... 马彦祥 (28)
- 为纪念田汉同志逝世十五周年作
- 萨本栋与厦门大学 ..... 蔡启瑞、黄厚哲 (45)
- 陈璧玉、陈孔立
- 回忆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萨本栋 ..... 张存浩 (52)
- 关于萨本栋二三事 ..... 萨师楹 (57)
- 魂系中华 骨归故土 ..... 厦门大学在榕部分校友供稿 (60)
- 林 泽 芬 执 笔
- 忆我们的萨校长
- 罗隆基回忆录 ..... 罗隆基 (73)
- 我在天津《益世报》时期的风风雨雨
- 我的创作道路 ..... 草 明 (94)
- 我和萧三 ..... 叶 华 (107)
- 求师学画纪实 ..... 安教礼 (121)
- 徐悲鸿先生怎样教我们学习绘画

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终生的罗静予同志……黎莉莉 (167)

为发展中国体育事业奋斗六十三年

——记全国政协委员徐英超教授

…… 臧叔 刘明哲 王瑞琰 (186)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 ……………朱蔚伯 (204)

回忆韬奋同志对我的教育……………凌其翰 (225)

胡愈之同志早年活动的片断回忆 ……………朱光潜 (231)

关于杨荫榆之死 ……………廖辅叔 (234)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童公学 ……………叶弥诚 (236)

我的舞台生活 (七) ……………袁世海 (246)

——艰难岁月

---

# 田汉同志所走过的道路

阳翰笙

田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来，我们的党和国家经历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坚韧不拔地追求实现壮丽的理想，也反反复复地进行深沉的历史回顾。时间的流逝能淘洗历史，能揭示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能显露历史人物的真实价值；更重要的是，通过已经革命实践的再认识，使我们坚定地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在举国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想起田汉同志，想起他这样一位中华民族的忠诚儿子，无产阶级杰出的文化战士。

—

在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田汉同志始终和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方向保持一致，始终以他的笔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服务。

早在二十年代初，田汉同志已是一位热情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戏剧家，他挚爱祖国，同情苦难的民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从日本留学回国，本来可以从事待遇优厚的工作，他却宁可身无分文而致力于戏剧运动。自己编印刊物，自己筹划演出，睡地铺，吃大锅饭，以百折不回的毅力，从事筚路蓝缕的开创工

作。他以炽热的事业精神吸引了一批艺术家和有为青年，在艰难困苦之中建立了南国社和南国艺术学院，开展了南国艺术运动，给当时文坛以很大的推动，影响遍及南中国。他创作的《咖啡店之夜》、《获虎之夜》等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也带着淡淡的哀愁和感伤。当时他还不曾接受马克思主义，不能了解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的途径，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夸大早期田汉创作中的感伤成分，因为对黑暗势力的反抗是这些作品的主流，青年田汉的抗争是坚决的、不屈不挠的；他作品中的感伤，也是含有对封建势力的控诉意义的，他的这些作品之所以对那个时代的青年们产生共鸣，受到冲击和鼓舞，并不是偶然的。不久，他又创作了《午饭之前》、《火之跳舞》和《名优之死》等名作，创作方法上的主要倾向是现实主义，它反映了阶级矛盾，揭露了旧制度的黑暗，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所突破。到1929年，田汉写出了《一致》，这一象征性的剧本，喊出了“一切被压迫的人们，都摆脱你们的枷锁站起来，认识你们自己的力量！”剧本在艺术上有若干不成熟之处，却反映了田汉的创作思想随着革命形势发展而产生的升华；剧本象征着旧世界的溃灭，呼唤着光明的社会来临，充满了昂扬的斗争精神和必胜的信念。田汉同志在1930年的转向，是一个突变；但这一突变不是截然发生、凭空而来的。田汉的思想转变，前后期有所不同，但也有他一贯的精神，有他积极的民主革命的思想基础。

我和田汉同志的相识是在1927年“鱼龙会”上，他热情豪放、光明真率的性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候，田汉同志还没有加入党，但我们党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一直把他看成自己的朋友，党组织一直关心、支持田汉同志领导的南国运动，

通过创造社、太阳社等文艺团体的同志作朋友式的探讨，也通过文艺评论，田汉同志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左翼剧联成立之前，南国社正在演出《卡门》、《沙乐美》等剧本，女主角俞珊很有艺术魅力，剧场效果很热烈，南国社的朋友们有点为此陶醉。1929年，组织上指派我负责联系戏剧方面的工作。我和赵铭彝同志商量，如何帮助这位卓有影响的艺术家走上正确的轨道。于是，左明、赵铭彝、郑君里、陈白尘等同志从南国社分出来组织摩登社，意在给田汉同志一个推动。我们的田汉同志清算、总结了南国社经历的道路，毅然在1930年以整本《南国》月刊的篇幅发表《我们的自己批判》，公开宣布向无产阶级转向，引起当时文坛很大的震动。不久，在田汉同志的迫切要求下，经过反复研究，由党的中央文委直接吸收他入党。这是一个质的转变。田汉同志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成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家。当然，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深度和广度还有一个过程。从此，田汉同志自觉地把自已的全部活动，无条件地服务于党的革命事业。从左翼剧联时期起，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始终都是坚定地遵循党所指引的道路前进，是我们党忠诚的文艺战士。

在党的领导下，在艺术剧社、南国社的带动下，革命的、进步的戏剧运动形成了戏剧史上第一个高潮。戏剧协社、辛酉剧社、摩登社、大夏剧社、复旦剧社等组织成立了“剧团联合会”，进而又成立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左翼戏剧的十多个剧团所演的剧本，有楼适夷、保罗、赵铭彝等写的剧本，有欧阳老（欧阳予倩）、洪深、丁西林等写的剧本和改编外国的剧本，而左翼戏剧的主要剧作家是田汉，他写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独幕剧。在

三十年代初期，他创作了《梅雨》、《年夜饭》、《乱钟》、《暴风雨中七个女性》、《一九三二年月光曲》、《回春之曲》等话剧剧本和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给左翼戏剧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这些剧本中，鲜明的革命主题、工人阶级的艺术形象、在无产阶级革命高度上的爱国主义激情，都表明田汉同志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高潮，作为党员作家的田汉同志，迸发了巨大的艺术创造力。

记得在1933年为东北义勇军公演，田汉同志主持的左翼剧联发动了三十多个剧团，在上海新世界游乐场里占领了一个剧场，连续演出了一个月。组织上考虑田汉同志的安全，派我通知他不要在公开场合下露面。他却坦然地说：“在群众中最安全！”每天晚上他都到后台去，在化装室的一角，利用当天新闻编写活报剧，当场演出，鼓动性极强，发挥了很好的战斗作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此非常忌恨，他们勾结起来派人到剧场寻衅闹事。当时有两位大力士查瑞龙和彭飞，受了田汉同志精神感召，不仅参加了演出，还分别把守前后台，自动保护田汉和剧团演员的安全。他们打得特务、暗探、流氓望风逃窜，使演出得以圆满结束。有人指出田汉同志不大讲究策略和效果，这一缺点确实是存在的；但事情的另一面，也反映出田汉同志不顾安危、英勇斗争的精神。这样的事迹是不胜枚举的，我们应当辩证地认识这一位生动具体的历史人物，独特的田汉性格。

同年六月，共产国际针对帝国主义集团——国际联盟策划的“李顿调查团”，组织了一个“国际反战调查团”，由英国进步人士马莱爵士和法共中央委员、著名作家伐扬·古久列率领来华。党中央把大部份接待任务交给“文委”。田汉同志巧妙地利



用几家电影公司老板的关系，在先施公司酒楼举行了包括各界进步人士三百余人的盛大欢迎会。在会上，田汉同志慷慨陈辞，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暴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政策。马莱爵士和伐扬·古久列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应伐扬·古久列同志他们的要求，文委接待委员会和田汉同志经过巧妙安排，摆脱了英国巡捕房暗探和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把他们送到杨树浦工人区和工人们见面；又通过陶行知先生的关系，田汉同志他们又安排二位使者在上海郊区大场和成千农民会见。这次欢迎会和会见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党组织表扬了这次接待工作，同时也评价了田汉同志的贡献。

在三十年代初期，田汉同志利用他所联系的各方面人士的关系为党争夺电影阵地。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通过田汉同志，动员明星、联华两家电影公司的导演、演员和其它从业人员三百余人，在上海徐家汇一间低矮的摄影棚里举行秘密集会，派人做关于当时革命形势和苏维埃红军取得伟大胜利的报告。这是我们共同工作取得的胜利。当夏衍、阿英、郑伯奇等同志在明星公司建立阵地后，我们利用资本家的力量筹组艺华公司。就这样，我们党和许多进步人士掌握了“明星”、“联华”、“艺华”三家影片公司的编导权，拍摄了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映广大人民疾苦影片，有力地抵制了美国的黄色电影和国内资本家的商业化电影，伸张了正气，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田汉同志写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民族生存》、《风云儿女》等电影剧本，他所写的电影主题歌如《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象狂飙一样传遍全国，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这里还要提到的是田汉同志在各个历史时期写下了大量诗

作，据有关方面估计约近一千数百首之多。他以深厚的功力和卓越的才情，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艰苦奋斗的历程，抒发了无产阶级积极有为的豪情。可惜历经动乱，相当一部分诗作散失了。

在抗日战争中，田汉同志在郭沫若主持的第三厅工作。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他组织抗敌演剧队，在各个战区前线 and 后方进行了宣传鼓动工作；在桂林，田汉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团结戏剧界举办了“西南剧展”。这些活动都成为现代戏剧史上的光辉篇章，田汉同志为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战时期，田汉同志创作了《江汉渔歌》、《新雁门关》、《岳飞》等大量戏曲剧本，写了《秋声赋》等话剧剧本，其中《江汉渔歌》反映了全民抗战的主题，曾在大后方广泛演出，有力地配合了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战胜利后，他写了著名的剧本《丽人行》，反映美蒋反动派夺取了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有力地起到动员人民进行民主斗争的作用。那时，田汉同志正准备到解放区去，由我主持将《丽人行》拍成电影，扩大这一剧本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同志在领导戏曲改进局、艺术局、戏剧家协会等部门工作时，积极倡导戏曲改革，使我国戏曲事业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同时，他坚持写作、改编了《白蛇传》、《西厢记》、《谢瑶环》等优秀戏曲剧本。在话剧方面，创作了《关汉卿》、《文成公主》等名篇。其中《关汉卿》以它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成功地塑造了关汉卿艺术形象，成为田汉同志话剧创作的最高峰，也是建国以来戏剧创作的瑰宝。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田汉同志始终艰苦奋斗，始终以他的艺术创作和文艺组织活动为党的总路线总方向服务；他时刻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在半个世纪的斗争中，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他性格豪放不羁，但要端大节始终是坚定明确的。从入党时起，他对党组织忠诚坦白，对同志推心置腹，表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品德。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田汉同志政治上很虚心，非常尊重党组织。他有时凭感情冲动办事，不大讲究影响效果。但他能正确对待同志的意见，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党组织的意见绝对尊重，并且坚决在行动上改正。我比他小四岁，赵铭彝同志是他的学生，保罗同志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后辈，但只要我们是代表党组织发表意见，他就虚心听取，认真付之实行，这是他的党性所在，也是他取得事业成就的保证。

## 二

田汉同志一生密切联系群众，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他搞五湖四海，广泛结交朋友，引导他们来为革命出力，这种群众化的作风是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从南国社起，田汉同志就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一块吃大锅饭、睡地铺，一块找剧场、布置演出。他习惯于生活在群众之中，以和群众在一起为最大的快乐。他能在闹哄哄的剧场写作。一边写，一边刻印，一边排演。我亲眼看到这种情景，很受感动，他可以在热闹场合静不下来的情况下写作。演员们有什么要求，他尽量满足，加人物、加台词，都能做到；专为演员写本子的事例更不少。别人有了困难，他就一片赤诚地帮助解决；别人经济发生恐慌，他有稿费就拿出来买米，有饭大家吃，没有了再设法筹划。南国艺术学院教课是没有报酬的，他不仅乐意为之，而且为学校筹款；到“南国”学院学习的学生出不起学费不算，还由田汉同志管生活费。人们喜爱田汉是有道理的，他就有那么

一种巨大的魅力。到了左翼剧联时期也是这样。大造剧社、五月花剧社、春秋剧社等等，田汉同志和他们处得水乳交融。所不同的是，除了一以贯之的事业精神以外，作为共产党员，田汉同志更注意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记得在第三厅工作时期，田汉同志已届中年，他还是坚持和年轻的演剧队员们一起参加军训，一起爬、滚、扑、打。昙华林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气氛，与田汉同志等领导干部身体力行有密切关系。抗战后期，田汉同志和湘剧宣传队一起巡回演出，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始终和大家同甘共苦，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田老请客”是当时流传的佳话，他确实不计较经济，不拘泥细节，又常常不带钱。在南岳时，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请客，邀田汉吃饭，说明来一桌人。到时候，田汉同志带了三厅各处的同志三十多人来赴宴。黄琪翔哈哈大笑，说“我事先就防了你这一手，准备的酒席恰好是三桌。”田汉同志即席赋诗一首，哈哈大笑不已。这种热情奔放，平易近人的作风曾被人称之为“田汉风”。

田汉同志和戏曲界的关系有必要讲一讲。早在二十年代，他和周信芳、高百岁就有密切的交往。他为周、高二位写本子，高百岁还点了香烛，正式拜田汉为师。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工作者往往不大看得起戏曲和戏曲艺人。而田汉同志则不然，他重视戏曲艺术，认为新歌剧要以旧歌剧为基础，一直致力戏曲改革；他尊重戏曲艺人，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的疾苦，成为戏曲艺人的知己。他来到一地，没有几天就和当地剧团交上了朋友，并耐心地引导他们走上进步的道路。除了川剧以外，许多戏曲界人士都是田汉同志介绍我认识的，高百岁、李紫贵、郑亦秋、金素秋，还有桂剧四大名旦等等。田汉同志是有名的大作家，但一点不摆架

子，来到一起就一块喝酒、谈天，为演员们作词、题字。他还会哼几句京剧《秦琼卖马》，拉上胡琴就唱。这种真诚相待的态度，赢得了戏曲界的尊敬。在他的组织和影响下，京剧、湘剧、楚剧、汉剧许多演出团体参加了救亡宣传。当时，龚啸岚、王若愚、沈云陔等同志做了不少抗日工作，在田汉同志影响下，朱双云等人还出来主持义演，支援前线。1939年，第三厅撤退到重庆，楚剧宣传队也跟到重庆。四川群众不大懂楚剧，楚剧宣传队经济陷于困难。后来，第三厅改组，我们没有钱支援他们，而国民党则加以利诱。这些楚剧艺人很有骨气，宁可饿饭也不愿意加入国民党，主要演员卖了头面养活大家。龚啸岚同志是我安排到第三厅工作的，后来又在文工会工作，就是让他们联系楚剧界群众。到了重庆另组文化工作委员会时，我们没有忘了楚剧演员们，当时由石凌鹤同志和他们联系。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戏曲艺人们和我们共过患难，做了不少工作，有的还作出了牺牲。田汉同志在团结戏曲界群众的功绩是不能埋没的。

接触广泛，搞五湖四海、三教九流，是田汉同志联系群众的一个特点。在他交往的人士中，有爱国将领、新老文人，有宗教界进步人士，有大力士、江湖术士等等，大都通过和田老的关系，为革命工作做了好事，有的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一个江湖术士叫叶大密，精于太极拳术，能用气功治病。于伶同志患胆囊蛔虫病，十分痛苦。叶大密能在三十分钟内使他止痛，再到医院就医。艺华影片公司的老板严春棠原来是烟土贩子，后来转搞事业。严春棠拜叶大密为师，学习拳术。叶大密介绍田汉去作艺华公司的总顾问，我作编剧主任，廖沫沙同志也去了。后来艺华公司被反共分子捣毁。严春棠还来找我们商议拍摄影片《逃

亡》，也是通过叶大密接的头

田汉同志结交三教九流是有原则的，即是通过工作，为革命事业争取有利因素，这是一种远大的事业目光。周恩来同志曾在文艺界领导干部的会议上说过：“田汉同志在社会上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无不交往。他关心老艺人，善于团结老艺人，使他们接近党，为党工作，这是他的一个长处。这一点，你们在座所有的人都不如他。”田汉同志紧密联系群众，不断从群众中吸取力量，这是他永葆革命青春的重要原因，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 三

在我国文艺运动的长期实践中，田汉同志十分重视艺术教育 work，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他巨眼识人，善于发现人才，热诚扶助人才，充分发挥杰出人才的作用，其影响不可估量。

早在南国运动时期，田汉同志就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批有志青年，大家勇于实践，锐意创新。南国艺术学院时期更是以培养人才为目标，严格区别于那种商业性办学。在经济条件艰难，政治环境险恶的情况下，田汉不取报酬，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为文艺事业建造队伍。南国艺术学院的物质条件是十分简陋的，但它造就了像郑君里、陈凝秋、左明、保罗、陈白尘、万籟天、金焰、吴作人、赵铭彝、顾梦鹤、廖沫沙、张谔、陈明中等一大批骨干力量。这里列举的是不完全的，顺序也没有讲究，只是证明人才之多而已。在左翼剧联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他都注意造成队伍、训练骨干，象抗敌演剧队、歌剧训练班、四

维剧校等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建立新型的戏校、培训演员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为戏剧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田汉同志培育的人才是难以数计的。

我们的田汉同志善于发现人才，主要不在于他独具慧眼，而在于他无私的事业精神。他为发现杰出人才的秉赋、才干而由衷地高兴，他为有志青年的理想、抱负而操心，他象慈父一般地尽力帮助有才干的人摆脱困境、发挥力量。这是一种高尚的境界，是一种远大的目光。我长期从事文艺运动的组织工作，十分敬佩他这种伟大的品格。

大家都知道田汉怎样发现和帮助了陈凝秋、郑君里，而当年的普通学生金德麟（即金焰），后来又怎样成了电影皇帝。关于青年学者戴不凡由于批评田汉的作品而受到重用，成为文化界的佳话。我这里想集中谈谈田汉与一批青年音乐家的关系，以见他对待人才态度的一斑。

黎锦晖是田汉的朋友，有所往来，常请他到明月歌舞团去玩。聂耳当时在团里拉小提琴，没有可能发挥才干。田汉和他谈过几句，回来对我说，是个人才，可惜了，要想法把他拉出来发挥作用。他又把聂耳介绍给我，要我帮助他提高认识。我经常到聂耳那里去，帮他分析社会现象，认识革命形势。聂耳基本功扎实，努力学习，自律很严，他需要解决个合适的职业。我找了电影皇帝金焰，让他在电影公司老板黎民伟面前说说话，请蔡楚生、史东山二位也帮助说情，使聂耳进了联华电影公司，终于有可能发挥作用了。后来，聂耳谱《开矿歌》、《毕业歌》、《大路歌》、《扬子江暴风雨》，还有传遍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一代天才很年轻就去世了，但他终于闪耀了光辉，传达了三十年代

中国的时代精神，这与田汉同志的发现人才是分不开的。

任光从法国回来，在百代唱片公司制片部工作，很仰慕田汉的精神风采。田汉同志也认为他有才，介绍我认识他。任光、程步高、唐槐秋邀田汉小宴，拉我作陪，他们是法国作风，一边吃三明治，喝啤酒、白兰地，一边纵声谈笑。我不会喝酒，在旁边陪着，静静地观察他们。任光出国前有一女友十分爱他，她是杭州的小学教师。任光归国后，便找来了，住在前后间不同居。她发现和任光生活很不协调，她是一板三眼，严谨惯了的；而任光是喝酒唱歌，嘻嘻哈哈，豪放不羁。当时双方情绪很痛苦。我们帮助作了工作，大家理智地处理关系，那位杭州小姐返回浙江，没有酿成恋爱悲剧，保护住一个人才。通过任光的关系，许多进步歌曲灌了唱片，如《毕业歌》、《渔光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五六十种，销遍了南洋，传到了全世界，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后来任光到了武汉，安排在第三厅工作。接着转到新四军工作，表现很好，在皖南事变突围时牺牲了。

冼星海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找到田老，在第三厅安排了工作，作了许多救亡歌曲。他性格内向，不多说话，为人诚实、刻苦，和田汉和我关系都很好。后来去了延安，不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谱曲工作。

张曙是田汉同志的学生，从南国社以来一直追随着他。田汉发现他可以造就，就把他介绍给我。田老大就是这样，认为我在组织工作上干的时间较长，每当他发现了人才就来告诉我，让我帮助观察、培养，这主要是对组织的信任，发现、培养人才主要是他的功劳，他作了不少工作。





## 田老轶事三则

——纪念田汉同志八十五诞辰

陈白尘

今年是田老八十五诞辰，我记得清楚。因为庆祝他三十初度和五十大庆的情景犹恍若目前。但据说今年也是他逝世十五周年，我可茫然了。据推测，真正知道他的忌辰者，只有那些刽子手们，但谁见过他们出来作证？而且连他们自己也混进人群之中，不知（？）去向了。其次，传闻当时连田老的骨灰都无人认领，则其年月日时谁又说得清？这忌辰还是莫提起的好。因此我只想纪念他的诞辰。

纪念，总要评功摆好才是。但这也难，追悼会开过了，可算盖棺论定了吧？不然，还有人嘁嘁喳喳：“戏剧史家”认为话剧运动奠基人不应该姓田；“规格专家”则认为遗像的照片太大，而且不该刊登在报纸第一版上，“理财专家”又说追悼会太浪费了，（其实仅及他学生郑君里同志追悼会费用的四分之一。）而且花圈过多，参加的人也太多等等，等等。自然，也有另一面，敢于研究、回忆田老的文章多起来了，确实也产生不少好文章，是好现象。可是其中借机兜售私货者有之，当年曾对田老文攻“武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今日又以田汉研究专家自居者亦有

之，这是近年来新起的一种恶习，人们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但我还是羞与为伍的。因此之故，我在这里只好写下有关田老的几则轶事以代纪念。

1927年下半年，即大革命失败后，我转学到上海艺术大学来，就因为它的文学科主任是田老；后来筹建南国艺术学院，我还是读的文学科，因为文学科主任还是院长田老兼任。那时我的志愿是想写小说，我也曾以小说习作请田老改正，但他却偏让我去演戏！他说，“你可以演善良的人。”于是《咖啡店之一夜》也好，《父归》也好，电影《断笛余音》也好，都有我的角色。但可悲的是演的都是配角。这是因为善良的人在那时代都当不了主角呢，还是我的演技不行？我想是后者。因此在学院和南国社时代，我都是个跑龙套和打杂的，不曾有过献身戏剧事业的宏愿，更不用说当什么戏剧作者了。而田老对我们文学科以至戏剧科的学生也从没上过什么“编剧法”之类的课程。

可是后来不知怎么糊里糊涂地在写小说之余也写起戏来了；再后来连小说也忘了怎么写，而专事戏剧创作，这难道是因为我有什么“天才”之故？后来年事稍长，才悟出我演的那些配角，正是一门“戏剧入门”课，而参与《苏州夜话》和《江村小景》的两次演出，则应该说是我从田老学到的“编剧法”了。这大概就是“身教”的一种方式。

《苏州夜话》的创作，演出过程我是参加了的，已写过文章。但《江村小景》的创作和演出对我却具有更大的影响。

田老在《田汉戏曲集》第四集（1933年现代书局版）的《自序》里说到《江村小景》的创作时写道：

“第一次草稿是在1928年冬的某夜由善钟路到南市

普育堂的汽车里打成的，感谢陈征鸿、张惠灵、周存宪三君和唐叔明女士的聪明与热力，据说颇得当时兵士们的同感。——因为演的时候很晚，我已先同朋友们回家了。……在艺术大学的“鱼龙会”的戏剧周，这个取材当时战事的小戏，也有过相当的反响。……

据我的记忆，这出小戏的演出应是1927年秋冬之际，而不是1928年冬。因为“鱼龙会”戏剧周的举行是在1927年冬，而由善钟路出发云云，正是上海艺术大学的所在地，如果是1928年冬，则连在艺大之后创立的南国艺术学院都已停办了。这是田老的笔误。而从剧本思想内容说，它是《苏州夜话》的姊妹篇，同以反战为主题，正是《苏州夜话》中所说的“张大帅打李大帅”之类军阀混战中的一幕悲剧，是紧接着《苏州夜话》而创作的，也只能是1927年的作品。——这些都是题外话，不过附带一笔为田老订正一处笔误，以免戏剧史家去考证。

再说那“某夜”，田老把我们四人塞进一辆出租汽车以后，才说要去演戏。接着便把他的腹稿对我们讲了，并指定我演哥哥，张惠灵演弟弟，唐叔明演妹妹，周存宪则和《父归》一样串母亲。我们都很高兴。特别是我，因为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演了主角——或者说与张惠灵共同主演而特别兴奋。这时汽车已到普育堂门口，我们才问是到哪儿演戏。田老指着门口持枪士兵说：“就这儿！”我们都目瞪口呆了：到国民党的军队里演反战的戏？田老却哈哈大笑：“这不好玩儿么？”他又指着一位出来迎接我们的军官——不知是位团长还是旅长说：“不要紧，他是我从小朋友！”

于是我们向主人要服装，要道具，还要了步枪和手枪。然后

便由田老带去的油彩慢慢化装起来。自然，心里还在打鼓。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以战战兢兢的心情冲上了舞台。但一分钟以后，台下那黑鸦鸦的一片完全静下来，我们也才镇定自若地进入角色了。直到震耳的掌声大起，我们才苏醒过来。这时我们获得的已经不仅是“好玩儿”而已了，却是一种战斗结束后庄严的喜悦：我们进行了一次深入虎穴的演出！田老的这次身教所给我的就不仅仅是如何编剧，而是作为一个作家所应该具备的品质和勇气了。

这段轶事憋在我心里五十六年了。五十年代我写过一篇关于鱼龙会和南国艺术学院的文章，就故意撇开它，这不是为尊者讳，而是怕被某些以整人为业者所歪曲、利用，作为进阶之资。自然，更不用说“四害”横行的时代了！即使在1981年为田老《戏剧选》写序——《中国剧坛的骄傲》——时，我也许还心有余悸，没敢提及这个剧本。如果说在田老早期创作中存在着一根“渐趋明确的反抗”红线，则这红线不仅在1929年的《火的跳舞》到《一致》之间才“明确”起来，它应该上推到1927年秋冬之际有了腹稿并且演出过的《江村小景》。从这个戏的创作和演出中，我认识到当时的田老不仅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而且是勇于战斗善于战斗的猛士！

这就是我要写这段轶事的原因。

附带还要交代一件有关《江村小景》的“秘史”：1934年秋曾有它的一个仿制品或复制品出现，题名为《沈阳之夜》。它也曾在一个特殊场所演出过，并且也颇得那些观众的“同感”，鼓掌之余还大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仿制”或“复制”（或者称之为“剽窃”）者便是我。因为在这个场合里可以

关起门来喊“抗日”口号，我也就让他假戏真做，喊出自己的声音来。当时找不到田老的剧本，找到也不能公开，于是来个“偷梁换柱”，根据普育堂演出的记忆，把“张大帅打李大帅”改换成义勇军打伪满时代警察的兄弟相杀的悲剧。当然，这个伪满政权其实是意有所指的，明眼人当能领会。1935年回到上海以后，我首先写了篇《还乡杂记》，后来索性把这剧本改名《父子兄弟》，都发表在当年的《文学》上，并署了真姓名。其意不过在于自我暴露，出一口气。但结果很糟。国民党的文化特务王平陵拍案大骂：“这小子！把他干掉！”而神经过敏的革命家却又奔走相告：“他是个奸细！”真是左右做人难！“奸细”云云，后来慢慢平息，也就不了了之。抗战开始以后，与王平陵相见，也还“握手言欢”。但最遗憾的是，这剧本发表时，田老正在狱中，想写个后记加以说明而不便；后来抗战期中，又少谋面。解放以后，田老处境并不佳妙，更难启齿。而今田老逝世已十五周年了，将这桩公案自我交代，不过是负荆灵前：恕弟子“剽窃”之罪而已。

还有一桩轶事，也与国民党有关，至今还未见有人“揭发”过：即在1928年初，他曾编辑过《中央日报》的文艺副刊《摩登》。“摩登”是英语“现代”的音译，为田老所首先创用。他的学生们后来创办的剧社，取名为摩登社，正表明与它的关联。《中央日报》当时是在上海出版，后来才迁往南京，其总编辑彭学沛又是田老的朋友，所以重金礼聘他编个副刊。其时南国艺术学院正在筹办，田老两袖清风，筹建经费大半出自这笔“重金”——三百元大洋。所以我们学生是全都拥护他编辑这个纯文

学副刊的。或问：“国民党的这份党报是否反动？”当然反动。至于副刊《摩登》呢，它也“反动”过一次。

田老编这副刊的助手是左天锡君，并非我们同学，但也食住在我们学院里，是田老的同乡。副刊的来稿很多，田老每每也让我这个文学科学生代他看稿。有次，我读到一篇讽刺小说，不禁拍案叫绝。但我拿不定主意，便马上送给田老去复审。因为写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经过，虽然未用真姓名，但一读便知谁是谁。文笔很流畅，讽刺很入骨，可算得佳作！田老听了很高兴，说：“我来看！”这时，学院已经开学，他忙得很，把稿子抄起就走了。

田老三十华诞到了，学院师生设宴为他祝寿。自然也有为南国艺术学院的成立自我庆祝之意。那该是1928年的农历二月二十日的晚上，酒肴都已上桌，大家静候寿星到来，但田老却久久不至，他是个不大准时的人，起初也不以为异。可是时已八点，尚未归来，大家不免担心起来：是否法巡捕房又找麻烦？还是学棍周勤豪再次捣乱？这时，田老却悄然回来了，脚步沉重，神色沮丧，同他平时判若两人。我们都惊异地站了起来。他看一眼满桌的酒肴，便端起酒杯来叫道：“好，快来吧，干一杯！”酒过三巡，田老又酒酣耳热，笑语喧哗起来。接着又是：“恩袭（张曙），拉起胡琴来！”他唱的是：“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根据我的经验，田老一唱《四郎探母》，该是有心事了。

大概是当天深夜或第二天，田老才悄悄告诉我：讽刺蒋宋结婚的小说发了稿，也印出来了。但当天早晨彭学沛一起床便读报，读到这篇小说，直吓得魂不附体，立刻向全国发电报，扣留报纸，不许发行。当时蒋介石虽然通电下野，但肯定要卷土重来

的，彭学沛怎敢以脑袋当儿戏？在闯下这泼天大祸之后，彭学沛自然也顾不得老朋友的情面，《摩登》停刊，田老被解职了。我当时是学院的学生兼文书又兼会计，他不能不告诉我，那三百块大洋的来路断了！此后田老以典当维持学院，直到把田老母亲——可尊敬的田老太太的棉被都送进了当铺！南国艺术学院后来虽然还到杭州西湖搞过一次轰轰烈烈的“西征公演”，但终于停办了。从经济上说，《摩登》事件是个重大原因。

这桩公案能记得更清楚的，应是左天锡兄，但他下落不明。吴作人、刘汝醴、陈明中、赵铭彝诸兄都应是当年寿筵参加者，不知尚有记忆否？田老的老朋友参加诞筵的，只有陈子展老先生还健在，不知他还能回忆起这一旧事不？我希望获得他们的订正和补充。

至于这篇讽刺小说的题目和作者，很抱歉，我实在无从回忆了。但1928年田老寿筵之辰，应是公历三月十二日，当天或前一天的《中央日报》虽然追回销毁了，但在上海可能还有漏网之鱼，因为报纸到了报贩手里，是追回不了的。希望在上海的文学史家和文史工作者留意采访，它虽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事，却不失为一段有趣的插曲，远在1928年，这个独夫民贼就被中国作家勾画出他的鬼脸来了！

第三件轶事，也还是和国民党有关。那就是1929年南国第二次到南京举行“南征公演”中发生的，即由于《孙中山之死》禁演而引起的一场大争论。

田老对这一事件在1930年写的《我们的自己批判》里只说了一句“我们为着批判‘奉安大典’而写的《孙中山之死》也似乎稍



觉过时了，虽然后来禁止上演。”便轻轻带过。1929年演出近尾声时他有过一次讲话，即刊于《南国周刊》第一期上的《南国社的事业及其政治态度》一文里，也只提及这次争论，而没有正面叙述。所谓大争论的实况究竟如何呢？这次“南征”我是躬与其役的，但事隔五十四年，现在提笔，也很难写得清楚了。

南国社此次到南京，住在秦淮河畔的半边街民众教育馆里。演戏的剧场就是它的礼堂。我们全体人马，包括田老在内都是在一间大厅里打地铺。此时给我印象最深、也最恶劣的一个人，便是王平陵。他那时每天一早，我们女演员尚未起身，便赶了来问寒问暖，对田老毕恭毕敬像是很尊重；晚间散戏以后，他还赖着不走，看这看那，到处乱钻。此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文化特务，毫不足怪。《孙中山之死》是个什么样的戏，他早嗅得清楚，向主子报告了，所以不等剧本送去首都公安局，它早已内定禁演，所谓大争论已是禁演以后的事了。

南国社两次到南京公演，对国民党来说，不是件小事。当时文网未密，连国民党的报纸对南国的演出也赞扬备至，而且还引起晓庄师范的演戏热潮，这势头对国民党很不利，所以西山会议派的头子戴季陶极为重视。一切反动统治者对任何人民起义都是剿抚兼施，即镇压与招抚、羁縻并重的，对于文化上的异己者也莫不如此。戴季陶在禁演《孙中山之死》以后，特别大摆筵席招待南国社，自然是一种羁縻之策。记得那天是两只大画舫并排着，摆出四桌（或六桌？）上等筵席，辉煌的灯光照得秦淮河上一片通明。国民党除戴季陶以外，叶楚伦等等搞宣传的大员也出席作陪，王平陵自然也随侍在侧，成为席间小丑。“南国”自田老、洪老（深）以下，全体出席。

开头，戴季陶讲了些恭维的门面话，说他先前曾与春柳社及新舞台做过朋友，现在又与南国社交朋友了，等等。田老对此则答复以“请允许我们做你的诤友。”因为他说，“艺术同政治有时是朋友，有时是敌人。”这是导火线，接着便展开“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大辩论。对方以戴季陶为主将，叶楚傖等帮腔；我方自以田老为主帅，佐以能言善辩的洪老以及左明等。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当时还没有录音机，这场大辩论的实况可惜无从记录。但双方的主要论点是明确的。即戴季陶认为文艺应当服从政治。田老则说文艺应该超越政治，“因为任何政治总是立足在某一种一定的制度之上的，艺术运动则是对于一切将要固定、停滞的现象的一种冲破力！”

现在抽象地看来，这一争论也许被认为荒唐可笑的：反动的国民党倒主张文艺应服从政治，似乎是正确的；而当时正在走向革命的田老反而主张文艺超越政治，似乎是错误的了！但是一按实质，戴季陶的所谓政治，实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就是要文艺服从这一反动统治。会后有一位先生要求“南国社在三民主义下作宣传工作，”就把戴季陶的马脚露出来了。田老在答复这位先生时说得好：“我们演戏，要是不能满足观众，观众就会鼓噪起来作‘嘘嘘’之声的，政治使人民不满意，人民也会和观众一样要‘嘘嘘’的！”这个“政治”，正是指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此，田老当时所谓的艺术是“政治”的“冲破力”、是“敌人”，都应作如是解，田老在这会上的争论，应当看作反对国民党文化统制的一次抗争。因为《孙中山之死》的被禁演，正标志着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开端。至于对这剧本本身的争论，倒不是主要的。戴季陶坚持说，孙中山先生是位伟大的领袖，不宜搬

上舞台。（其实是因为剧本里写了工农群众，暗示了国民党违背三大政策）田老则举孙中山先生自己说的话“我是人，不是神。”加以驳斥，也未多谈。

正是《孙中山之死》被禁，特别是由被禁而引起的这场大争论，使得田老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因此，当他离开南京以后立刻便在创作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剧作《一致》，接着1930年在思想上起了巨变而写下《我们的自己批判》就不是偶然的了。附带说一句，如今我们废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这口号以后，颇有人大不以为然。我想他如果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戴季陶也企图利用过这一口号，便懂得这口号是不够准确、很容易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了。

上述田老的三则轶事，恰巧都与国民党有关。由此也正好看出从1927年（也不仅从1927年）秋冬之际起田老思想发展和变化过程。因录之以供文学史家、戏剧史家们研究、参考。

1983年4月8日

## 田 汉 与 越 剧

袁 雪 芬

田汉同志是我很早就认识的一位戏剧界的老前辈，也是我最为敬佩的杰出的戏剧家之一。在过去那段非同寻常的交往中，田老对越剧热情的关怀和扶植，使人难以忘怀。

我认识田老是在1946年5月。当时，雪声剧团在上海明星大戏院上演根据鲁迅先生小说《祝福》改编的《祥林嫂》。这是我们四十年代初进行越剧改革的产物，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首演那场盛况空前，许广平先生邀请了上海进步文化界的一批知名人士前来观看演出，其中就有田老。看戏中他极为赞赏地说：“演得真实、生活、思想高度集中。”第二天早上，剧场后台来了《时事新报》记者罗林（地下党员），他对我和编剧南薇、舞台美术设计韩义说：“有两位搞戏剧运动的前辈想约你们谈谈。”随后，我们来到了同孚路108号二楼的一间狭小、简陋的房间，这是于伶同志的家。就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田老。他是一个名望很高的人，却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热情豪爽，平易近人，侃侃而谈，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田老说，看了戏很高兴，地方剧种能演这个戏是出乎意外的。交谈中，他饶有兴致地询问我们，越剧与绍兴大班有何区别？我回答说，绍兴大班是大戏的剧种，历史悠久；越剧是小戏的剧种，历史短。它是从反映民间生活小

戏开始的。田老说，地方戏来自民间，不保守，能反映民间的生活。京剧就不一样了，它做过内廷供奉，保守了，不愿改革。这席长谈是令人难忘的。多少年来，我听到或看到的是社会上一些人对越剧的歧视和对演员的辱骂，从未见过象田老这样热情而真诚地关怀我们的剧种，关心一个普通的演员。以后，田老还常常对人讲，雪芬这个孩子好，非常单纯……对我这个后生小辈很是厚爱。田老曾称自己为“半个戏子”，这不仅表明他对戏曲艺术的热爱，也包含着对世俗偏见的挑战。

这次与田老、于伶同志的见面是我接触进步文化界的开始。此后在我的艺术道路上得到了他们及时的指点和帮助。由于我寻求进步招来了反动势力的嫉恨，在《祥林嫂》演出后，我遭到了流氓的抛粪。事件发生后，南薇去找田老，他当时正在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听了这件事他非常愤慨，立即告诉了大家，并说“这个社会没有保障”，呼吁新闻界支持受迫害的演员。田老的仗义执言，表现了他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性格，教人极为感动。接着，他又专门为我准备举行记者招待会，发了许多请帖，还打算请郭老出面讲话。鉴于当时社会环境的险恶，党在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人于伶认为，不要让郭老参加这次集会，同时劝田老不宜在会上讲话。为了伸张正义、斥责邪恶，田老冒着风险毅然出席了记者招待会。洪深先生发表了讲话，他大声疾呼：“让一个善良人活下去！”过去有多少人遭受了欺凌还要含冤负屈地向恶势力倒赔不是。这次由于田老和进步文化界的支持，我不仅没有受到这样的屈辱，而且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赢得了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同情。事实告诉我，田老他们是最可敬重最可信赖的人。于是我把他们尊称为“进步先生”，他们所组织的反对艺员与妓

女登记的斗争，以及戏曲界联谊会的活动，我都参加了。

1947年夏，为了摆脱剧场老板的压迫，筹款创办越剧学校和建造实验剧场，我约了上海几位知名演员联合义演《山河恋》。在筹划中做了许多工作，克服了种种的困难。由于坚持了团结，这次义演才能如期举行。田老知道这个情况后，马上撰写了题为《团结就是力量》的文章在《新闻报》上发表，支持我们的行动。可是在旧中国，我们美好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国民党政府社会局的破坏，义演的钱无法建造剧场，便在大沽路买了一幢楼房供办学用，但是，这件事国民党的教育局也迟迟不予批准，房子就一直没有启用。那时，负有盛名的田老在上海却无一个居住之处，我们就让他住在里面。他的生活很清苦，依靠写文章度日。尽管这样，田老还是热心地支持我们，为我们写了一出大戏《珊瑚引》。他借《晋书》中石崇的一段史实敷演成戏，通过揭露历史上的石崇一伙骄奢淫逸，残杀无辜的罪行，巧妙地影射现实中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出戏是在1948年秋，我和范瑞娟再度合作时公演于大上海电影院，很受观众欢迎。在演出期间，有一天田汉亲临剧场，说是要离开上海，与我们握手道别，就在此时他仍不忘关心我们，悄悄地叮嘱我们对险恶环境要多加小心。

建国后，田老担任了全国文化部门的领导，虽然他身负重任，工作繁忙，但对越剧仍是非常关怀。1953年我们赴京演出《西厢记》，田老看了戏，和洪深、欧阳予倩一起参加由文化部召开的座谈会，他们从戏谈到了越剧的艺术特色，指出这个剧种不同于一般的戏曲，说它接受了近代戏剧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特别在五十年代中，田老和他的夫人安娥为越剧创作

了《情探》、《杨八姐盗刀》、《追鱼》等剧本。这些戏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较高的成就，成为屡演不衰的越剧保留剧目，有的甚至被搬上了银幕，影响很大。

田老在十年内乱中不幸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离开我们已整整十五年了。我对他的思念之情如流泉不断。对于为越剧事业作出贡献的田老，不仅我们这代人怀念他，我们的后代也将永远缅怀他！

1983年6月于上海

## 中国舞台协会演出始末（续）

——为纪念田汉同志逝世十五周年作

马彦祥

### 六、《洪水》——又一次匆促的演出

中国舞台协会第二次公演的剧目是《黎明之前》（独幕剧）和《洪水》（三幕剧）。《洪水》按原定计划应该是紧接着第一次公演的《械斗》之后演出的。田汉同志在《械斗》公演时的《幕前致词》中早就告诉了观众：“……组织这次公演《械斗》以攻击中国民族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劣根性，《回春之曲》以唤起大家不要忘记国难而继续四年前（按指“九·一八事变”）奋发的精神，《晚会》写国际风云中青年男女的觉悟（按：此剧因剧本未完成，未演出；直到1936年7月间剧本才脱稿，曾以田汉、阳翰笙二人合作名义发表于南京《新民报》），《洪水》则鼓励民众再接再厉与自然的奋斗。”后来因为《械斗》提前结束，而当时《洪水》剧本尚未着手，于是只得将《洪水》演期推迟，作为第二次公演的剧目。

田汉同志从事戏剧运动以来，向以“野生艺术家”自居，有别于那些只依靠“官方”资助的戏剧运动家们，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特色，但无庸讳言，也因此产生了工作不正规、缺乏计划性的另一



特色。在他的心目中，似乎只要写出了剧本，便一切都完成了，他较少考虑到：一出戏的演出，除了剧本之外，还有待于导演、演员以及全体舞台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密切合作才能完成，而从事这些工作也都需要有充分时间的。他的剧本往往是在临上演前几天才完稿，然后在十分仓卒的时间中搬上舞台。第一次公演的《械斗》如此，这次的《洪水》更是如此。《洪水》是我第一次导演田汉的戏，对我来说，倒是一次很好的舞台锻炼。

《械斗》是12月7日宣告停演的。按照惯例，似乎应该等剧本脱稿以后，才考虑上演的时间，而《洪水》却不然，它是在剧本还未着笔的时候，上演的日期和地点便早已预定了：上演日期从12月21日起，地点是世界大戏院。剧场既已订定了，上演日期自亦无可更改。这无异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这种办法施之于戏剧演出，偶一为之则可，经常如此，是不相宜的。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眼看离正式上演的日期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和应云卫都很焦急，尤其是云卫，他是这剧的舞台监督，舞台设计和制作都需要抢时间的。我们商量好了，再去“逼”他一下。朋友们都知道，田汉写戏，常常是“逼”出来的。

我们一起到了忠林坊田汉家里，顾不得座中有客，一开口便催问《洪水》剧本，我说：“如果再不开排，廿一日上演怕赶不上了。”田汉似乎也着急了，说：“第一幕已经写完，油印去了，今天可以印好；二幕已写了一半，和三幕一起，三天之内准赶完。明天你可以把第一幕先排起来，怎么样？”我说：“没有看整个剧本，怎么能先排第一幕呢？”他说：“这个戏和一般的戏不同，是一出群众戏，没有主角；情节也比较简单。故事就发生

在一条大堤上，三幕都是外景，不太费事。”接着，他把全剧的剧情，几个较重要的角色以及对舞台装置的要求简单地谈了谈。

未看到全剧剧本就开始排戏，对我来说，实在是缺乏经验；但是大局已定，势成骑虎，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也答应由他负责通知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第二天上午九时到公余联欢社排演场集合，他自己也准备到场。

第二天上午不到九时，田汉同志和演员们陆续来到排演场。我要田汉同志先和演员们谈谈剧本。照例，这应当是导演的事，但由于导演对剧本也所知不多，只得由作者亲自出马了。

田汉因为急于要回去赶写剧本，只简略地谈了剧本的中心思想，至于剧情、人物等他都没有细谈，只说“你们看了剧本就明白了。”他的谈话内容，我现在还有印象的有如下几点：

(1) 剧中所写的情节都是他在九月间视察徐州灾区时所耳闻目睹的事情，都是有现实生活根据的，不是作者凭空想像的；

(2) 尽管历来政府当局都没有治理水灾的专门机构，然而真到了黄（黄河）水成灾、十分危急的时刻，遭灾的与黄水搏斗的还是农民自己。几千年的中国农民便是被这样的现实支配着的。因此，传统的封建迷信心理便时刻盘旋在农民的头脑里，当他们自己的力量无法抗拒水灾时，便不得不去相信龙王爷，相信镇水的铁牛会吼叫，相信游方道人说的玉皇大帝能救灾的鬼话。可是戏中展现的事实回答了他们：堤决口了，铁牛并不曾吼叫，龙王爷连自己的家（龙王庙）也被洪水吞没了！最后，农民们终于觉醒：要救灾只有靠自己，靠自己筑堤，自己打桩，自己护堤。

(3) 靠自己就得把农民的力量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剧中最后将对那些只顾本村的局部利益而不顾共同利益的农民给以强

烈的谴责。（大意如此）

我们正准备开始念剧本，田汉在一旁看见那油印本，不禁皱眉，说：“这本子印得这么模糊，怎么行哪！”想了一想，又说：“你们今天先用这本子排着，我立刻想办法补救。”我们也想不出他会有什么办法补救，勉强把剧本读完了。谁知第二天一早，完全出于我的意料，看见《新民报》上忽然把《洪水》的剧本公开发表了，剧本前面还加了一段小注：“这一个三幕社会剧的草稿迄今尚未全部完成，本未到发表时期，而油印本字迹模糊，因托《新园地》（注：《新民报》副刊）编者暂以‘台本’样式刊出……田汉附识。”我想这大概就是田汉所说的‘补救’办法吧！他却万没有想到报纸上每天发表的平均不过二千余字，当它刊出的同一天，我已经把第一幕排出来了，当剧本于12月31日全部刊登完毕时，《洪水》的演出也早已结束了。人说田汉有时很糊涂，这也是一例。

戏从17日开排，第一幕整整排了一天，18日上午送来第二幕，19日下午又把最后一幕送来，至此，全剧完稿。我日夜赶排，直到20日下午才勉强把三幕戏从头至尾串排了一遍。当天夜里，等剧场放映的夜场电影散了以后，又和演员及舞台工作人员一起，连排景带走台，整整折腾了大半夜才告结束。

由于这个戏是在边写边排中完成的，潦草之讥，自所难免。起初，我自己也有点信心不足，深恐未能很好地完成剧本的任务，但是一想到我们的演员大都是舞台上富有经验，他们都有丰富的舞台经验，都有熟练的表演技巧，只要能紧紧地抓住剧本的思想主题，善于掌握舞台节奏，控制舞台气氛，再加上在主要场面，特别是每幕戏的闭幕时，能表现出应有的激情，我相信戏还是

会激动人心的。后来的演出实践证明：我的估计还是有根据的。

演出后，有一位熟悉协会情况的朋友在他写的一篇《洪水及其演出》的评论文章中指出：“据我所知，‘舞协’（指中国舞台协会）这一次的演出，筹备、排演，为时都很短，大有热炒现卖之嫌。这一点其根本原因乃是由以游击精神为根本出发点之故。固然，游击精神并不是绝对可以非议的，但是热炒现卖则万万要不得。‘舞协’这次演出，因了每个参加者的富有经验之故，尚未至失败，反而成功，如果能加以严格的、较长时间的筹备与排演，其所收的效果必然地会更好的。”我以为这个批评是中肯的。《洪水》剧本显然也是由于仓卒的缘故，使得作者后来不得不将原剧重加修改，三幕剧改成为一幕两场。

## 七、“舞台上的债，舞台上还！”

中国舞台协会第一、二次公演，虽则集中了一些当时颇有名声的演员，声势浩大，但从演出收支方面来看，营业不能说是成功的，除了欠首都电影院的一笔垫款外，还有大陆商场也赔了不少帐。下一步怎么办？一天晚上，我和应云卫、王晋笙一同到丹凤街访问田汉同志，田汉的三弟田洪当时也在座。谈起《洪水》的善后问题，我们一致认为运动一定要坚持下去，但作法要改变。我们总结了第一、二两次公演的经验，成绩之所以达不到我们的理想，固与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都不无关系，但我们的观众成份绝大部分限于青年学生，而未能扩大到市民群中去，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械斗》和《洪水》两剧都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不适合一般市民的胃口，所以前两次演出都只演了六场便宣告结束。因此，第三次公演的剧目必须在这方面予以重视，务

使观众面能更加扩大些。田汉对于我们的意见表示赞同，他说：“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了。这次我准备改编《复活》，你们以为怎么样？”然后他又接着说：“这个剧本，我前年在上海曾经改编过第一幕和第二幕，并且在《晨报》上发表过，现在我把它继续改编下去，怎么样？”我们听了，一致赞成，认为《复活》既是世界文学名著，又曾摄制过影片，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改编成舞台剧，一定也有号召力。剧目问题就这样决定了；接着是剧本何时可以脱稿的问题。鉴于前两次公演的经验，我们认为再不能像过去那样‘赶场’了，必须给剧作者和导演、演员以相当充分的写作和排演的时间。经过一番核算，大致作了如下的规定：三月中旬以前交剧本，排演一个月，四月中旬上演，并且决定此剧由应云卫任导演，我任舞台监督；把寻找《晨报》上发表过的《复活》旧稿的任务交由田洪负责。

最后，还剩下了一个最伤脑筋的问题是演出费问题。我们大致估算了一下，这出戏的角色多（据田汉当时估计约需四五十人），服装多，场景也多，演出费至少需要千元左右，这笔巨款如何筹措？想来想去都无可靠的保证。最后，还是足智多谋的应云卫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建议：“不久，学校都要放寒假了，我们能不能印制一种预售券，优待学生，一律八折，到学校里去推销。我们的观众主要是学生，我想他们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大家听了都认为是个可行的办法。后来事实证明是个好办法，在一个寒假里，居然销售了一千余张。《复活》的演出费终于解决。这一措施大大鼓舞了我们演出的信心。

因为中间接连过了新旧两个新年，田汉的《复活》改编本一直拖延到四月四日才全部脱稿。虽则比预定的日期推迟了半个多

月，大家还是很满意，认为是中国舞台协会的一次莫大胜利。

经和云卫协商，为了不失信于购买预售券的观众们，尽量争取早日演出，决定稍为缩短排演时间，于四月二十一日在世界大戏院正式上演，并在正式公演的前夕作了一次彩排。像这样正规化的做法，在田汉的前半生的演剧活动中，怕是很难得的了。

胡萍、顾梦鹤等一部分主要演员在三月下旬已应邀到达南京。他们在田汉最后的写作过程中，经常到田汉家里听取他对剧情和人物分析的意见，做了不少排演前的准备工作，使得导演在排演时节省了许多劳力。其他一些演员也大都事先联系好，于四月初陆续抵达南京，有魏鹤龄、冷波、赵曼娜、英茵、陈天国、刘郁民、刘琼、田烈、陆露明、张曙、朱铭仙、刘莉影、何茉莉、严斐、尚冠武、洪运、燕群、张慧灵等。那时排戏，演员扮演什么角色，都由导演决定，演员很少有异议的，不像今天的有些专业剧团的演员，为了争抢角色，相互之间，勾心斗角，你争我夺，闹得一片乌烟瘴气。这种现象，过去倒是没有的。

这次演出因为有预售券的票底，第一场便来了个“开门红”，先后一共演了十二场，场场客满，座无虚席，出现了南京自有话剧演出以来空前未有之盛况。虽然观众还纷纷要求续演，卒以上海来的演员各自都有任务，不便久留，不得不宣告结束。不久以后，《复活》在上海又重新上演，导演是应云卫和石凌鹤，演员除少数人外，基本上还是南京的一批人。据说也轰动一时。

这次演出的收入不仅偿清了以前两次公演的债务，而且还赚得了全部服装和舞台装置，实现了《械斗》公演时田汉在一次茶会上公开宣布过的“舞台上赔的钱，舞台上捞回来”的诺言。

演出后，南京许多报刊纷纷刊登了评论文章，阳翰笙同志在

《评〈复活〉的改编》一文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在看完了《复活》改编本之后，认为有两点意见值得提出来一谈：

“第一，田先生对于女主人翁玛丝洛娃（按：即喀秋莎）却不像托翁（托尔斯泰）那样把她只看成是灵魂复活了的人。他觉得这一出身微贱的吉卜赛的私生女儿之拒绝男主人翁的求婚，和沙皇大赦而愿流配到西伯利亚去，是俄国社会在急剧变革期中一般被压迫了的觉醒和对光明的追求和迈进。

“第二，对于男主人翁的曾经泯灭了的所谓‘良心’的复活，田先生却并不去重视它，特别是托翁为了要复活男主人翁的‘良心’那种近于求神主义的倾向，他更在剧本中把它洗涤干净了的，他对于聂赫留道夫不多不少地描绘成了富于正义感的贵族。

“改编后的《复活》具有这两个特点，我以为是扬弃了托翁原作中的缺点，是可以增加《复活》这一世界名著的光辉的。”

这也正和田汉自己所说的“并不想无条件地搬运它，我是想用批判的态度努力去洗涤它思想上的弱点，发扬它原有的艺术上的光辉”的意图是一致的。因此这个评价对于《复活》的改编本应该说是十分公允的。

这里，我还想记录一段在《复活》演出过程中所发生的小插曲。事情发生得这么意外，这么突兀，这么蹊跷，使我终生难忘。记得就在《复活》正式上演的第一场，是日场，大约离开戏前半小时，前几幕的演员已陆续在后台化妆。这时，一位南京的业余演员×××，他是当中国舞台协会一开始演剧活动时，就自动要求前来参加的；我们因为演员人数不足，也就接受了他，这时，前台早已满座。他一走进后台，手里拿着一张宣传品，大声叫喊：“我们大家都被人利用了！不能干了！”当时，我以舞台

监督的身份过去问他：“有话可以说，吼什么？”他举起手里拿着的那张宣传品说：“你看，我们在这里演戏，别人却借此做广告，这不是利用我们是什么？”我接过那张宣传品一看，原来是国立戏剧学校即将上演《吕四娘》（？）一剧的宣传广告。我问他：

“这张宣传品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刚从前台进来，看见场子里正在到处散发。”我问：“谁叫发的？”答说是应云卫叫发的。我当时告诉他说：“戏校借我们演戏的机会散发一些宣传品，有什么了不得？何况他们还是通过我们的人发的，你未免太小题大作了。”他不听我的劝阻，还是暴跳如雷。我知道他这样做，目的是在煽动群众罢演，制造纠纷。但后台的演员们不仅不为所动，而且都认为他做得忒以过火。当时已将近开幕时间，为了怕影响后台秩序，影响群众情绪，我也火了，很不客气地对他说：“这里是后台，不要在后台大吵大闹！”他听我这样说了，一声不响，转身便走，离开了后台。我一看事情闹僵，便叫剧务追去拉他回来。过了一会，剧务匆匆跑回来告诉我：“×××一出剧场，直奔对过《新民报》馆，我直追到报馆楼上编辑部，劝他顾全大局回来演戏，他说他要登报脱离中国舞台协会！你看怎么办？”我万想不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当时田汉和应云卫都不在场，非我当机立断不可了。我告诉大家：“大家赶紧化妆，我亲自去跑一趟。戏还是准时开幕！”并请剧务代我‘掌锣’

（那时是打锣开幕）。我跑到《新民报》，直奔楼上编辑室（此报是我们当时的主要宣传阵地，报馆职工和我们都很相熟，报馆白天照例无人办公），果然见×××已拟好启事稿，正待送交广告科去。我劝了他一会，见他态度坚决，似无挽回余地。我向他索启事看看，他不给，只说“明天报上见，我从今天起脱离中国



舞台协会了！”我不知他在启事上究竟说了些什么，便也急了，我说：“你根本不是协会的会员，如果你存心捣乱，协会也可以登报不承认你的！”说完，因时间紧迫，我回身就走了。到后台时，戏已开幕，我连忙在后台另找了个演员，请人帮他化妆。好在这个角色只有第三幕一场戏，戏和台词都不多，临时说了一下就上场了。我记得田汉在开戏以后，一直站在边幕里边欣赏演出，似乎并未发觉台上换了演员。日场总算这样应付过去了。夜场开幕前，大家都正在忙着化装的时候，想不到这位已经声明退出中国舞台协会的‘会员’，在大家意想不到的时刻，突然又出现在后台了。他一声不响，走到化装桌前正待坐下化装的时候，我过去拍拍他的肩膀，问：“你干什么来了？”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化装来了！”我怕他又要玩什么花招，只得笑笑说：“对不起，你来迟了，你的角色已经有别人替你演了。”他望望周围的人都若无其事地在忙着各自的工作，他自感无趣，便默默地溜出了后台。隔了一天，我把这件事的经过告诉田汉，田汉什么也没说，只是大笑不止，他的反应是否事先已有所知，或者根本一无所闻，我始终不清楚。

现在回想起来，纵使当时处于形势紧迫而又时间仓卒的情况之下，我这样草率地当机立断，显然是过于急躁和粗暴了。这里我记下这段回忆的目的，是想说明中国舞台协会在南京演戏，情况也相当复杂，并不如人们所想像的那样风平浪静的。

## 八、芦沟桥的炮声响了！

《复活》演出后，田汉同志决定中国舞台协会不再举行公演。这时，应云卫已经离开国立戏剧学校，回上海去了。我由于

当时在剧校任校长秘书的杨帆同志（当时名石蕴华）透露给我的消息说，张道藩已正式通知余上沅（当时剧校校长），下学期决定不再续聘我，要我预作安排，因而我也准备一放暑假便离开南京。那时华北形势日趋紧张，果然，七月七日芦沟桥的炮声响了。消息传来，国民党政府立刻慌了手脚，决定把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南京城里闹得人心惶惶，都忙着各奔前途。一天，遇到田汉同志，他告诉我，‘南京新闻记者联合会’（或是‘公会’，记不清了）的一位朋友去找他，说他们联合会准备举行一次义演，演员全部由新闻记者担任，只因没有剧本和导演，想请中国舞台协会帮帮忙。田汉对我说：“过去他们帮了我们不少忙，这次，我们也应该帮帮他们的忙。我已经同意了。”我问：“演什么戏？”田汉毫不迟疑地回答我，“芦沟桥！”接着问我：“你能不能在南京多留些日子再走，帮他们排一下？”我说：“那就得看你什么时候能把剧本写出来，记者们演戏可不比演员，要费时费事得多。”他说：“这我知道，我今夜就动手写。”我说：“我和上海已经有联系，月底前去上海，你的剧本要能在月底前赶出来最好，如果赶不及，我推荐当时中国戏剧学会的代涯来导演，如何？”田汉迟疑了一下，说：“我马上写封信给你的老师（指洪深先生），他正在上海，问问他能不能来？”我表示同意。这时已届七月中旬，南京的气温已经相当高，田汉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冒着酷暑，日以继夜地奋战，经过不到十天的时间，一部三幕的《芦沟桥》竟然完成了。这时洪深先生也已来了回信，说，月底以前他离不开上海，如果剧本脱稿，可由我替他代排，等他来了由他接着排。这样，我七月底前就不可能离开南京了。我记得戏是七月下旬才开排的。记者演员们虽然都是熟人，也很认

真，但和一般演员毕竟不同，所以到七月底才排出了不到两幕，幸而八月上旬，洪深先生守信地从上海赶来了。于是便由洪深先生接着排下去。没两天，我便去上海，未能亲眼看到这剧在大华电影院的正式演出。

后来，洪深先生由京返沪，据他告诉我：《芦沟桥》在大华电影院上演第一场时，便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重阻挠。开演前，观众已告客满，这时，一群国民党特务突然跑来，极力阻止演出，全场观众为之大哗。洪深先生当即跑到前台，向特务们据理力争，在广大观众的有力支持下，田汉的《芦沟桥》终于得以胜利演出，与上海戏剧界集体创作的《保卫芦沟桥》一剧相互映辉，打响了‘抗战戏剧’的第一炮。

## 九、结束语

以田汉同志为中心的中国舞台协会的四次公演，其演出过程略如上述，至于田汉个人，除了这几次演出外，在南京还做了些什么事情，据我经常和他接触所了解的，他一直是不懈地在写作。他在南京期间，因为没有经济来源，生活相当艰苦，不得不无休止地依靠微薄的稿费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初步了解，他在这两年半期间曾发表过的作品如下：

1. 《阿比西尼亚的母亲》（独幕剧，发表于《新民报》）
2. 《洪水》（三幕剧，发表于《新民报》）
3. 《晚会》（独幕剧，以与阳翰笙合作名义发表于《新民报》，未上演）
4. 《阿Q正传》（五幕剧，发表于《戏剧时代》）
5. 《复活》（六幕剧，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6.《黄山钟声》（电影剧本，由史东山导演，不知后来拍成没有？）

此外，还写过散文、剧评等约近百篇，新旧诗歌约数十首，大部分发表于《新民报》。

写作之外，我还知道他曾离开过南京几次：第一次（1935年9月）与徐州民教馆长赵光涛同去徐州视察水灾；第二次（1936年9月）为商讨《黄山钟声》剧本与电影导演史东山去黄山、杭州；第三次（1937年4月）为搜集史可法史料，准备写《史可法》话剧，与阿英、辛汉文、石凌鹤和我同去扬州访史可法墓，归途中还在镇江作了一次讲演，讲题是《关于历史剧问题》；第四次（1937年10月）为商议筹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事宜，与阳翰笙、田洪、张曙等同去苏州，与上海戏剧界的朋友金山、冼星海、辛汉文、王莹等会晤。

根据上述田汉同志在南京两年半的行动表现，正当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时刻，每一个文化人都感到自己肩荷重负，必须把自己最大的力量贡献出来、以帮助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的时刻，田汉同志并未忘却自己的职责，和大家一样，始终孜孜不倦地努力奋战，应该说他是无负于人民的。虽然中国舞台协会所做的工作不多，影响所及也仅限于南京一地，但是它和全国的戏剧运动始终是息息相关，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1937年的上海之被称为‘戏剧年’，上海戏剧界的多方面的努力获得了广大人民热烈的支持，不能说与中国舞台协会在南京的艰苦奋斗无影响。即就演员来说，中国舞台协会的演员绝大部分不都是由上海来的吗？

田汉同志在生活上的某些自由主义作风，凡和他相熟的朋友大概都知道，甚至把它当作“佳话”来传播的。但就我和他多年相处

的观察所得，他在关键时刻常常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是个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人。我们有些朋友由于习惯于在帝国主义者控制下的上海进行地下活动，一旦看到田汉居然公开在南京大演其戏，便不禁大惊小怪起来。但田汉心中有数，他说：“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既然不许我搞政治活动，而许我搞戏剧活动，那我就搞戏剧活动。”在我和他的接触中，我从来没有发现他搞过什么‘政治’活动，他的政治活动都是公开的，就是演剧活动，就是发表文章。他虽身居南京，仍念念不忘戏剧界的许多重大问题。我记得1937年春，正当国难日亟的时候，我为编辑《戏剧时代》月刊，特地向他索稿，他除了给我一部三幕剧《阿Q正传》之外，还写了一篇《话剧界的团结问题》。他在文章中向戏剧界的朋友们大声疾呼：

“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使我们痛切地感到必须集合戏剧界一切革命的力量，使中国的戏剧运动十足地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一翼。何况殖民地的戏剧运动本身是经常地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的，它还没有和平发展的客观条件，它只能在不断的抗争中求发展，而有效的抗争是以戏剧界极广泛而巩固的团结为前提的。”最后，他强烈地提出：“我希望在下面所举的三点上看到同志们的‘颜色’：

“（1）谁能多演最有国防意义的戏，而且使这些戏深入各社会阶层获得广大观众？

“（2）谁能与戏剧之积极的内容相配合，与中国一般贫乏的物质条件相适应，提高其技术的水平以为广大的姊妹剧团倡？

“（3）谁能注意剧团演员的经常训练与教育，使得每一演员的公私生活都不愧一民族解放运动中艰苦卓绝的战士？”

这和我们党所希望于我们今天的戏剧界的“要多演好戏，要多为‘四化’作出贡献，要提高舞台艺术水平，要苦练基本功，要加强政治学习，要为人民服务，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只向钱看”的号召，在指导思想不是很有点相似吗？

我们党是英明、伟大的。自从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重大任务，在各个战线上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其中也包括着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因而田汉同志的“南京冤案”得以昭雪，把“四人帮”时期中央专案组所作《关于叛徒田汉的审查结论》全部撤销。但美中不足的是问题并没有彻底澄清。因为自从田汉同志在南京“大演其戏”以来，文艺戏剧界的许多朋友对田汉在南京演戏一事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才引起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他的诬陷。现在经过平反昭雪，“叛徒”一顶帽子总算摘掉了，但“看法”并未得到彻底澄清。不然，为什么在田汉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中，偏偏略去了他这一时期的活动呢？为什么近年来研究田汉同志生平的作品同志都不敢触及他这一时期的活动呢？为什么有的同志在写他的“年表”时，往往把他这一时期的活动给删略去了呢？……

田汉同志是我国话剧运动的拓荒者、奠基人，也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半个多世纪以来，每当艰难的戏剧运动向前迈进一步，都留下过他的脚印；他对于中国戏剧运动发展史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的历史应该是完整的。我们不希望看到他的一生业绩中留下了1935——1937年这段历史长期成为空白。

（全文续完）



1937年10月上海戏剧家救亡协会组建的上海京剧界  
救亡协会成立纪念照

(前排左起：欧阳予倩、郁风、胡萍、金素文、××  
×、×××、田汉、于伶；后排右起：×××、田  
洪、吕君樵、高百岁、周信芳，后排左一为辛汉文)



田汉同志接见演员



1960年3月27日周恩来、贺龙、金山等同志在观看话剧《文成公主》后与田汉同志合影



1963年田汉同志在鸿宾楼为中国京剧院题字



## 萨本栋与厦门大学

蔡启瑞、黄厚哲

陈璧玉、陈孔立

有些人你和他接触的机会不一定很多，可是他的言行和品格却使你终生难忘。萨本栋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萨先生担任厦门大学校长只有七年的时间（1937—1944），后来他便出国讲学，1949年1月在美国逝世，可是当年他的同事们和学生们，至今仍然十分怀念他，尊敬他，可见萨先生是感人至深的。萨校长出自爱国热忱而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尤其使我们感动，对我们影响很大。



萨本栋

萨本栋就任厦门大学校长时，只有三十六岁，但他那时已经是国内外知名的教授了。他是物理学家、数学家、电机工程师，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已有八年，是全国采用的优秀教科书《普通

物理学》的作者，又是清华大学十二名评议员中最年青的一员。由一位在学术上很有发展前途的教授担任大学校长，把许多精力用于行政事务，不能不说是一种牺牲。可是萨先生下决心接受这个任命，他怀着远大的抱负，要发扬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的精神，把厦门大学办成一个国际上著名的具有特色的高等学府。

那时抗日战争刚刚爆发，摆在新任校长面前的是重重的困难。萨本栋认识到“现在不是推诿责任的时代”，他表示“事无大小，我都要亲为或与闻”。他正是以这种负责的精神来对待一切困难的。他刚到厦门，日本军舰便开始炮轰厦门市，当时人心惶惶，他把学校暂时迁往鼓浪屿，坚持上课。后来眼看厦门无法久留，便决定迁校闽西长汀。在他的筹划和指挥下，全校的人员、仪器、图书都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而当时有些大学却在迁校的辗转过程中遭到巨大损失，以致元气大伤。在长汀，没有校舍，缺乏经费，他要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大到制定全校的建设计划，小到审定建筑图纸、改建旧房，他都亲自参加研究，而且每天都到工地上巡视。长汀地处偏僻的山区，生活条件较差，厦大教师待遇不高，师资比较缺乏，他亲自出面，千方百计地聘请一批知名学者来校任教。由于战争的影响和经费的限制，添购图书、仪器是十分困难的。他一方面自己筹建水力实验室、实习工厂，一方面设法向国外订购一些急需的书刊和药品。那时在厦大图书馆里可以看到英、美、法、德等国的一些期刊和西欧当年出版的图书，这使得来校参观的学者们赞叹不已。不仅如此，萨校长还得为全校师生的生活而操心。物价飞涨，生活困难，他必须向当局力争提高师生的待遇，设法增加“免费生”和“贷金”的名额，甚至还亲自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介绍在校外的兼职工

作。为了增加学生的营养，他提倡吃糙米饭，并且决定由学校自己制作豆腐。长汀没有电灯，他就拆了自己的旧轿车，把发动机加以改造，解决了学校的照明用电。那时日本飞机经常前来骚扰，每当空袭警报，他总是亲自指挥大家疏散，直到敌机临空，他才最后一个进入防空洞。有一次敌机炸毁了学生宿舍和实验室，他没等敌机离去，就赶到现场，至今可以看到一张他站在被炸的同安堂前的照片。上述这一切，都是和平时期的校长所不会遇到的困难，萨校长以惊人的毅力和魄力，迎难而上，他肩上的担子是十分沉重的。

作为一个教授，他除了校务工作以外，还承担了不少教学任务。有时每周上课的时数，竟达到甚至超过一个专职教授的要求。他曾经以他自己的丰富经验指导普通物理的教学，并亲自开设过微积分这样的基础课，还为电机系开设交流电路、电工原理等课程，他一面教书，一面编写教材。他的《普通物理学》是“部定”（当时教育部）的大学用书，交流电机教材《并矢（向量）线路分析》后来整理成英文本，在美国出版。萨先生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他能够根据学生的水平，因材施教。有一年修微积分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有些人没有掌握解析几何、三角等基础知识，他用很短的时间加以复习，抓住要领，条理清晰，使学生印象十分深刻。他教交流电路时，能够把复杂而枯燥的电路，讲得系统分明、生动有趣，学生们都说萨校长把书教活了。他由于担任繁重的校务工作，上课时间往往安排在清晨。他患了严重的胃病，有时卧床不起，但他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功课，常常让电机系学生到他的床前听讲。胃病发作时，稍稍停顿一下，然后又继续讲下去。虽风湿病发作，驼背弯腰，还撑着拐杖上课堂讲课，

乃至拐杖掉落在地，他自己不能再俯身捡起来。他这种自我牺牲忠于事业的精神，曾经使许多学生感动得流下热泪。何恩典教授当时是他的学生，曾谈起不少关于这方面的感受。

萨校长经常教育学生，学好本领，贡献社会，“造福于国家和人群”。他认为中国受日本的侵略，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落后，他想通过自己的奋斗，培养出一批科学技术人才，来拯救自己的祖国。抗战期间，国家十分需要土木建筑、机械、电机、航空等方面的人才，而当时厦大却缺乏开办工科各系的必要设备和师资力量。萨校长不满足于学校原有的规模，他千方百计地为创办工科各系而奔走，终于因陋就简地办起了土木、机电、航空三个系，其中航空系的一个教学设备还是用一台报废的飞机发动机改造成的，但是，这几个系都办得相当出色，到1944年，工科学生已占全校的三分之一，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急需的人才。

强调质量，是萨校长办学的一个特点。他认为大学教育必须强调研究学术和培养技能，这样才能提高我国的学术水平。他说：

“本校一向对于学生程度的提高，非常注意。在量与质不能兼顾的情形之下，对质的改良，比量的增加，尤为重视”。为此，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并且采取一系列措施，把好质量关。例如，他强调学好语文和英文，一年级学生必修这两门课，不及格者要重修，重修不及格则予以退学。他重视基础课的教学，要求有经验的教授、副教授开基础课。他自己曾经为工科学生讲微积分，并指导过普通物理的教学，他认为这两门不及格就不能学好电机专业课，应当转到别的系去学习。他还提倡学生要学会动手的本领，鼓励搞好实验和实习。此外，他还提倡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培养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他曾经亲自参加数理系学生的专

题报告会,并且向报告人提问,提高学生钻研学术问题的能力。

爱护学生,爱护人才,是萨校长一个突出的优点。他不仅时时事事为国家培养人才着想、而且还设法直接听取学生的意见。他曾经分组接见理工科各系的学生,每逢星期六傍晚,便邀请十个左右的学生到他家里谈话,在他家里吃晚饭。凡是学生反映的意见,他认为可以接受的就一一照办。有一次,一个生物系的学生反映说,有一本英文参考书找不到,过了两天,图书馆便通知这学位生书已经查出来了。校长亲自过问这样的小事,使学生感受到亲切的关怀,事过几十年,至今谈起来印象还是十分深刻的。他对一些杰出的人才更是十分爱惜,千方百计为他们提供发展才能的条件。他曾经动员陈梁生等去考庚款留学,陈先生后来在土壤力学方面很有成就。听到化学系一位年青助教写了一篇论文,就要这位助教去见他,虽然这位助教和他平时接触的机会不多,只见过两三次面,又不是他直接教过的学生,他还亲自帮他看论文,改论文,甚至连英文用字都加以润色。

萨校长还有两件小事给我很深的印象。一件是他反对搞同乡会,他指出:“在本校内,绝对不容许有地域的成见”。他认为以地域分派别,不相合作,彼此攻讦,那是极端狭隘无聊,是对个人、对国家都很有害的事。他从不任用亲信,他来校时只带了一名助教兼秘书。后来只有名一秘书是他的亲戚,但从未受过重用。另一件是他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夫妻不得同在本校工作。他自己带头执行,他的夫人受过体育方面的高等教育,虽然当时厦大很需要女生的体育指导员,她也不能在本校任职,只能是义务地担任女生的体育指导。但她这个义务指导比专职的还认真,既上体育课又十分关心女生的健康和生活,七年如一日,未尝接受国

家半点补助，这也间接地反映出萨先生夫人的情操品德。他的好朋友教务长傅鹰的夫人张锦教授，本来可以在化学系任教，为了遵守上述“规定”，只好在远离长汀几百里的沙县担任医学院教授。其他如生物系顾瑞岩教授和他的夫人杨佩芬也无例外，这些措施是否妥善是可以讨论的。但是，由此可以看出，萨校长为了不让家庭观念、地域观念妨碍学校的事业，是煞费苦心的。他的本意是主张团结一致、不搞小集团的。同时，这也充分体现了他的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

经过萨校长和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厦门大学不仅在规模上有较大的发展，而且在质量上有显著的提高。那时全校设有文、法、商、理工四个学院十五个系，从校舍、图书、仪器、师资力量来看，在战时全国各大学中可以算是比较好的。本校学生在“全国大学学生竞赛”中取得好的成绩。本校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又能吃苦耐劳，得到社会上的好评。正是在这个时期，厦门大学成为“国内最完备大学之一”，一些外国学者称赞本校是当时“加尔各答以东最完善的大学”。这一切都是和萨校长出色的领导分不开的。

当然，代价是巨大的。萨先生刚刚到校时，还是一位容光焕发、精力充沛的青年学者，还能打网球，可是繁重的校务和教学工作，使他心力交瘁，积劳成疾。1944年他还不过四十三岁，却已经腰弯背驼，显得异常衰老了。可以说，萨校长已经把全部精力用于办学，他用舍身的精神，换来了厦门大学的发展。

萨本栋作为一个学者，他在物理学上是很有成就的。他曾经创立亚栋定律，他用孪量数理来分析电路，这在电机工学上是一个创举，他的交流电机教材《并矢线路分析》，被英、美等国的

许多学校采用为课本。他作为一个教育家，厦门大学的发展，充分体现他在这个方面的杰出的才干。他提倡学术自由，爱护青年学生。不过，他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当时他还看不出中国的前途，他企图走“教育救国”、“教学救国”的路，后来才逐渐认识到那是走不通的。但是，他始终是爱国的。他曾经以自己的名义和全体教授的名义，通电斥责汪精卫卖国投敌的罪行。有一个美国学者来校演讲时说，中国应当以农立国，由美国提供工业品。萨校长指出，中国如果不发展工业，永远只能是美国的附庸。我们一定要发奋图强，发展自己的工业。可惜他过早地去世，没有看到祖国工业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1956年蔡启瑞刚从国外回来时，吴学周老先生就对蔡说：“萨先生不但才能非凡，而且正直敢言，真是了不起的人，如果能活到现在，一定可以为国家作出很多的贡献。”蔡在国外时见到一些以前在清华或厦大时曾经是萨先生的学生或朋友的人，当谈到萨先生不幸逝世时都流泪痛惜。还听说当萨先生因胃癌卧病在隔离病床、自己病在垂危时，喘着气一再不停地向唯一伺候在他身边的主治医生述说他积累在脑中的许多科学设想，并时时问那位医生说：“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没有？”虽到最后息，还想把科学知识留于后人，这一点精神使那位医生深为感动，虽然他不是同行，听不懂他所说的科学道理。

以前曾有人谈起道德继承的问题，象萨先生那样的为教育和科学献身的精神，对于老、中、青成千上万的人都是一笔精神财富，给予正确的评价，将有利于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实际上当时有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即使平时和萨先生极少接触，只是悄悄地敬仰着他，也从他的献身精神，获得一些楷模作用。

## 回忆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萨本栋

张存浩

1943年我进入厦门大学一年级，萨本栋校长亲自担任我们初等微积分课。这是萨师入厦大以来的传统——高度重视基础课并把最强的教授阵容放在基础课教学的第一线。年复一年，他自己带头身体力行。在他倡导下，谢玉铭教授——现在复旦大学的谢希德同志的父亲年年教普通物理课，傅鹰教授——我的姑父年年教普通化学课，都深受同学的欢迎。这使新同学从入学起，就重视打好基础，养成孜孜不倦的好学风气。

萨师治学严谨，即使讲授初等微积分这样的基础课程，他也是堂堂精心备课。他讲课逻辑严密，结构紧凑，并非常珍惜时间，课堂上不说一句闲话或无用的话。每课开始，必提出一个，最多两个主题，写在黑板上方，然后围绕此主题展开论证、推导，到学生明了要点之后，才进一步讲到实例和应用。到每堂下班前五分钟，又从新回到主题，进行简短的总结，并再次强调重点。他每堂课犹如一首交响诗，浑然一体，一气呵成，并层层引人入胜。他当时是国内最知名的学者之一，又有校长重任在身，但对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却始终如此认真负责，全神贯注。这不仅看出他的治学精神，也说明他对青年一代的关怀和期望。

他还亲自领导撰写《初等微积分》教科书，作为著名的《普



通物理学》教科书的姊妹篇。书中搜集应用算题之广泛是同类书中很少有的。我还清楚地记得萨师在此书序言中写了这样的警句,大意是:世有以为数学之作用在于其力量(Vigor),而不在其严格(Rigor)者,信然也。这也是萨师自己的学术思想。他是强调治学要联系实际的。

萨师在三十到四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位有代表性的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在二十年代初清华留美学生中就是佼佼者。1921年起先后在伍斯特(Worcester)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学习,得博士学位。他的同学都传颂他是清一色的全优生。回国后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时,正是一位年轻有为,卓有才华,备受清华大学和叶企孙,吴有训等教授推崇。他在教学中很快地编写出新颖的《普通物理学》教科书。此书与严济慈副委员长的同名著作齐名,当时作为教育部定的教材在国内广泛使用。受到理工科院校和科技界好评。

大约在1935年,他再次访美,作为美国著名大学(俄亥俄或伊利诺)电机工程系聘请的客座教授讲学一年。据我所知,卅年代在理工方面东方人被美国聘为客座教授的是很少的,特别,在当时我国国际地位低下,科技教育落后,西方对中国很歧视的情况下,他作为中国人被聘为美国理工科客座教授,更是难得的。此行还导致他在美国撰写出版了英文科技专著《电路分析中的并矢运算》(Dyadics Circuit Analysis)一书,这在三十年代理工方面的中国学者中也是首创。

1937年萨师三十六岁时出任厦门大学校长。直到1944年的七年间,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励精图治地办好这所学校,力图有所作为的。尽管遇到来自国民党当局和旧社会的层层干扰和阻力,

他的事业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学风正派，学术水平有所提高，培养出一批训练有素的人才。时至今日，他的优秀品质仍然在他的许多同事、学生中传颂，他留下的精神财富直至四十年后今天的厦大仍然是宝贵的。

我以为萨师的优秀品德是谦逊持重。他在全校上下有着崇高的威信，但他从不盛气凌人或表现自鸣得意，而总是默默地做着许多具体的事情。无论对老师或学生，他遇事总是耐心商量。虽然在三四十年代的旧中国，他这个校长却毫无官气，这使得他有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在学生中，他坚持反对地方主义。原来厦大来自福州、闽南、江西三地区的同学间不甚团结。经过萨师加上其他教授耐心作工作，消除了隔阂，并出现了亲密无间的气氛。在教授中，他注意听取不同意见，并实行“兼容并蓄”。当时文学院院长周辨明教授，在治学观点和萨师不尽一致。但由于萨师的耐心工作，仍然保持很好的团结。1944年萨师离开长汀，出国访问时，周辨明教授用英语写了热情洋溢的颂词，并配了曲，在为萨师送行的会上亲自演唱，感人至深。有一教授品行不端，曾写匿名信骂人。萨师发现后，也以慎重态度对待，责成其检查了错误。

在厦大，学生勤奋好学，蔚然成风。一走进图书馆、大小阅览室，到处鸦雀无声，一排排书桌前，学生们都在聚精会神地攻读。我以为这是与萨师本人带头刻苦钻研分不开的。有一次，我注意到他在阅览室中读一本书，在长达两三小时的时间里，我看到他始终保持固定的姿势，连头部稍稍偏一下都没有，周围的一切全都忘记了，专心致志乃至如此。

萨师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不遗余力。在因抗日战争

内迁的大学临时修建的校舍中，我以为厦大的教室（包括大型阶梯教室），阅览室要算最好的。萨师还亲自过问学校专用电厂的建设，使全体师生在困难的岁月里能用上了电灯。

我姑父傅鹰教授与萨师原系世交，但过去并不熟悉。自1939年应萨师聘到厦大任教务长及理工学院院长以来，他们在为祖国培养人才的共同事业中结成深厚友谊。因我自幼随姑父母生活，对此知之较稔。那几年，萨师每周至少有三、四次，有时天天到我家来，与姑父商量学校大事。傅鹰教授很敬佩萨师的为人，并全力支持他的工作。而萨师对校政大事也都征询姑父的意见。他们讨论最多的课题之一就是发现优秀的教师和学生，并对之扶植鼓励。象现在厦大副校长蔡启瑞教授，物理系主任何恩典教授，已故中山大学数学系郑曾同教授等，他们都给以一致好评。

傅鹰教授为人刚直不阿，对国民党在朝及学界许多人疾恶如仇，言谈间及课堂上常有表露。他与福建省的国民党当局也有冲突。萨师则忍辱负重，尽力从中周旋，并给以保护。但他自己受到的压力也愈来愈大了。大约1943年间，他们之间的密谈增加了。什么是促使萨师离开厦大的主要因素，我不了解。但1943年下半年，萨师显然已认识到他已无法继续在厦大工作下去了。他征询姑父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继任校长。姑父母都感谢萨师提前打招呼。他们提前在1944年2月离开长汀，准备再度出国。三个月后，萨师也离开了。在萨师离开前不久，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曾来长汀活动，并在全校大会上假惺惺地对萨师“勉励有加”。许多人看到，萨师在会上伤心地落下泪来。的确，他当时看不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头脑中显然有些“好人政府”，“廉洁政治”的幻想，但假如他能活到解放以后，我以为是不难转变

认识的。

萨师和科学院已故吴有训副院长私交甚笃。抗日战争期间，吴有训师在昆明，他们每两三星期就有书信来往。1946——1947年，萨师在南京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就住在吴师（当时任中央大学校长）家中，同时应吴师和陈章教授之邀，在中大开设“无线电工程”课。我曾去吴师家看望他。萨师精神还很好，但已更消瘦了。

原来他长期苦于胃病，体质素弱。多年来勉强坚持工作，积劳成疾。不幸在1949年初，他才四十七岁，胃癌病情恶化，到旧金山抢救无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当时我在密执安大学，听到噩耗，同窗朱起鹤教授时在柏克利，代我送了花圈。我最大的惋惜是：萨师未能亲眼看到祖国解放。如果更早得到党的关怀照顾，萨师完全可能多活二三十年，他一定可以接受党的教育，他的才华也将得到充分的发挥。他短暂的一生，说明了解放前高级知识分子的遭遇。知识的优势，个人的奋斗，都不能产生多少积极效果。

## 关于萨本栋二三事

萨师煊

萨本栋是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和电工学家，许多人都知道他写的《普通物理学》一书，是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风行全国的大学丛书之一。其实他的主要成就却在电工学方面，他所著的在美国出版的《并向量电路分析》（“Dyadic Circuit Analysis”）是一部具有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他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出色的教授，也是一个为人楷模的教育家。他不仅以他的非凡学识为世所景仰，而他的优秀的品质、高尚的修养，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服务精神更使人永志难忘。他以四十七岁的盛年（1902——1949年）过早逝去，对当时的科学界教育界无疑是重大的损失。虽然由于历史和教育的影响，以及所处的地位的局限，他在政治上觉悟得比较晚，但到1948年7月间我们最后一次晤谈时，我感觉到他已改变了抗日战争中以国民党为正统的观点，而开始倾向于我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他还和我谈起伪国大时国民党要安排他担任“国大代表”他谢绝了。1948年终，当解放战争取得重大胜利、蒋家王朝惶惶不可终日之际，他拟从南京中央研究院请假回福州老家养病，实际上他是想借此和国民党当局脱离接触，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建立。当时他已作好

准备，运了几箱书回家，但后来由于癌症发作而未果。这是令人十分惋惜的。

以下从我与他的短暂的交往中谈谈有关于他的二、三事。

1937年厦门大学改为国立，他从清华大学南下任校长，到校不久，全面抗战开始，厦门位于海防前线，在炮火纷飞中，他与广大职工同甘共苦备历艰险，组织指挥将学校内迁。到达长汀以后，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逐渐盖起校舍，聘请教授，制订了严格的教学制度，使厦门大学在当时东南部，成为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他在日常工作中，事必躬亲，不仅自己主持了重要的教学活动，而且对于学生的学习、生活等，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经常亲临食堂、宿舍、教室和运动场，检查膳食质量、住宿条件，和上课情况等。在授课时，更是体现了极端负责的精神，早期他亲自讲授微积分、普通物理等重要基础课。成立机电系以后，电工方面的主要课程如电工原理、交流电路、直流电机、交流电机等，都是亲自编写教材进行讲授的。每学期他几乎每周都讲授6至8学时的课程。1943年，他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不得已暂时停下，但一俟病情好转，尚未康复，他又把家里的小会议室当做课堂进行讲授。

在政治上，他号召埋头读书，莫问国事，这样影响了校内进步活动的开展。这是他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他对于国民党特务迫害青年学生也进行过抵制。1943年福建省特务头子黄珍吾派人来校交涉要逮捕一个学生(地下党员)，他带着病躯和来人争论竟日，终于顶住了反动派的逮捕，而他自己则因此再一次躺倒，加剧了病情。

抗战后期，物价高涨，公教人员生活，异常清苦，作为校长

也不例外。除了薪水以外，无其它额外收入。饮食简易，衣着俭朴，经常身穿布质中山服，脚着双钱牌球鞋在校内奔忙，新来的同学往往以为是校内工友。学校有辆校长个人专用的汽车，自我1941年入校以后，从未见他乘坐过，有时出差到重庆或福建省省会永安，都是乘长途汽车。后来他把这辆汽车的发动机拆卸下来，作为校内发电厂的动力设备，供照明之用。1948年暑假，我路过南京去看他（当时他负责中央研究院工作），他用汽车让我嫂子送我回到住处——另一个哥哥的家中，在南京的亲属都说，他从来不让家里人用他的车，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

他在厦门大学当了七年校长，除初去时带了一个亲戚当秘书外，没有再引用我们家里一个亲人。在招生上，他也是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我们家中有几个堂弟妹多次投考厦门大学，因分数不够，照样未被录取。

1949年他逝世时，我正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噩耗传来，厦门大学校友无不异常悲痛，当时几乎散于全国各地的厦门大学校友，都为他举行追悼会。象他这样为科学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廉洁奉公，不徇私情的领导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是凤毛麟角的。就是在今天的新社会，也是值得许多人效法的。

# 魂系中华 骨归故土

## ——忆我们的萨校长

厦门大学在榕部分校友供稿

林 泽 芬 执 笔

1949年1月31日，中国杰出的物理学家、教育家萨本栋在美国旧金山一所肿瘤医院里逝世了。第一个听到噩耗的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医院的主治医师打电话来请他去，医师十分惋惜十分抱歉地对他说：“昨晚萨先生病情恶化，他自己知道已经不行了，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呀说呀，几乎说了一夜，说的全都是物理学。”医师接着说，“我看得出，他有一肚子的学问，对物理学有新见解、新理论，他热切地希望把它留给后人，他拉住我的手不放，想让我记住他所说的一切，以便传达给在世的人。可惜我学的不是物理学，他讲的东西对我说来实在太高深了，我理解不了，更谈不到什么传达。我看着他最后闭上了眼睛，却无法完成他对我的殷切嘱托，十分遗憾！……”萨本栋校长逝世后，根据他生前的愿望，亲友们把他的尸体献给医院进行解剖，供研究和寻找治癌的方法。并依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运回中国，安放在福建厦门市南普陀厦门大学校园里。

萨本栋校长一生虽只有短短的四十七年，他却把自己的全部知识、智慧、才能和心血献给了祖国，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虽





萨本栋在美讲学期间  
(前右二为萨本栋)

然他逝世迄今已三十多年了，但是许多科学界人士还在怀念着他，他培养的数以千计的学生还在怀念着他，中国的人民还在怀念着他。

我们这些已年过六十的人，是他学生、同事中的一部分。萨校长为人正直，做事认真，治学严谨，每想起这些我们仍肃然起敬。他在抗日战争物质条件极其艰苦、政治环境极其险恶的时期，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为中国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至今依然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为振兴中华而继续奋斗。

1937年，芦沟桥炮声把国内外闻名的物理学家萨本栋教授从清华园送到鹭岛之滨，在漫天烽火中，他毅然担当起国立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的职务。摆在这位35岁学者面前的任务是何等艰巨而复杂！他以爱国者宏达宽广而炽热的胸怀，科学家精细严密而

冷静的头脑，战士急流勇进敢于拼搏的身手，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处理一切，他深深懂得应该怎么办。

### (一)

当时形势万分危急，日本侵略者扬言要在三个月内亡我中华，南北两路同时向我进攻，许多大学纷纷迁移大西南，敌机不断轰炸我东南大门，厦门大学受到严重威胁。我们新来的校长临危不惧，指挥若定：一面将师生紧急疏散到当时外国领事馆所在的小岛鼓浪屿上，借用一所教会中学的部分校舍为临时厦大校址，坚持照常上课；一面积极筹划长期备战，决定迁校至闽、粤、赣交界的山城长汀，为东南半壁山河多保全一所高等学府，便于闽、赣、粤、浙、苏几省子弟就学。于是立即开始有计划高速度的迁校活动：图书、仪器设备和有关人员先行；租长汀饭店和附近一带民房为教职员工宿舍；修文庙、祠堂为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室；同时在北山之麓，中山公园周围一大片土地上着手起盖一幢幢新房子，并挖防空洞。同学们在鼓浪屿收拾起书包，越海跋山到汀州，松摩岭的风尘未及拂拭干净，又匆匆整理书包上课了。当大家看到文庙和祠堂改装的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室，窗明几净，满架满架的中外文图书陈列出来了，满橱满橱的仪器整理就绪了，一切必要的教学设备应有尽有，心中无不惊服和感激，原来我们的校长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也是一位出色的行政领导，无声地为我们赢得了一大串的学习时间。

为了使我们的学习、生活条件得到更进一步的改善，萨校长可操碎了心，所有新建的校舍，他亲自设计蓝图，兴建过程中亲自参加监工，屋顶缺少瓦片，他建议选用杉木皮代替。按厦门原

校舍命名以示追思的“嘉庚堂”、“映雪斋”、“驾行斋”等一幢幢新屋落成了，不知费了他多少心血！

新居白天亮堂堂，晚上依旧黑糊糊，只有青油灯闪着如豆的光。又是萨校长他带领几位理工科助教和仪器管理员，把学校准备他乘坐的小汽车发动机拆下来，改成发电机，亲自指导安装电路、电灯，奋战几昼夜，全校有了电灯，同学们莫不欢欣鼓舞！

## (二)

不管校务多忙，萨校长从来没有放下粉笔，他前后为理工科同学主讲微积分、微分方程、无线电、电工原理、交流电路、交流电机等课程，他的专业造诣很深，有独创见解，又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和多年的大学教学经验，什么定理、定律都融汇贯通。上课只带几根粉笔，讲起来，极富条理性、逻辑性，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加上他那工整流利的板书，对启发学生思维和帮助整理记忆都起着很大作用。他的教学方法很科学，每次都布置课外作业3—6题，其中一两题是难度较大的，一定要到图书馆找参考书才能解答。第二次上课时总是用几分钟质疑发难，当场指定助教解答或演算，助教解决不了的才由萨校长自己来解决。这样教课从难从严，又活泼生动，助教与学生都得到提高。考试出题也这样，百分之六十基础题较易，百分之四十就难了，要想满分则难乎其难。但他能鼓励同学上进，期末总成绩总是按提高后的情况计算。考场有一项铁的纪律：“不准交头接耳！”如有发现，虽满分也作废。萨校长临场时亲自宣布后就离开考场，下课钟响后才来收卷。通常是没有一个同学犯规，学生自觉遵守纪律，刻苦求学的习惯已经逐步养成。

萨校长虽然重视延揽名流学者，从严治学，当时是傅鹰教授任教务长，李厚田、谢玉铭、施蛰存等教授都是不远千里来到长汀厦大的，但应战时学校课程特殊需要，某些课程师资不足时，萨校长都不辞辛苦亲临第一线“救急”，所以在战争艰苦岁月里，他又是一个“○”型的代课者。他代过普通物理学、普通制图学、机械制图学等课程。有一次数理系一位教授不能按期到校，他就代了他的课，还利用简陋的天文望远镜，亲自指导学生调节仪器，观察土星和木星的卫星。他曾兼任数理系主任，指导学生选修课程。毕业班学生做读书报告，他还抽空听讲。经年累月的辛劳，我们的校长病倒了，病中仍舍不得放下粉笔，就在家中病榻前挂起黑板，坚持教课。此情此景，当时受过他教诲的同学，至今犹历历在目。

萨校长十分重视基础学科，特别是语文工具科，他认为要搞学术研究，除专业知识本领过硬外，还必须有广泛的基础知识。要求学生除能熟练地掌握本国语言外，还要较熟练地掌握一国以上的外语。文科学生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理工科学生不能没有社会科学知识。所以当时厦大在课程设置上，严格规定国文（一）、国文（二）、英文（一）、英文（二）、中国通史、高等混合数学以及一门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任选一门）是各院系共同必修课程。此外并强调毕业之前还要通过英语特殊考试。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考生自选英语书籍一本，经过考试委员会认可后，通过自学，在三位委员教师面前，就该书范围进行口试；另一种是事先不确定范围，由教师任意考试。这两种方式，学生可以任选一种，报名应试。不少英文基础差的同学很怕过英文关，常有毕业时尚缺英文学分，拿不到毕业证书的，萨校长对这样的同学似

乎无情，但却寄予无限的深情。他曾把英文程度差的同学另编一班，由他自己腾出时间讲授，还请他的夫人黄淑慎给予辅导，效果很好。

可惜还有那么些人不理解萨校长办学主张的深远意义。1942年春，国民党教育部根据他们的申请，指令学校取消了英文特殊考试制度。萨校长很伤心，他说：“历史会证明这样做对我们国家培养人才是不利的。”经过四十年中国历史的正反验证，我们的萨校长关于培养人材的主张是有远见卓识的。

### (三)

抗战期间，通货膨胀，伪法币一再贬值，物价不断猛涨，加以沦陷区在扩大，随时都有成批的江、浙、粤、赣的学生来长汀厦大转学或借读，生员日多，粮食、副食品供应十分紧张，大部分学生已经负担不起逐月提高的膳费。萨校长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团结全校教职工一面尽快为绝大多数学生申请战区膳食贷金，把定额奖励的嘉庚奖学金改变为供应全年的膳食费，和为同学广开勤工俭学的门路；一面派人到宁化等县产米区采购优质廉价的大米、黄豆，到城郊订购红萝卜、蔬菜，并发动家属轮流义务帮厨，反对浪费，做到每个学生每天一粥两饭，不加限量，早上一碟黄豆，午晚各一盘红萝卜或青菜，每周加一大块猪肉，从而保证了学生的基本营养。

厦大虽已迁到长汀山城，仍不免受到敌机空袭的威胁。萨校长亲自设计了地道式的互相沟通和多出口的防空洞，每次空袭警报一来，他都亲自指挥同学疏散，警报未解除，他又首先出来探视师生的安全。空袭时，我们确实希望能见到萨校长，那怕只

是他的影子从洞口一闪而过，知道他平安无恙，也就都放心了。

萨校长关心爱护学生，从新生刚入学就开始。每学年开学一个月左右，萨校长都安排时间对他认为需要面谈的进行个别谈话。谈话不是一般走过场，而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查阅过学生入学考试的各科成绩，听取了主要授课老师的有关意见，然后针对着该生的特点、爱好、最新表现而进行诚恳坦率的开导和帮助。萨校长有惊人的记忆力，经过个别谈话后，第二次见面时，他会叫出名字，甚至脱口而问：“近来还闹胃病吗？”、“家里有消息吗？”、“你还坚持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能救中国吗？那么鲁迅为什么弃医学文呢？”同学们觉到萨校长不但是个知情者，也是知心人，不少同学从而端正了专业思想，更加专心学习。有的更改变了轻文的偏见，重新考虑自己的专长，准备调整所学专业。萨校长关心家境贫寒，和家在战区、沦陷区经济给养中断的同学，热情主动地为他们介绍自助工作。许多无家可归的同学欣慰地感到，厦大就是他们的家，萨校长就是亲父兄。萨校长更加关心病号学生，有个复旦大学刚转学进来的同学，经不起千里奔波，原来的肺病复发了，校医建议必须休学疗养一学期，萨校长知道后，殷勤慰勉，并批示会计室破例退还学杂费。这位同学病愈返校后，萨校长还经常照顾他，当他在撰写毕业论文时，萨校长还抽空指导。至今这位同学虽已两鬓斑白，追怀往事，仍禁不住热泪纵横！

萨校长爱才如饥似渴，发现青年人才，即聘为助教，继续培养，或保送国外深造。今天这些同学有的还留在厦大，有的分聚在清华、北大、复旦、山大或福建师大、福大、以及著名的科研机构、生产单位任教任职，正为社会主义祖国培育“四化”人才。

萨校长十分关心培养学生课外活动的能力，提倡举办各种学会，厦大有二十多个学会，他是每个学会的普通会员，并抽空参加师生各种学术活动。当时厦大的学术气氛很浓，每周末都有一场以上全校性的公开学术报告会。

他也关心学生体育，战时长汀请不到女生体育教员，萨校长介绍了他的夫人黄淑慎当义务女生体育教员。黄老师认真地把增强女生体质当作她的神圣义务，不但上体育课时有理论有示范地教女同学体操和打球，而且每天天一亮就在女生宿舍门口吹哨子，催女同学跟她爬山去。女同学都愿意听黄老师的话，都愿意以黄老师为自己的榜样。

厦大文体活动也搞得热火朝天，几乎天天下午课余时间都安排有院系或班级之间篮排球友谊赛，节日又加上足球、百米、四百米和越野赛跑等，在萨校长倡导之下，教职工及家属也都积极参加。当时中文系的林庚老师就踊跃参加比赛，经济系黄开禄教授常自告奋勇当拉拉队，当他夫人投篮得分时，得意得禁不住把自己的手帕、手杖、帽子都扔到空中去。年老些的如我们历史系主任吴士栋教授也穿着长衫，神采翩翩地活跃在运动场上，当裁判员。这时山城响彻了一阵阵雷鸣般的欢叫声。

正当大家乐开怀时，常常发现萨校长也站在人丛中笑。他好像刚忙过什么来，又要忙个什么去的，总是行色匆匆。他是喜欢体育活动的，可是又不能不埋头于工作中去。看去，他衰老了许多，腰脊骨有些弯了，比嘉庚堂墙上挂的和前任校长林文庆合影中的萨校长真是判若两人！更使人难以想象的，这位校长就是三年前和夫人一起驰骋在清华网球场上手舞球拍、头戴白帽、身穿短裤、英姿飒爽的萨本栋教授。

#### (四)

萨校长事无巨细都能坚持公正原则，不徇私情。教授中有些人背地里号称萨为“杀不动”，意思是说他平素为人，刚正不阿，不畏权势，公私分明，一丝不苟。

战时教授生活也很清苦，萨校长克己奉公，从不利用职权搞些小特殊。他曾明确规定：领导人员或教授不能搞裙带关系，不能安插自己亲属到学校里工作。他自己以身作则，模范执行。他的夫人因学校需要到厦大当三年义务体育教员，不领分文工资和任何津贴。学校派个工友到家里帮助家务，他都未曾接受。萨校长如此廉洁奉公，他人谁还敢讲私情拉关系？

萨校长严格执行招生考试制度，择优录取新生，更是为人所称道。当时驻长汀的国民党某军长曾为他的儿子要求免试入学，亲自登门找萨校长，萨校长严词拒绝。他说：“欢迎你的儿子通过考试录取后来厦大学习。”国民党海军某地司令也曾写信给萨校长，以他的儿子能录取入学为条件，愿将他们造船厂全套机械设备送给厦大。当时萨校长指着这位“慷慨”将军的信对学校其他领导和教师们说：“难道我们可以拿学校的规章制度作交易吗？”

萨校长“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事何止这些。1938年3月29日，长汀各界在中山公园开会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当地保安团团团长第一个发言，他胡说什么福建汉奸很多。萨校长挺身而出，紧接着发言，针锋相对地指出：“福建虽则有个别的汉奸走狗败类，但更多的是民族英雄，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郑成功、林则徐是福建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林觉民、方声洞、陈更新也都是福



建人。今天我们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就要学习民族英雄的革命精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拯救中华民族。”萨校长的话音刚落，全场振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呼声震荡山城，驱散了漫天妖雾。

长汀虽小，却是革命红军的老区，反动势力的黑手时时刻刻想伸进厦大来。我们在长汀厦大学习过四年的同学，都还记得：初到长汀时，黑夜，从图书馆隔壁的监狱里传出一阵阵的镣铐声；清早，女生宿舍门口放着一颗人头，上面盖着白纸，写着黑字“汉奸”；白天，桥头上挂着鲜血淋漓的人头；几根枪杆子押着一群所谓“汉奸”、“土匪”的犯人从桥上走过去。过些日子，厦大一位物理实验室的管理员被所谓“锄奸团”暗杀在郊外梅林里；一位物理讲师被“锄奸团”殴打头部受伤；十多名厦大同学的信件受到非法检查。接着，一批批诬蔑迫害进步同学的黑名单交给学校了，威胁学校开除那些无辜同学；几次省保安处派人来校要逮捕某些进步同学……萨校长在白色恐怖之中，敢于挺身而出，保护学生的进步活动。他说：“我是校长，家长把子女交给学校，教育学生、保护学生就是我的职责，一切学生问题都应由学校负责处理，外界不得加以干扰；如果任意到学校来要求开除学生，逮捕学生，那学校就办不成了。”在校务会议上，萨校长也总是为伸张正义、保护进步师生而斗争，极力反对开除或处分进步学生。更不同意以操行不及格，取消奖学金等手段压制进步学生。萨校长的正义主张，常常为大多数思想正直的教师所支持。但是白色恐怖无孔不入，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总是以各种不同形式存在着。萨校长曾对一位受迫害的同学说：“我这校长随时都有被绑架、被暗杀的危险。”萨校长关心同学比关心自己为

重，他这样说为的是使同学们更加警惕反动派的阴谋。

萨校长在反动势力威逼面前从不低头，对列强帝国主义分子的耀武扬威，也不曾卑躬屈节。

有些同学偏爱传述萨校长怒斥英国学者的事：有一次一名英国教授来厦大讲学，他以强国学者自居，在讨论会发言里侮辱了中国，萨校长奋然而起，义正词严地和他辩论，驳得他哑口无言。事后，萨校长他常用此例教育学生，勉励青年要立志使祖国富强起来，改变被列强轻视的落后状态。

1944年春，萨校长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游历讲学，路过江西赣州时，我们几个旅赣厦大校友赶来欢送。但是萨校长当时的健康情况，实在使见到他的人心里难过。萨校长变得老态龙钟，精神大不如前，也不爱说话了。吃饭的时候，他没有举过筷子，师母说他胃病加剧，好久以来就只能喝些流质、半流质的东西。



1944年萨本栋应邀去美国讲学前与夫人黄浪慎（前右二）及两子（前左、前右）等摄于江西

今天刚好有机会阅读到萨校长于1947年为自己所著的《交流电机》一书的中文版序言，（英文本在1945年于美国加州出版，中文本在194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才知道原来1944年他带病出国讲学时，中国抗战局势危急，湘、桂失陷，国际舆论轻视中国，萨校长感到“在那样环境里，精神的不愉快，远超过身体不好所造成的痛苦。”因而发奋著述，利用一切时机，把七年来在国内所积累的有关教材，重新整理，用英文写成一本《交流电机》，其中不少章节，言前人之所未言。此书许多章节分开来也可以单独成为一篇篇论文。书稿经在美国同行者审评，誉为物理学巨著。此书一出，英、美学者评价很高，加州大学、卡纳理工学院等十几所大学都选作教材。

1946年，抗战结束后一年，我们从报纸上见到萨校长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的记者招待会上揭露美国骗子雷诺的讲话。他以大量的事实和科学道理有力地揭露那个自称是“飞越喜马拉雅山的探险家”、“研究原子能的科学家”，在中国弄虚作假，高价兜售原子笔，欺弄中国人民的美国商人雷诺，实际上是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经济骗子和文化骗子。痛快淋漓地告诉世界：中国人民不再受骗了。

## （五）

1949年春，正当我们翘首云天，遥祝萨校长早日恢复健康、企望着再能听到萨校长科研成就的捷报时，噩耗传来：萨本栋校长因胃癌医治无效，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在美国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肿瘤医院逝世。我们失去了一个最敬爱的导师，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个正直、有为的儿子，世界人类失去了一个忠诚

杰出的科学家。

萨校长的一生结束得太早了！他由于劳累、忧愤、贫困交加成疾，加上贻误了医疗的时机，以致正当壮年就不治而死，使我们不胜哀痛与悲愤！他热爱科学，他热爱生命，他最懂得生命的意义，活着的时候，充分利用了生命的每一分钟，努力做出贡献。他热爱厦大，忠诚于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他亲手把厦大从战火中的厦门搬到长汀，办成富有声誉的东南学府，后来厦大搬回厦门了，他却再也没有再回去过。

现在，萨校长的骨灰已经安放在祖国东南海岛厦门南普陀厦门大学校园里。1981年4月6日厦大校庆时，夫人黄淑慎老师曾万里奔波回校看望萨校长的墓。

安息吧！敬爱的萨校长，您那为人、做事、治学的精神，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以之教育自己的学生和子孙，希望他们学习您，象您那样地做人、做事、做学问，我们深感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多么需要象您这样的人，不管是科学家、教育家……各级各部领导和各行各业工作者，首先都应该是个直正的人。

（厦门大学在榕部分校友：邓 桓、方兴亚、刘以铸、陈 霖、陈 炳、陈宝璋、陈祖芬、陈润辉、陈懿锦、张其昕、林礼教、林泽芬、林逢澍、林春生、杨学耕、罗孝登、郑廷植、黄世芬、黄国英、蔡光周供稿。）

罗隆基回忆录：

## 我在天津《益世报》时期的风风雨雨

### 我担任社论主撰的前后

天津《益世报》创刊于1915年10月10日。创办人是比利时籍来华传教的天主教教士雷鸣远和中国天主教徒刘守荣、杜竹宜。

雷鸣远委任刘守荣为总经理，杜竹宜为副经理。刘守荣字清乡，原籍河北省藁县。他只在私塾读过几年书，民国以后，在乡下教小学，后来到天津，在雷鸣远办的师范学校教书，从此得到雷的赏识。

在刘守荣的领导下，天津《益世报》曾激烈地反对当时安福系和奉系，同时拥护直系大军阀吴佩孚和曹锟。刘守荣因此充当了直隶省议会的议员，同直系的曹锟、边守靖等进行勾结。曹锟贿选大总统成功后，直系论功行赏，刘守荣干了一年的天津电报局长。奉系最后一次进关，打败了曹、吴，“直隶督办”李景林奉奉系之命，逮捕了刘守荣。张学良同时派霍战一等接收了天津《益世报》。天津《益世报》从此由直系的喉舌一变而为“大元帅”的机关报。1928年夏，奉系失败，刘守荣又回到天津《益世报》，担任总经理。

刘守荣复职以后，重整旗鼓，把刘豁轩拉进报馆担任总编

辑。刘豁轩是刘守荣同村同族的兄弟，刚从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刘豁轩在《益世报》任职不久，奉系的霍战一、王子鱼、王小隐等都离馆了，他约了几位南开大学同学如汪心涛（佛生）、赵漠野、唐际清、丁继昶、吴云心等，重新组织了编辑部。但是，那时还有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就是社论。当时国内的报纸对于社论都很重视，天津《益世报》必须有专人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刘守荣为此颇费心思。他通过私人关系，在1928—1931这三年内先后约聘过六、七个人担任撰写社论的工作。颜旨微、董郁青、于复岭、傅立渔、景耀月、茹春浦、顾石君、毛壮侯等人都曾尝试过。这些人的文字虽各有所长，但对国内外一切重大问题都不敢拿出具体的见解和主张来，这就不能满足一般读者的要求。只有颜旨微的文章水平较高，但他的“文体别致”，不能“雅俗共赏”。在无可如何之中，只好较多地采用他的文章。但是，报馆的社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我当时在上海担任《新月》杂志的总编辑，同时从事一些翻译工作。我是清华学校1921年的毕业生，后来留学英、美，研究政治学和近代史。1928年回国后，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任教。我在《新月》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主张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批评当时蒋介石领导国民党的“一党训政”的政策，特别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力抗日；并由新月书店编印小册子，宣传抗日。我的这些言论引起了刘豁轩的注意。经过刘豁轩反复地劝说刘守荣，天津《益世报》就决定聘我担任社论主撰。

我和刘豁轩素昧生平。经过天津南开大学教务长黄子坚从中通讯联系，我接受了聘约。刘豁轩代表天津《益世报》在聘

约里主动提出以下两个条件：（一）在不危及报纸的生命和不反对天主教教义的前提下，社论主撰有完全的言论自由；（二）每月薪金五百元。第一条实际是把天津《益世报》的言论全权交给我了，这表示对我的充分尊重与信任。第二条，用这样高薪聘请一位社论主撰，这在当时一般报馆是打破记录的，这在当时天津《益世报》经济情况下，亦不是没有困难的。然而，在刘豁轩坚决主张之下，报馆还是这样做了。

我在接到黄子坚转来的聘约后，曾把这件事同当时在上海的《新月》杂志的朋友们，如胡适、梁实秋、潘光旦等人商量过。胡适当时坚决反对，他认为报纸社论是每日一篇，是临时应付的东西，不如杂志专论内容比较充实，更可以加强自己研究学问的功夫。同时，给报纸写社论，每天要牵涉到实际政治问题，在言论不自由的中国，容易惹起麻烦，并且随时都可以受到政治压迫。为杂志写专论，这种危险就比较少些。而我自己却以为，我是坚决主张实行民主政治的，是主张武力抗日的，在报纸上发表这类文章，比在杂志上的影响更大。因此，就坚决辞去了《新月》杂志总编辑的职务，于1932年1月间离沪北上，就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撰。

我在1932年1月12日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的第一篇社论，题目是《一国三公的僵政局》，开始抨击国民党内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三个人派系之争，讽刺国民党所吹嘘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指出当时实际上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僵政局。1932年1月26日，在淞沪战事爆发以前两天，我发表了题为《可以战矣》的社论。这就是天津《益世报》主张对日武力抗战的开始。从此以后，天津《益世报》的社论对蒋的独

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

天津《益世报》主张对日抗战、反对蒋介石独裁的言论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销数不断增加，而蒋政权的御用文人和政客却恨之入骨。在“塘沽协定”签字以前，陈布雷跟随蒋介石到了保定，召集北平、天津几家大报的负责人开会，《益世报》的刘豁轩也去了。陈布雷在会上气急败坏地说：“现在主张武力抗战，简直是没有人心的！”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特别以两眼望着天津《益世报》的代表。至于教会内的一部分上层分子，对于《益世报》的言论也认为是“大逆不道”。于斌此时刚从欧洲返国，有人向他提到天津《益世报》时，他用讽刺的口吻说：“天津《益世报》是教外人办的，是给教外人看的。”国民党的极右翼分子和汉奸之流，更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来对付天津《益世报》，必欲去之而后快。于是一系列的“麻烦”就连续发生了。

1933年初，当我同天津《益世报》第一年聘约期满的时候，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和河北省党部“双管齐下”，出面干涉，要求报馆不得续聘。刘不同和卜哲民两次找刘豁轩谈话，刘豁轩当时适在医院养病，置之不理。聘约继续一年。

1933年6月，蒋政权同日寇签订定了“塘沽协定”。天津《益世报》连续发表了社论，说蒋政权是“对外屈服，对内欺骗”。当年冬季，福建事变发生，李济深等人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主张联共抗日。《益世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支持福建人民政府联共抗日的主张；同时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对福建事变和平解决。对“塘沽协定”和福建事变这两件事的言论，进一步引起了蒋政权的仇恨。国民党天津市党部首先提出“严重警告”，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来电报“警告”。他们都要天津《益



世报》立即把我辞退。同时，他们还间接派人同我联系，要我自动辞职，到南京政府去工作。

1933年底，当我的第二年聘约期满以前，国民党市党部先发制人，向天津《益世报》提出“最后一次警告”，要求报馆不得续聘。那时华北的局势比以前更为恶劣，日寇不仅整个控制了东北，并已占领了热河和察哈尔北部，特务、汉奸异常猖獗。天津《益世报》审度情势，觉得我这个目标已经太大，同敌人的利刃相距过近，再继续下去，不只报馆要随时发生危险，对我本人的安全也极为不利。通过报馆负责人与我协商，双方同意，第二年聘约期满后暂不续聘。

我离职以后，天津《益世报》有一个时期没有专人写社论。报纸销数急剧下降。随后报馆又请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继任社论主撰。钱端升写了一系列的社论，抨击日寇在东北制造伪“满洲国”，反对关内外通车通邮，反对“冀东特殊化”，特别是抨击“亲日派”的黄郛和他手下的汉奸殷汝耕、陶尚铭、殷同等。这些社论都是钱端升同刘豁轩共同研究之后写的。蒋政权为了获得日寇的欢心，对天津《益世报》来了一次清算。蒋介石以总司令的名义，于1934年7月通令全国，停止天津《益世报》对邮政和电报的使用。最初因得到当时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默许，报纸仍照常出版，天津市仍照常发行，外地则由转运公司整包发出去。不到半个月，蒋又发来电报，说“全国各地如再发现天津《益世报》，唯当地军政长官是问。”于学忠把蒋的电报给刘豁轩看，并说明他处境的困难。天津《益世报》从此一份也不能出意（意大利）租界了。又继续出版了几天，印出的报纸在院子里面堆积如山。报纸实不能再继续下去，于是就完全停刊了。

报馆的某些“董事”认为事态严重，他们不只害怕每一天的金钱损失，还怕永远不能再复刊。刘豁轩想召开一个董监事会，研究处理办法，但没有人敢到报馆来开会。他打电报给安国县的雷鸣远，向他报告停刊的经过，并请他来津主持，雷连回电都没有。刘豁轩不得不冒险跑一趟南京，而南京亦无人敢管。他便同《益世报》驻南京特派员赵漠野一同去庐山。刘豁轩到庐山后，首先去见蒋的“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说明天津《益世报》发表的言论，是激于民族义愤，出于爱国热情，丝毫没有触犯“危害民国”的法律。杨永泰气势汹汹地给天津《益世报》扣上了一顶“罪大恶极”的帽子，不肯再往下谈。陈布雷也历数了天津《益世报》“反抗中央政府的政策”、“破坏国家的统一”、“勾结共产党”等等“罪名”。杨、陈二人都叫刘豁轩去见黄郛。黄摆出了十足的官架子，避而不谈实质问题。黄也不说“抗日、反蒋”是有罪的，只是立即端茶送客。刘豁轩因为不得要领，隔了两天又去见黄。黄又推托说，到北平后再研究。那时黄正准备第二次回北平。刘豁轩估计短时间没有解决希望，就同赵漠野取道南京回天津。钱端升在刘豁轩返津以前已经离开报馆，回清华大学教书去了。

三个多月以后，黄郛到了北平。还是经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张校长那时兼任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和新任天津市长张廷谔（张是刘守荣的朋友）向黄疏通，才有条件地解除了对天津《益世报》的禁令。黄郛要报馆聘黄的私人秘书朱枕薪任社论主撰。朱当时在北京办一个小小的通讯社，附带翻译一些日本报刊上的文字，到处乱送。他凭借懂得一点日文，经常奔走于京津日寇、汉奸、和小军阀、小政官之门。因为黄是以聘朱为解除禁令

条件的，报馆不能加以拒绝。朱枕薪也有自知之明，始终没有到报馆工作，只不断写些文章派人送来。朱写的东西大部分是反共反苏的，只有最初的三篇报馆给发表了，其后陆续送来十几篇，刘豁轩都未予发表。不到两个月，刘豁轩以朱的文字能力太差为理由，向张廷谔提出，要把朱辞退。张要报馆一次付给朱全年的薪金（每月三百元），刘立即答应照办，问题才得到解决。

天津《益世报》辞退朱枕薪后，在黄郛主持华北政权的形势下，不可能立即延聘一位适当的社论主撰。在无可如何之中，报馆只得临时约请几位大学教授轮流写些关于国际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文章，以填补社论的篇幅。我当时仍在南开大学担任教授职务，也偶然写些文章，用另一笔名在社论栏中发表。后来黄郛离开华北，宋哲元掌握了平津的政权。日寇进逼，平津的形势越来越险恶了，汉奸卖国贼更加猖狂而阴险了。在这样一个紧急危险关头，天津《益世报》决定再聘我回报馆担任社论主撰。关于重回天津《益世报》这件事，我曾通过私人朋友的关系，得到了宋哲元的谅解。

1936年初，刘豁轩因病请求离开报馆，雷鸣远就以董事长的名义派李渡三继任报馆总经理。李渡三同山西的阎锡山军阀集团早有勾结。他利用阎锡山的势力，对馆中原有人员，大事更动，以安置自己的私人。结果报馆业务方面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常常闹到雷鸣远跟前。到了1937年6月间，雷鸣远忍无可忍，命令李渡三交出总经理的职务，离开报馆。李渡三拒不受命。雷鸣远于是派他的一个名叫生宝堂的学生，突然于某日深夜到馆，带同馆中反李的职工们，共同将李强行驱逐出馆。

生宝堂是留学法国的学生，亦是天主教徒，原是北京《晨报》

经理。我曾问过他，何以不怕麻烦，亲来天津演此“夺印”趣剧。据生宝堂说，雷鸣远风闻李渡三在天津与日寇往来颇密，且有用报馆名义领取日寇津贴之事。生宝堂激于抗日义愤而出此。

生宝堂暂代总经理职务后，正从事整理报馆人事和经济的时候，天津沦陷了。平津报纸，或者停刊，或者为汉奸伪组织所接收。这时候生宝堂同我约集馆中同人，商议停刊还是继续出版的问题。馆中同人一致认为，我们今天虽然处在敌人的势力之下，但一息尚存，就应继续为中国的抗战呼吁和宣传。于是决定每日继续出一小张，报告平津抗敌的消息。每天清晨送到意租界和法租界之间的万国桥去发卖，经常被抢购一空。这样又持续了将近二十天，直到报馆经理生宝堂为日军绑架杀害，我于次日逃离天津，南下参加抗战工作，天津《益世报》才于8月20日停刊。

## 两次逃过鬼门关

1933年6月1日，“塘沽协定”签字，6月17日，所谓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就宣布正式成立了。这个华北政整会表面上隶属于南京蒋介石政权，实际是事先得到日本军部的同意和批准的。事实还不很明显吗？在一两个月前，南京蒋介石政权就宣布派黄郛来华北筹备所谓政整会。黄郛就用这个名义到华北同日本进行秘密外交。在黄郛由南京赴北平路过天津的时候，曾要他的一个随从在天津下车访问我，希望我谅解，不反对“塘沽协定”，我拒绝了。在华北政整会成立的同一天，天津《益世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说这个伪组织是“先行交易，择日开张”（1933年6月17日社论），指摘这个政整会是卖国机关，先行卖国的交易，而后才敢挂出这面卖国机构的招牌来。《益世报》这类社论当然是蒋

介石政权所痛恨的。

蒋介石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就继续不断地给《益世报》警告，要《益世报》改变态度，或撤换社论主笔罗隆基。同时，他们亦直接或间接地向我提出过威迫利诱的交涉。报馆负责人和我本人都没有接受这些警告和干涉。

1933年秋季某一天的下午，我的一个名叫潘子欣的朋友，突然派一辆汽车把我接到潘的另一个朋友家中去，秘密地告诉我，蒋介石已派四个特务到天津来暗杀我，劝我立即离开天津，以保安全。

当年潘子欣在天津，就等于杜月笙在上海，他是有帮会关系并且是一个有势力的人。蒋介石的特务到天津来为非作歹，必定要事先去拜望天津这个码头头子的。据潘说，那四个特务到津后，就去拜望潘子欣了，并且告诉他，说他们是奉蒋命到天津来暗杀罗隆基的。潘即答复四个特务说：“我不认识罗隆基，事情先让我考虑一下，再行答复。”据潘说，这就留下了潘通知我躲避的机会了。

我在1932年到津后，就同潘子欣认识了。潘子欣是苏州一个世家出身的人，为人颇富侠义之气，他亦同意对日抵抗的主张。潘子欣同我有些交谊。他不同意蒋介石用这种残酷卑鄙的手段，杀害手无寸铁的一个书生，所以就决定事先暗中通知我，及时躲避。

我得到潘子欣的通知后，认为立即离开天津，倒不是安全办法。“我能往，彼亦能往”。在离开天津的路途中，倒随时可遭毒手。于是我就在家中闭门不出，白天不去南开大学教课，夜间不到《益世报》馆办公，以观动静。一星期后，潘子欣又到我家

中来说：“事情已经解决了。我已告诉特务说罗是我的好朋友，我已劝罗今后写社论应采取较和缓的态度，我亦将电蒋公请对罗多加原谅。我要他们回京去复命。他们已答应了。此事可告一段落。”

我听了潘子欣的谈话后，亦以为事情解决了。于是每日照常工作。潘子欣的确没有欺骗我，这次却是蒋介石的特务欺骗了潘子欣。四个特务仍留在天津进行他们的暗杀勾当。

过了三天，当我正要离家去南开大学上课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问“罗教授今天来上课吗？”我答：“是的，我来的。”我接电话后，即起疑虑，学生何至用电话询问教授是否来上课呢？我随后立即用电话问南开电话总机，是否有学生向我打过电话，答复是“绝无其事”。我就更加疑虑，更加警惕了。我当即放弃自备汽车，改乘报馆中汽车去南开上课。因报馆汽车同我自备汽车的牌号不同，以为可以避免特务注目，同时报馆中汽车司机技术较为熟练，紧急时或更能躲避。是日，我有意地避免走经常的道路，而绕道经八里台、海光寺的小路去南开大学。这条路极为窄狭，右边是小河，左边是陡坡，两车不能并行，我以为比较安全了。

当我的车快要到南开大学校门不远的地方，在窄狭的马路上迎面却来了一辆敞蓬大卡车。司机就说：“你看，这样窄的路，怎么能对面通过两辆汽车呢？”司机就赶紧想把自己的车开到较宽的地段去让对面来的卡车过去。但司机这句话却引起了我的警惕。我向前一望，果见敞蓬卡车上站着四个穿制服的壮汉。两车快到接近的时候，我已瞧见那四个坏蛋拨出手枪，迎头要放的模样了。我心中明白了，就立即平卧在车中坐位前面的空隙。说时

迟，那时快，特务们迎面对准座位接连开了十余枪。司机惊慌地说：“这是干什么？”我马上说：“快走，不要理他们，这是南开学生运动员闹着玩的。”司机回头一望，见车背后玻璃窗满是枪孔，又说：“哼！这样闹着玩？”然而这时两车已相对开过去了。路途狭窄，卡车无从回头，而我的车已开进南开大学的校门。我仍保持镇定，照常上课。课后，我始将途遇经过报告校长张伯苓，并请张看汽车上的枪孔。张立即答应以校长名义，一面向天津市长报告，一面用电报向蒋介石报告。据说，同日夜间，胡适在北京闻此消息，亦有电报向蒋介石表示抗争。当日晚间津市马路传闻，则谓罗隆基已身中十余枪而毙命矣。实则我当日下午改乘有篷人力车安全返家休息了。第二天清晨，京沪友人致我的家属的节哀应变的悼电已纷纷而至。我阅读这些悼电，真是啼笑皆非。

第二次遇险，是在天津沦陷以后不久。

那时报馆总经理生宝堂住在意租界报馆中，我住在英租界。意租界同法租界之间的万国桥是“三不管”地带，亦是生宝堂每日到英法租界办事、我到报馆办公必经之地。1937年8月的一天，生宝堂电话约我去馆商议重要事件。我乘自备汽车行到万国桥头，即被一个旧时同学拦住。他告诉我万国桥上目前正有日兵驻守，检查行人，此时过去，恐有危险。我即邀这位同学到附近的新华银行午餐聊天，等待日兵撤岗后再去。我到了新华银行后，即用电话通知生宝堂，不意他因候我许久不来，已乘报馆汽车到英租界去了。我用电话四处探询他的行踪，回话都说“生经理未来。”等到下午四时，万国桥上日兵撤岗，我冒险到报馆去，馆中人都说生经理到英租界去了，尚未回来。等到下午六时

左右，报馆的司机回来了，满面流血，衣服破烂。他说，生宝堂在万国桥上被日寇绑架去了，放在一个水牢中。并说，日兵详细探问罗隆基的相貌衣饰和自用汽车号码，司机劝我千万不要再过万国桥。我一方面为自己的虎口逃生感到庆幸，一方面为生宝堂的安全担忧。我随即转到意租界的一位友人家中去，呆到深夜，然后乔装打扮，借用友人汽车，通过万国桥回到了英租界家中。第二天清晨，我搭汽轮离开天津，经青岛转到南京。

1945年日寇投降后，我又回到平津，再探询生宝堂的消息，才知生宝堂已经殉国十余年，他的法国妻子带领三个孩子已回法国去了。凡是认识生宝堂的人，谈到他的被敌人残害，无不为之唏嘘叹息。认为他是抗日战争中许多无名英雄中的一个。

### 与胡适的一场辩论

1936年6月9日，我为天津《益世报》写了一篇题为《国人制裁内战》的社论，其中有一段文字引起了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反对。那段文字是这样的：“在今日，我们是无条件反对内战的。用抗外做题目与中央发生内争者，我们不能同情。我们完全注意事实。今天中国任何区域能够保存一分力量，即应爱惜此一分力量供国防之用。倘与外力无实际接触机会，仅仅在抗外招牌底下轻易地消耗这一分力量，而消耗的方法是同时把国家另外的国防力量抵销一部分，这不是爱国的行为。这种行为，我们不能苟同。”这一段话很明显，是指摘当时的两广事变的。社论又说：“另一方面，时到今日，‘统一’两字亦不是中央政府进行内战的好题目。国家固应统一。形式的统一，今日已经存在，不必多求。精神的统一，又非武力所可强求。在统



一问题上，我们亦注重事实。对外守土与对内统一，倘不能同时并举，中央应放弃对内统一，从事对外守土。倘能做到对外守土，即能促成对内统一。对内统一，能够加强对外守土力量，此说固亦言之有理。倘因对内统一贻误对外守土，统一未成，国乃先亡，当局这种过错，国人亦不能轻易原谅。这又是一点。根据这两点理由，我们今天是无条件反对内战。”

胡适是不赞成我们这种主张的。他在同年6月14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一篇《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论文，批评《益世报》这篇社论，并且说：“这种逻辑，我们不能了解。我们反对内战，也反对用统一的招牌来挑起内战，但我们不反对一个中央政府用全力戡定叛乱。今日两粤的将领如果不明了全国舆论的向背，如果他们真要掬着抗外的题目作推翻中央政府的叛乱行为，我们当然应该主张中央明令讨伐。”他在文章中，一再追问《益世报》的社论，是什么逻辑。

我就在两天后（6月16日）发表了一篇《我们的逻辑》的社论答复胡适。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国从辛亥革命后二十五年的历史，所谓的中央政府都是掬着统一的招牌，从事争权夺利的内战，放弃对外守土的责任，以致国家领土日见缩小，国家主权被侵犯，到今天统一未成，而外寇又已深入，此真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文章又举十九世纪德国的俾斯麦和意大利的加富尔都用对外战争而完成了普鲁士和意大利的统一，做“攘外即可安内”的先例，说明我们今天主张无条件反对内战的正确性。

社论接着又说：“其实中华民国历史上最大的叛乱莫过于满洲伪国的建立。在伪满独立的时候，我们坚决主张中央政府全力戡定内乱，那时候胡适先生却持所谓的稳重态度，认为主张武力

收复东北者为唱高调。满洲伪国背叛中央，殷汝耕小丑跳梁，背叛中央，倘中央已实行全力戡定内乱，今天国人对两广事变或另有一种看法。在东北和华北的某些更严重的叛国行为上，中央不敢实行武力戡乱，而胡适先生等亦没有敢于主张武力戡乱。到了今天东南两广事件，胡适先生等却大声疾呼，武力戡乱，中央明令讨伐，这就未免轻重倒置了！”

社论又说：“今天日寇所求者正是中国永远陷在内战中。只要中国陷在内战中，即成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局面。胡适先生今天坚持中央武力戡乱的主张，不管动机如何，实际只有造成内战的结果，这就正堕入敌人的计中，适之先生以‘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劝人，而其所说正要造成‘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后果。”

社论的结论说：“我们不袒护叛乱，我们亦不藐视中央，我们袒护的是和平，是一致对外，我们藐视的是内战，是分裂，是亡国。这逻辑错了吗？原谅我们，倘这逻辑能补救中国千万一，我们愿一错到底。”

到了6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也发表社论，为胡适帮腔，攻击天津《益世报》。《益世报》在6月26日发表了《我们立场的解释》的社论，立即予以驳斥。

这场笔战以后，在1936年6月底的一天早晨，胡适突然到天津我的家中来了，他笑着对我说：“我看了你的《我们的逻辑》那篇大文章，也看了你答复南京《中央日报》的那篇社论，文章写得不坏，不过……”没有待他说完，我就马上说：“适之先生，你有什么指教？”胡适说：“不是什么指教。从前我们办《新月》杂志的时候，我们在文章上有不同意见，彼此总要交换

意见，谈谈清楚。现在我也要提出一两个问题来同你谈谈。”

在谈话中，胡适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主张攘外即可安内，你提出德意志和意大利等国统一的先例。你当然知道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的故事，你当然知道当年列宁变世界战争为国内革命的故事。对这点，你有什么意见？你相信中国共产党不会在抗日的中途把中国的抗日战争，突然变成国内的阶级革命的战争吗？”在这个问题上，我同胡适又有相当长的舌战，我一再坚持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同今天中国的抗日战争，它们的本质完全不同。我一再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这种战争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反对的，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所反对的，是各国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所反对的。今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是如此，性质根本不同。我说：“今天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全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抗战，是中国整个民族生死存亡关键的战争，最要紧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战争。共产党为什么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知道中国全国人的要求，是知道人心所向的。而日本又打着帮助中国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欺骗招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会也不可能中途变抗日战争为中国阶级革命的战争。假使中国共产党真这样做，是中国共产党欺骗人民。中国共产党不会这样干，倘使中国共产党这样干，他们是背叛人民，是自取失败。”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当然有他不同的看法。他总是笑着说：“你有什么保证？你有什么保证？”

后来，他又转到这样的问题：“没有准备的抗日，轻言抗日，抗日必败。”他是抗日的悲观论者。我就反问胡适说：“今天的日本侵略者会容许中国的准备，等待中国的准备吗？只有在

抗战中锻炼中国人民，团结中国人民，这是最好的准备。”我进一步又说：“只有抗战才能团结中国人。中国最难得的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只要蒋介石停止‘剿共’和一切的内战，中国就团结了。这样的抗日战争固不能保证不败，但团结抗战不幸而败，败也光荣；倘兄弟阋于墙，不能外御其侮，这样的失败，我们是千古的罪人。”

谈到此处，我虽不相信已经说服了胡适，不过胡适笑着说：“好了，好了，你宣传你的联共抗日吧，我们各人的腹中却是阉于肚了，想法饭吃去吧！”于是就暂时将很长的辩论告一结束，留胡适在我家吃便饭，以后彼此见面，没有再提及这个问题。

### 会见蒋介石的一幕

我是1928年从美国回国的。我在上海几个大学教书，并主编《新月》杂志，直到1932年来天津担任《益世报》社论主笔，从未同蒋介石见过面或同他的政权有过任何关系。在1928年我回到上海的时候，当时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曾函胡适，托胡代约我去南京晤谈。据胡适说，戴有约我到考试院任职的意思，因我在英国曾研究过英国的文官考试制度。我拒绝到南京去，理由是，我不赞成当时国民党所标榜的“党外无党”的统治，更不赞成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我留在上海主办《新月》杂志的时候，就写了许多篇文章，批评蒋介石政权的“党外无党”的独裁统治。由于这些文章，在1930年的时候，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布雷以部的名义勒令光华大学解除我的教授职务。以教育部名义勒令大学解除一个教授的职务，这在当时也是创举。不久，我又在中国公学被蒋政权的特务逮捕入狱。后来我被胡适和宋子文两人保释出狱。

后，陈布雷又通过中国公学校长马君武同胡适约我去南京会晤，并商谈去南京任职。我又拒绝了，宁愿留在上海从事翻译，以维持生活。

1933年，我正在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撰的时候，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曾养甫（亦是留美学生）通过我的私人好友时照运、何浩若两人的介绍，邀约我到南京晤会，并事先说明目的是消除当时南京政府对天津《益世报》的隔膜。我抽空到南京去了。在我第一次同曾养甫见面的时候，时照运、何浩若两人都在座，曾即说明，倘使我愿填写志愿书加入国民党，次日即可同蒋介石会晤，至于是否仍在天津《益世报》任职或调任南京其它工作，待蒋同我面谈时再行决定。我当即答以入党事关重大，需要时间考虑，婉词拒绝了填写入党志愿书。我没有同蒋介石见面就又回到了天津。

1933年，南京的特务在天津对我进行暗杀未成后，蒋介石又通过胡适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两人邀约我南下同蒋面谈。我因报务甚忙，未能立即南去。待到1934年我已离开《益世报》后，始到四川峨眉山去同蒋介石见面。

我到峨眉山后，蒋介石指定由峨眉军训的教务长陈诚招待。陈诚陪我游峨眉山数日，陈并力言蒋对抗日确有决心，并说这是峨眉军训的目的。陈诚也向我表示，他自己的唯一志愿即在抗日，待抗日胜利后，他自己亦要弃武修文，专心读书，共享富强中国的太平。陈并且表明，蒋这次约我南来，希望我在峨眉多住一些时间，向蒋介石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国家的战时行政情况。我亦欣然应允了。而后蒋介石才约期同我见面。

蒋介石第一次同我会晤时，即向我说：“听说你在天津曾受

过一次惊。”他装着不知其事的内幕似的，接着又说：“哼，哼，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而后再就峨眉的历史和风景谈了一阵，要我在峨眉多住些时候，向峨眉的军训讲几次话，并同他谈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的战时行政。我都同意了。初次见面，我同蒋的谈话就没有触及抗日问题。因为在陈诚同我游峨眉的那几天，他已一再代蒋向我说了许多决心抗日的话，是真是假，这只有待事实来证明，绝无当面同蒋来争执的必要。

那次我在峨眉整整住了一个月。招待的确相当周到。每日下午四时向蒋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等国家的战时行政组织，此外向在峨眉受军训的队伍公开地作了几次演讲。待我要离开峨眉北返的时候，蒋要我先到江西去参观熊式辉“肃清共匪后”的所谓建设。这是当时熊式辉大事宣传的事情，并要我从江西再北上时，到河南刘峙那里住一个时期。蒋知道刘峙幼年是我父亲的学生，我同刘峙有师兄弟的关系。这些我都答应了，并且遵照他的意见办了。只有当蒋问我今后愿在那方面工作时，我坦白地回答说，我没有参加实际政治的才能和兴趣，仍愿意回南开大学继续教书并从事写作。蒋仍以习惯的口音“啊！啊！啊！”几声之后，同我告别了。至于吃了一顿饯行饭，送来一点程仪，那是例行的事，就值不得在此罗嗦了。到了南昌同熊式辉见面的时候，以及在开封同刘峙见面的时候，这两位省长都提出了我以后工作的问题，并且一再表明了“蒋委员长”寄望的好意，我一再以书生只能并且只愿教书为理由，婉词回答了。后来传闻蒋对刘峙不能劝我这个师弟加入国民党，有所指摘。真象到底如何，亦就不知其详了。这就是我同蒋介石见面的经过。

我回到天津后，不久又回到《益世报》的社论主撰职位，并

且回到南开大学教书。1937年中国展开了抗日战争以后。我南下参加了抗战工作，并且做了蒋政权抗日时期参政会参政员，同蒋介石见面的机会就比较多了。

## 我的幻想

1935年，共产党举行了陕北瓦窑堡会议，进一步号召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月，共产党发出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并且向全国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共产党早在“九一八”事变时期就提出过这样的号召，我一直是赞同并且拥护中国共产党这种号召的。蒋介石这时候又妄以为他在华中湘鄂赣浙等省所谓的“剿共”取得了胜利，现在又要从事所谓的西北等省的“剿共”，而蒋介石政权就愈来愈走上了当时德国希特勒的道路。我在《益世报》发表了《希特勒意欲何为》的社论（1936年9月16日）。社论公开地说：“我们反对共产主义，我们更反对法西斯主义。”并且进一步说：“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其危险更在共产主义之上。希特勒认为世界各大国先后为民主主义所摧毁，因为民主政治必趋于无政府之一途也。这说明希特勒不仅反对共产主义，并且反对民主主义。”这篇社论中充分暴露了我当日思想上的彷徨，我自以为左右为难，而内心深处还是英美资产阶级所谓的民主那一套。

当时西班牙内战正在高潮，苏、法两国支持西班牙的左派，即当时的政府势力；德、意两国援助佛朗哥领导的所谓的革命力量。1936年9月间，英国伦敦大学艾温斯教授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演时，就有这样一段话：“西班牙现在是共产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目前形势仿佛全世界划分成两个壁垒，不左即右，好像

没有第三条出路似的。”但这位教授又说：“英国不会采取共产主义，亦不会采取法西斯主义，它自有它的历史和文化，必就其所原有者向世界贡献。”于是我就在《益世报》发表文章说：

“英国不接受共产主义，也不接受法西斯主义，它要用它的文化和思想向世界贡献。这些文化和思想是什么呢？那就是英国传统上所说的民主。”社论还继续说：“要英国人把六百多年历史传统的议会制度取消，要美国人牺牲他们的政治思想、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不是件容易事。”于是社论就认为只要英国的民主主义的最后堡垒不被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攻破，民主主义就可以长存，在主义上就还有第三条道路。

到了1936年12月4日，我在《益世报》社论中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了：“中国应站在什么阵线？”社论分析国际形势，认为左方是人民阵线，右方是国民阵线。谈到中国的处境，我认为，“我们的东方邻邦是国民阵线的主要分子，我们的北方邻邦是人民阵线领导的国家”，而国内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冲突，又是左右之争。那末，我们怎样能逃避西班牙目前内战的劫运呢？社论的答案是这样：“世界依然还有几个强大的国家，他们还没有正式卷入这两个阵线，这就是欧洲的英国，北美洲的美国。他们自有他们的主义，他们的主义就是民主主义。英美的民主主义是不至消灭的。说不定，英美的合作可以另成一阵线，即成一个民主阵线。”这个阵线就是我心目中向往的第三条路线。于是社论说：“我们的意见，民主阵线或者是中国目前比较平稳的出路。英美的民主政治，是各党并存，平等参政，并且用和平方式转换政权的政治。如此，则国内左右阵线的冲突或可平息。”社论又说：“能免去国内阵线的冲突，就能避免卷入国外阵线的漩



祸，真正的民主政治是中国目前政治上安全平稳的出路。”

天津《益世报》这种社论表现得很清楚，当时我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维护英美式民主的。我却没有懂得英、美同当时的德、意、日都是资产阶级独裁专政的国家，形式虽有所不同，本质是一样的。第二次大战的结果，德、意、日法西斯轴心被击败了，社会主义国家增多了，英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然会走上反马列主义、反共产主义的道路。人类社会发展阶级斗争只有两条道路，非左即右。中间路线，也即所谓第三条路线，是没有的。那只是我的幻想。今天国际上客观存在的现实，不正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吗？

1965年8月

## 我的创作道路

草 明

1913年，我生于广东省顺德县桂州乡的东村。我出生时，顺德县是个盛产蚕丝的地方。我们乡下除了缫丝厂，便是桑基和鱼塘，间或种些香蕉和甘蔗。在桂洲乡，我没有看见过稻田。

我父亲原是中农，小时候随我祖父在家种地，后来考上了秀才、举人，当了清朝的官吏。但因他没有买房置地，辛亥革命后，他生活无着，潦倒贫困不堪。我出生时他已六十多岁了。他把衣服、首饰、字画典当完了，便撇下我母亲和我们兄妹数人，溜到省城里当幕僚混饭吃去了，一年只回来一两次。

我母亲是雇农的女儿，九岁时为了弟弟治病，被卖给省城许家做丫头，后来嫁给我父亲当姨太太。她享了几年“福”，生下一大堆小孩子之后，便过起了贫穷、负债的生活。幸喜她是贫苦人家出身，学得一手好针线活，就靠着她的一双手，和一颗操碎了的心，把我们兄妹拉扯大了。

因为家贫，十岁以前我没有上过学。我母亲本想叫我去学缫丝，但是那时丝业已衰落，而且我家交不起拜师傅的礼（一只金戒指、一套香云纱衫），我的个子又太小，上不了机架。只好一面教我做针线活，一面要我那个念私塾的哥哥教我认字。我母亲自己也学认字。她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命运，就常常给我灌输女人

要独立生活的思想，并曾希望我将来当个乡下的接生医生或小学教师。晚上，在煤油灯下，她一面做针线活，一面听我哥哥给她念唱本《笔生花》、《西游记》之类的书。我也参加听，听完以后，悄悄找书看。那时虽然只认得十分之二三的字，但因为听过念故事，大体上的意思还是懂得了的。以后便大胆地阅读《东周列国》、《封神演义》等等，以致逐渐把那只旧书箱里的书全都生吞活剥地啃了个遍。我十一岁时，才上小学一年级，只读了半年，老师叫我上二年级；又读了半年，我母亲病倒了，口中吐一盆一盆的血，从此起不来床。我只好辍学回家侍奉她。大约过了一年多，当我十三岁时，我母亲便去世了。缺了这支顶梁柱，父亲又管不了我们，于是我们兄妹数人，常常以稀粥充饥。我们能够勉强活下去，还得感谢我们的一位堂姑姑的经常帮助呢。直至我十四岁那年，我父亲意外地得了一笔酬金，便在省城租了两间房子，叫我去读书。他之所以要培养我读书，是根据给我看相，发现我的无名指下有条直直的笔纹，说我将来是个女秀才。但是后来我发现许多人的掌上都有这条笔纹。到了广州，我考上了广东省立女子师范附属小学的四年级。那时我认真读书，得了许多奖品。第二年，我便又跳级考上了该师范学校的初中一年级。但是，这时我父亲的钱用光了，他又迁回乡下去（不久便去世），我只好寄居在一个基督教徒家里，由我那位在银铺当学徒的哥哥供我读书。他的微薄工资分一部分给我，他的生活就很艰苦；我哩，当然更是一个穷学生了。由于我母亲鼓励我独立生活的思想的影响，和艰苦环境的磨练，我发奋读书，成绩不坏。我决心高中毕业后当上个小学教员，于愿已足。那时我是一个不问政治、连报纸也很少看的“品学兼优”的学生。

我们学校有个图书馆，藏书颇多，课余我常借些书来看。五四时代的作品，大大不同于我乡下的那只书箱里的旧书；鲁迅、茅盾等大师的那些书的内容，向我提出了国家的忧患、人生的目的、自由、爱情、道德等问题，一古脑儿都扑向我的脑袋里来了。特别是《伤逝》给我的触动最大，女人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我找不到答案，于是我茫然、忧郁和苦恼。我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社会一片漆黑，政治风云万变，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动荡的年代。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地方军阀连年内战；外侮欺凌，反动统治不敢抵抗，却搞“攘外必先安内”的法西斯措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九·一八”一声炮响惊醒了我。日本军国主义竟侵占了我东三省！那儿的同胞在受苦受难。过去上地理课的时候，觉得东北离开我们广东很远很远；这时，东北同胞却像是我的邻居一样近。我很想去那里，并为那儿的同胞做点事。我们学生都义愤填胸，想为东北同胞尽点力。到了“一·二八”时，抗日爱国浪潮已席卷全国，我便参加了学生下乡的爱国宣传队的活动。我从一个书呆子一跃变成了一个宣讲战士。我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这时宣传敌人的残暴、东北同胞当亡国奴所受的苦难，讲得听的人流泪，我自己也流泪。我这时的思想，浸沉在爱国和为中华民族雪耻的境界里了。

突然，蒋介石下命令不许宣传抗日，要学生通通返校读书。我的思想和许多同学一样，对当局的反动措施有很大的抵触。此时，我对民族的危亡，对敌人的憎恨，再加上对统治者的厌恶，百感交集，心情十分急躁，不知该怎么办好。我们的班主任思想比较进步，他在上语文课时，因势利导，分析统治阶级的腐朽本

质，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把我们这批青年由单纯的爱国思想引向深入，去思考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必须进行革命的道理。我听的又新鲜，又惊奇，从此心中又充满了希望，忧郁和彷徨也逐渐远离开了我。

思想的进步必然带来实际的行动。我上高中时就开始写小说了，那时写的不过是反封建和写男女青年纯洁的爱情，但从此时起，我转向写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了。少年时代乡下缫丝女工的苦难生活，和她们的倔强斗争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升华起来了。进步作家欧阳山办了一个专门给工人和劳动者看的刊物《广州文艺》，邀我参加，于是我参加了这个地下刊物的工作，写了《万胜》等篇。我从写稿、校对到出售工作都干。由于这个刊物不能公开，所以我用了草明这个笔名，将“萌”字拆开，表示我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这个时期，我写的都是缫丝女工的生活和斗争。南海中学的教员龚明、学生易巩和我的同学伍乃茵也陆续参加进来办报了。过了许久，这个小报被查封，我们又换了个刊名再出版。

参与办刊物不久，我还参加了何干之所发起的秘密读书会，学习研究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入门。我的许多同学都参加了读书会。

这些都是1932年的事了。到了1933年春天，党领导的文化总同盟，从上海派同志来把广东当地进步的秘密团体组织起来。是年春天的某一天，百把人在北郊开“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东分盟”成立大会，何干之是社联广东分盟的负责人之一；《广州文艺》这边成立为“左联广东分盟”，由欧阳山、吴海宁负责，此后，大家分头工作。

我一面上学，一面办刊物和参加读书会，对功课自然放松，成绩大大下降了。这自然引起学校的注意。这时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严重，我的行动当然逃不过鹰犬们的视线。不久，我的名字竟上了地方当局要通缉的黑名单。夏天，传出内部消息说当局要逮捕欧阳山、何干之和我。何干之先避居乡下，后到上海，不久转日本；欧阳山和我则逃亡到上海。同年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是1933年的秋天。从此，我便在“左联”的领导下，更坚定地用作品做武器去战斗。这段的实践告诉我：妇女，只有参加革命才有出路，才能求得彻底的解放。

1933年10月，上海文化界欢迎以英国马来爵士、法共的古久列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宋庆龄、蔡元培、鲁迅出面招待。我就是在这个会上第一次看见了鲁迅和茅盾的。真是初出茅庐，广开了眼界。我实感到世界之大，更喜欢的是亲眼见到了文学界的先辈。他们和平常人没有两样，却写出了震撼人们肺腑的作品！

1934年由郑玉堃介绍，我曾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中华妇女同盟”的组织，

我初到上海时，因不认得路，不懂上海话，只好在亭子间里写小说。我第一次在“左联”的机关杂志《文艺》上发表的小说是《倾跌》；以后在《文学》、《作品》、《作家》、《现实文学》、《文学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了《没有了牙齿的》、《大涌围的农妇》等篇小说；又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了许多小小说；在《良友丛书》上出版了一个中篇小说《绝地》。这时期所写的小说内容，仍以缫丝女工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为主。《绝地》是从侧面写工人的罢工斗争的。

“左联”里还要过小组生活，分组主要是根据组员的居住地

点分的。我曾先后和周钢鸣、潘皮凡、何谷天、艾芜、等同在一个小组。“左联”有三个研究会：“小说研究会”、“理论研究会”、“诗歌研究会”，我参加“小说研究会”的工作。“小说研究会”是研究创作上的倾向性、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等，并出过两期《作品》。

1935年我在上海被捕，坐了一年牢，后来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被释放了。在狱中，我向一些政治犯里的共产党员（有罗晓红、蔡楚云等，后来才知道她们是共产党员的）学习了革命者坚贞不屈的道理和学唱革命歌曲；又从一些当地的女犯人那儿了解了一些上海下层社会的生活知识。我入狱后，鲁迅、茅盾等解囊相助；出狱后，鲁迅还把经常给他看病的须藤医生介绍给我看病，并介绍我们这些年青作家的稿子给外国。这都使我感到革命前辈对我们年青人的爱护和鼓励真是无微不至。

1936年出狱后，我参加了“左联”的《现实文学》的编委工作。鲁迅的最著名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就是在《现实文学》第二期上发表的。该刊出版这一期后便被反动派查封了。是年初秋，鲁迅先生病重，十月逝世，举国震动。我在灵堂做登记花圈、挽联的工作；出殡时，我和德让女士陪伴许广平同志坐车护送鲁迅的灵柩到墓地。

“七、七”事变后，我在上海失守前离开了上海，回到久别的广州。那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我可以用公开的身份进行工作了。那时，许多著名的人士云集广州，廖承志、郭沫若、茅盾、夏衍等同志都在广州，广东的文艺活动空前活跃。知名人士发起“广东文学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会（后在重庆正式成立）。郭沫若挂帅的《救亡日报》也迁来广

州，由夏衍主持。我担任过该报的记者，同时还写了《阿衍伯姆》、《梁五的烦恼》、《饶恕》等篇小说。

1938年，广州失守前，我通过廖承志同志的介绍，把三个女儿都送到元朗的幼儿园去了。此后天南地北，未知何日母女才能相见，心中十分凄怆！不久，我经过辗转的艰辛路程，去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去延安，但是刚走到长沙，武汉已失守，只好在长沙下车。找到了郭老，又碰见了吴奚如，他领我们去听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报告。

这个时期，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大半个中国的大城市都落入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真是人心惶惶。中国究竟往何处去？——这个问题萦绕着亿万人的心。周恩来同志的报告正是回答人民的疑问的。他根据毛主席的持久战理论，分析并指出了我国有利的条件，给人以必胜的信心。听了之后，我心里敞亮多了。后来他叫我们去湘西沅陵办《抗战报》。沅陵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周恩来同志关心少数民族同胞，叫我们去传播文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同去沅陵的有廖沫沙、周立波、欧阳山等同志。在沅陵编了几个月的副刊，由于怀了孕，我便和欧阳山到了重庆。那时正是过春节，又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文艺界知名人士云集重庆，文化活动非常活跃。但是很快，日本飞机又大肆轰炸重庆了。我由于快临产，便搬到乡下南温泉去住，一直在那儿进行创作，写了《南温泉的疯子》、《遗失的笑》、《葬礼》等篇。

1941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后不几天，1941年1月，我们一大批干部奉命撤到延安去。我带着我的小儿子一起去。我们乘坐的八路军车队路过三原时，被反动派的机枪拦



住了，并无理扣留了一夜。经领队边章五、李涛同志交涉，第二天才放行。我们继续前进，终于到达延安。不久，欧阳山和两个女儿也到了延安。可怜我的小女儿仍流落广东。

延安，是革命圣地。这儿是党中央所在地，我们杰出的领袖们住在这儿。这儿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虽来自天南地北，但都团结互助，学习空气很浓。物质生活是贫乏的，风气是朴素的；大家工作、学习之余，一齐动手劳动，丰衣足食，过的十分快乐。假日，可以在清澈的延河里游泳，在草地上跳舞、演剧活动也很活跃。像我这样从特务跟踪、生活无着的国民党统治区来到这里的人，简直是大大的精神解放，有如到了人间天堂！我在这里除了学习、整风之外，还写了《陈念慈》《垫脚石》等篇作品。我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一个时期后，便调到“中央研究院”的文艺研究室工作。整风时期。集中到“中央党校”第三部去学习。

1942年，毛主席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开会之前，毛主席曾找一批文艺界的同志分别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毛主席也把欧阳山和我找了去。毛主席讲，他准备提出文艺为什么人、对象问题、普及与提高三个问题和同志们研究。他和欧阳山同志谈了许多，后来他转向我，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文艺界有宗派，不好。毛主席指出作家、艺术家都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文艺为人民服务，宗派就会消失，正如他后来在座谈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所阐明的道理那样。

5月2号，座谈会开始，毛主席的报告使我顿开茅塞。经过二十一天的讨论，加上陈云、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指点，再听了毛主席的总结报告，我的心里更豁亮了。作家要到火热的斗争

中去，要为工农兵大众而创作，这些新鲜而又中肯的指示，强烈而持久地震动着我的肺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创作道路上的指路明灯，从此，我就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一头扎向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而创作。

抗日战争胜利了，大批干部奔赴前线。我于1945年冬天离开了延安，奔赴东北。东北三省，是我当中学生时代就向往的地方，东北同胞受了十四年亡国之苦，正需要大量的干部去工作呀。我只身报名去了。在赴东北的途中，由于反动派在承德一带干扰，以古大存为领队的我们这支干部队伍，便滞留在张家口。但是我们并不闲着，各自分散在本地区工作。我在宣化龙烟炼铁厂工会工作了半年，一面在工会搞宣传工作，一面还写了《龙烟的三月》、《他没有死》、《史永平是怎样复仇的》、《解放了的虎列拉》等短篇小说。

1946年夏天，我终于来到了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我们一到哈市，便听了陈云同志的报告：东北局号召凡是解放区来的干部，要通通下去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我虽然因水土不服，得了病，仍然报名要求下乡参加土改。但是组织部的林枫同志叫我留在城里，并对我指出说，由于形势的发展，今后是城市领导农村，我国作家应该熟悉城市，熟悉工厂和工人阶级。我一直只想到农村包围城市，并没有感到形势已经开始改变，新的形势已经向作家提出了新的要求。林枫同志的预见说服了我，我便留在市里去接收邮政局，给邮政工人做教育、组织工作。随后又到镜泊湖水力发电厂去向工人学习，给工人们上文化课，组织家属种菜、养鸡、养猪。后来，写了长篇《原动力》和《今天》、《沙

漠之夜》、《延安人》、《女区长》、《新夫妇》等短篇小说。

《原动力》作为向“中华全国第六届劳动大会”的献礼。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的第三天，我即随东北局妇委进入了冷枪横飞的沈阳城。很快，我就选定了到皇姑屯铁路工厂去工作和体验生活。

哈尔滨三十六棚铁路工厂的业务干部，已来了一大批，他们是立刻领导恢复生产的，我是去做群众政治工作的，从发放救济粮、上政治课、进行反动党团登记、献纳器材，一直到工人们提高了觉悟，主动修复伪满时已经废弃的火车头，以迎接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等等活动，我都参加了。我还根据工人们的爱好，帮助他们组织了乐队、创作组，墙报也已办起来了，剧本也写出来了，这儿的生活生动活泼起来，大家情绪高昂。直到该厂由上级派来了专职工会干部，建立了工人的党小组、青年团，我才离开了工厂。在这个基础上，我写了长篇小说《火车头》和散文《死车复活赛新车》、《开到南京去》等篇散文。

后来，我参加了“中国赴朝慰问团”到鸭绿江、新义州等地去慰问志愿军，回来后又写了《在祖国的土地上》、《爱情》、《咱们生活里的一件事》。我还参加了我国专家们对美国在朝鲜撒下细菌的罪行的调查，回来后写了许多反对细菌战的杂文；还写了反映志愿军英雄业绩的报告文学。

1951—1953年，我奉命做了一个时期的东北三省作协分会的文艺行政工作。为了继续深入生活，我于1954年将户口迁到鞍山市，当了鞍山钢铁公司第一炼钢厂的党委副书记。这里是钢铁联合企业，从采矿、冶炼到轧成钢材，有一套完整的、庞大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全公司一共有四十多个厂矿和附属小厂，而炼钢

厂是个中心环节。我选择了这个中心环节，是为了便于了解生产的全过程和问题所在。在鞍山住了十年，除了三年的副书记工作之外，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乘风破浪》，还写了中篇小说《小加的经历》，和《诞生》、《迎春曲》、《姑娘的心事》、《姑奶奶》等十几个短篇和几十篇散文，以及报告文学《鞍山的人》、《老孟泰坚守高炉旁》、《穆桂英大破齿轮关》、《心儿笑、焰儿高、红旗飘》等。

在鞍钢的十年中，我除了工作、创作之外，还在鞍山市文联的协助和组织下，利用星期天，对职工业余文学爱好者进行辅导，风雨无间地坚持了九年，共辅导了百余人，其中有些已成为专业作家，有一些是地方作协的会员。

在鞍钢的十年，是令我难忘的十年。那儿众多的生产标兵、工人劳动模范的英雄业绩和勇敢忠诚的行动，给我以强烈的熏陶和影响，对我改造世界观和鼓足干劲都有直接的影响。因此，这十年是我达到精神焕发、创造力旺盛的高峰。由此，我进一步理解了毛主席的深入工农兵的火热生活斗争中去的教导的深远意义！

1964年10月，我从鞍钢到了首都，仍旧从事专业创作，并到第一机床厂体验生活。仅一年多，卖国贼林彪和万恶的“四人帮”阴谋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先从文化战线开刀，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文艺战士绝大多数都受到迫害和摧残，尤其是许多老革命和老干部遭到残酷迫害；把经济弄得一团糟。我也多次被关进“牛棚”，抄家达四次之多，也下去劳动三年。直到党组织把我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四人帮”还不让我发表文章。我写了《有志不在年高》、《幸福》等短篇，也只能放在抽屉里。

我仍到一机床厂做辅导创作班的工作，同时收集工人阶级反对“四人帮”的材料，为下一个长篇创作准备。我立志要把人民对林彪、“四人帮”的愤怒和憎恨以及他们所作的种种斗争写出来。我发现工人阶级对那些蠢贼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他们的斗争是讲策略的。我也认真思考了林彪、“四人帮”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及其教训。不过，老实说，我那时对那些问题还不太清楚，也不太准确，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那时我已开始长篇的写作了。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使我对一些重大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我随着对历史进程的深入认识，不断修改我的长篇写作，终于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完成了这部作品，并取名《神州儿女》。此外我还写了短篇小说《哑梅》和散文《指路明灯》、《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向天安门英雄们致敬》、《奔向廿一世纪》、《捕蛇者新说》等几十篇。

总结我成年以后所走的路，是一条漫长的革命的道路，我一直是在党的指引下前进的。这五十多年，经过多少风雨，甚至是急风骤雨；我之所以没有迷航，应该归功于党的不断的教育和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熏陶与支持。我特别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妇女冲出旧社会，要做一番对人民有益的事业，就只有投身到革命的洪流里，和人民同甘苦、共呼吸。我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因此特别注意自己世界观的改造。革命队伍历次进行的整风运动——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对我都是很有益的。长期深入工人的生活和斗争中，那些英雄模范们的先进思想和英勇行为，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新中国建国只有三十多年，各项事业突飞猛进，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开创了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局面，加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革命的道路越走越宽，大家都为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祖国而努力。在这大好的形势下，回顾一下自己的过去，将更策励着未来吧。

1983年9月15日于北京

## 我和萧三

叶 华

—

1934年10月我从斯德哥尔摩去苏联。其原因不是政治觉悟高，而是个人好奇。那时，我听许多人说苏联的人民有崭新的思想，还过着一种崭新的生活，苏联和别的国家完全不一样。我很愿意亲眼看到这个巨大的甚至有一点神秘的国家。当时我的哥哥送我一张去苏联参观的旅行证，做为给我生日的礼物。

我在瑞典的一个朋友从事翻译苏联的文学作品。他正好准备和夫人去苏联。因为我在苏联没有认识的人，就跟他们一起去。在莫斯科，他们带我到著名苏联作家巴卜尔(BABEL)的家作客。巴卜尔是犹太人，我也是犹太人。他同情我，支持我多参观些苏联各地方。他30岁的女秘书叶列娜，也是一个犹太人，过几天要到黑海之滨休养。巴卜尔给作协打电话。他们同意我陪同叶列娜去他们在GAGRI的休养所住一个月。（后来巴卜尔成了萧三和我很好的朋友。1937年他无缘无故被逮捕了，以后，不知道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样死了，1956年后才给他平反。）

10月底我和叶列娜坐火车离开了已经有冬季味儿的莫斯科。过了两天两夜，我们到了正是夏天的南方。我年轻，全心的吸收在

我眼前的新的美丽的世界。在灿烂天空的阳光下红旗飘飘，路边充满着有各种颜色的热带式的植物。我们坐的小汽车驰往建在海滨的苏联作家休养所。中午叶列娜带我到面临大海的阳台上摆的餐桌旁。在这里我就认识了诗人萧三。那时我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长大的二十三岁的德国资产阶级小姐。他是一位三十八岁的中国革命家和共产党员。我们这么两个人，是属于“两极”，但却一见钟情，互相非常喜欢。我们的爱情经过了不断的考验，不论是政治方面的暴风骤雨，还是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以及其间几次好几年的分开——我们的爱情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一生一世，直到1983年2月4日，萧三逝世那一天。

萧三跟我在瑞典接触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或是共产主义者不



1982年8月26日在305医院合影  
萧三85岁、叶华70岁



一样。那些人只是在口头上讲讲革命的道理，而萧三却是实际的革命家。那时他参加革命活动将近二十年。当时我只懂得很少的俄文。在这样的情况下，萧三用我能明白和理解的简单的方法给我讲述了他怎样成为一个革命者。他出生在湖南，十三岁时在东山学堂上学，和十六岁的毛泽东是同学。毛泽东对萧三特别好，他们成了朋友，偷偷地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毛泽东说，中国也需要传记里写的这样的人物。后来萧三到第一师范求学，毛泽东比他后进校，那时候毛泽东已经将一部分同学组织起来，把课余的活动搞的十分活跃。毛泽东把自己丰富的知识告诉同学们，给他们讲述辛亥革命，讲述孙中山和他的同盟会，后来他还分析帝国主义战争的形势。那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有了救国的思想。在毛泽东强烈的革命精神影响下，萧三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18年4月他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创建了新民学会。1919年他在北平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他在法国一面工作一面读书，在那里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以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1月21日当列宁逝世时，萧三正在莫斯科学习，他流着眼泪告诉我，在他向列宁的遗体告别时，他发誓永远忠于革命事业。现在我可以说，他的一生没有违背他当时的誓言。

萧三还给我讲到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时，他正在苏联养病，因此他不能回国，他还说他当时的任务就是通过作报告、写文章、写诗来宣传中国的革命。后来在我们共同的生活里，我才进一步地了解到当时他工作的意义。那时候他送给我一本小册子，是他在苏联出版的诗集。这些诗我还看不懂，但我明白这本诗集作者的身份：一个是“埃弥萧——中国革命的歌手”，另一个是“埃弥萧——苏维埃中国的诗人”。这是我二十三岁的生命

中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不平凡人的事迹。当时我心里感到热呼呼的，我很愿意和他一起干革命。但是从愿望到实现这个愿望，是要克服自己思想上许多矛盾和战胜许多具体的困难的。我当时是德国公民。1934年至1935年的德国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不允许一个普通的德国公民长期的在他们国家居住的。所以1935年2月5日我离开莫斯科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可以说是被迫离开的。

## 二

我离开莫斯科后，萧三几乎天天给我来信，或打电话。在每一封信里，除了俄文外，有时他还加上几句用拉丁字拼的中文。1935年2月6日他给我的信中说：“……你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孩子，我非常地爱你。”“我的耶娃，我很高兴地收到了你的信。我谢谢你，我的爱人耶娃……我要你快点来莫斯科，很快地来！”

（2月13日）。“……不要忘了我，我非常地爱你。”（2月15日）萧三给我的信，我迄今仍然保存下来。我给他的信都丢失了。所以我现在只能通过他的来信回忆当时的情景。

很快地萧三告诉我，如果我要去苏联和他结婚，我就必须加入苏联国籍。2月22日他在给我的用俄文写的信中说：“我很高兴你一下子决定加入苏联国籍。你真聪明！”是的，开始我是同意了，但以后我又犹豫了。2月25日萧三给我写了一封很详细的信，内容是：“昨天给你打电话后我非常难过，夜里不能成眠。我看你还下不了决心加入苏联国籍。可能你对我的爱情不是你想的和信里写的那么深。我自己绝对不要迫使或者要求或者说服你加入苏联国籍。我只要向你说明，我为什么不赞成你的看法。我

对你说同志的话：1、假如你作个苏联公民，你将失去些什么东西？我知道好多外国人梦想拿到苏联国籍。作一个苏联公民是幸福和光荣的。当然，一个苏联公民对国家是有义务的。但这个国家是人民群众的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诚恳地，不但为自己；而且是为了创造大家的幸福而工作——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苏联公民，而不是一个小市民。可惜小市民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还有不少。2、难道你以为如果加入苏联国籍就一辈子再也不能到别的国家去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所能够说清楚的。我简单地告诉你：再过一个时期——具体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世界革命终究会实现。至少在一些国家内工人阶级会取得胜利。到那时候，国际形势和现在完全不一样。这不是空想的乐观主义，这是政治学的常识。至于我们以后能到多少个国家去工作，谁也讲不清。但你加入苏联国籍必须由你自己做出决定。这不但是我们互相的爱情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一个人的政治立场问题。”他还写道，“你来信说在莫斯科你觉得是自己家，在斯德哥尔摩你感到陌生。如果你这样想，你为什么不能解决加入苏联国籍的问题？这就是说你还不把这里当做你的家。我对你说，我的妻子不要作一个表面上的苏联人，而是要作一个有政治觉悟的苏联人。如果不这样，我不会爱她。”（2月27日）

我大概给他写了几封有道理的、说真心话的信。他很后悔对我说过这样严厉的话。作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明白了，一个资产阶级小姐要变成一个有政治觉悟的苏联人，不是一跃而成的，是需要有一个思想发展过程。他后来明白了，我的哥哥——我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不会一下子让我走，他要考验我一个时期。后来我哥哥在莫斯科认识了萧三。他们——一个是音乐家，一个是诗人，情

投意合。我哥哥在给萧三的一封法文信中说：“我感到很幸福，我亲爱的妹妹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丈夫。”当时我已同意了加入苏联国籍，因为我爱萧三。我哥哥认识萧三后，他也同意了。但这是以后的事情。1935年3月萧三收到了我的几封信后，在8月11日的复信中写道：“你俄文越来越好。从你的信中我能看出来你是很诚恳的——我能有象你这样的爱人，象你这样的亲人，我感到很幸福。”他还写道：“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我很爱你，一分钟也不忘记你。你是我的，我是你的。”

我为什么要写上面这些，就为了说明萧三的政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所以他也明白了，只有让我在他的身边，在苏联的生活实践中，我才能成为有共同政治理想的妻子。1935年8月，我终于到了莫斯科，加入了苏联国籍。逐渐地我脱了资产阶级的皮，思想也变红了。

### 三

在莫斯科，我们住在政治侨民宿舍的单独房间。萧三很忙。经过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批准，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并且参加了党的活动，经常开会至深夜。他是《国际文学》中文版的主编，但他不需要天天上班。他是个自由作家。当时他和鲁迅通信。鲁迅经常给他寄书、寄信。当时萧三是唯一的在苏联和别的国家介绍鲁迅和左翼文学的文学家，他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一些小说。他经常出去作报告，宣传中国土地革命和红军，揭露蒋介石屠杀革命作家的罪行。他写了毛泽东和朱德的传略。他全心全意地为中国革命工作。他的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苏联报刊经常刊登他的文章和诗，在苏联还出版了萧三的诗和小说，所以我也能

看懂。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爱伦堡等很敬重萧三，他们都是他的好朋友。

不论萧三多忙，他还是每天抽出时间给我讲他写的文章和小说的内容，给我介绍来自中国的消息。他不但帮我学俄文和中文，他还在公用的厨房里，教我做苏联饭菜。我们一起看电影和戏，有时到作家协会去吃饭、跳舞，冬天还一块去滑冰。我们的交通工具是电车、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那时候谁也不坐小汽车。

星期日有时萧三的中国朋友来我们家，和萧三一起炒中国菜，他们彼此说中文，我虽然听不懂，但我很高兴陪陪他们。萧三的苏联朋友，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也成了我的朋友，当时我在苏联临时从事摄影工作。

除了宣传中国革命以外，萧三很关心汉字改革。在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的汉字改革委员会请萧三帮助他们的工作。1936年11月我们去伯力，在那里住了半年。我在远东也做一些摄影工作。在伯力和海参威中国人较多。在海参威中国区的剧院里我第一次拍摄了中国京剧。对我这样喜欢中国人和中国艺术，萧三感到非常高兴。

萧三什么都会。1937年4月8日，当我生下第一个男孩子时，他还教我怎么带婴儿。5月我回到莫斯科后，我们搬到作家协会新盖的高楼。7月份孩子得了痢疾，因为没有法治好，在8月间就死了。萧三和我都很难过。一天，萧三的脑震荡病又发作了。我们便到黑海海滨去，让萧三能好好地治病。那一年10月，我们回莫斯科后；我又怀孕了。那时，苏联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早已开始了。在我们认识的人和朋友中，有不少人被逮捕了。其中还有党内的

一些作家。白天在街上捉人，夜里到楼房里捉人，真是可怕。当时萧三和我第一次发生意见分歧。我承认没有学习革命理论。我是在实践中学习，我也有嗅觉，我从自己的感觉出发。我认为，这里面有坏人在捣鬼，萧三批评我不相信党，他坚信党不会错的。他确实认为在我们认识的被逮捕的一些人突然变成了坏人或特务，当时他还不知道党里面有路线斗争，敌人会混入党内，并以党的名义搞迫害活动。不久后在伯力，萧三最了解的一些中国和苏联的朋友被逮捕了。他终于从心里明白了，这里面确实有鬼。什么鬼，怎么回事，我们都不知道。最聪明的、懂马列主义理论的人也不知道。大家都非常着急。许多人给斯大林写信告诉他这些事情，请求帮助，以便把事情弄清楚。但对谁也没有收到回信。

在那些年代里，萧三一直想念中国，梦想回国。他经常对我说：“脱离自己的人民，就没有办法写东西。脑子变干燥，笔也干燥了。”七七事变以后，他更是坐卧不安，想回到战友们的身边，同他们一起参加战斗。他几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回国参加工作的要求，但总不得结果，他的心如火燎。

1938年7月7日，我生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立昂。同年10月19日萧三再一次到共产国际去了，正好见到了任弼时同志。他们是老熟人了。在弼时同志支持下，萧三于终可以回国了。11月底萧三回国的事确定下来了。因为萧三回返延安是保密的，我和孩子不能马上和他一起走。所以经过共产国际的同意，我带孩子暂时回瑞典，到我哥哥家去了。

1939年2月21日，在列宁格勒，萧三送我和立昂上火车。我们流着眼泪想，什么时候才能够见面？在我给他拍的照片上，他给我写了一首题名为《留别耶娃我爱》的告别诗，诗中写道：

送君千里，  
终须一别。  
但愿此心耿耿，  
千古同明、同灭，  
如行地的江河！  
如经天的日月！  
后会有期，  
且努力完成我们的事业！

埃弥

1939、2、21

于列宁城

当夜他还写了一首很长的和我告别的信。他从莫斯科给我天天来信或打电话。3月6日深夜，他动身离开了莫斯科，回国到延安去了。

#### 四

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有觉悟的苏联人。在瑞典，不论多少人挑拨我，我没有说一句关于苏联的坏话。我虽然在那里看到了许多不愉快的东西，但是我认为家丑不应该外扬。我也认为这些不愉快的东西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苏联是第一个和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保护它。除了这些骂我是“斯大林分子”的人以外，我碰到了不少同情苏联的人，特别是从法西斯主义的德国逃出来的犹太人和共产党员。他们都羡慕我有苏联国籍。他们尊敬我这个苏联公民。

从萧三发自延安的来信中，我知道他在“五一”节前到达了延

安，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毛泽东同志。在7月8日的苏联《消息报》上，我看到苏联著名摄影师卡尔门发表的文章，写的是关于他在延安访问毛主席的情形。他也谈到了他好几次和萧三见过面，和他谈过话。萧三从延安给我来的信可惜没有保存下来。我记得他给我寄来好多本在延安出版的介绍延安和解放区的的小册子，小册子里的文字是汉字或拉丁字。萧三一直很关心我，要我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水平。1939年底萧三来信，要我和立昂去延安，并告诉我已得到毛主席的批示（这个批示现在还保存着）。1940年8月中旬，我和两岁的立昂经苏联去中国。9月间，萧三接我们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10月间，我们到达了延安。

## 五

分开了一年零七个月后，我们互相的感情更深。萧三在延安如鱼得水，他的脑子吸收了新鲜的“营养”，他的笔再也不干燥了。1940年夏天，延安《大众文艺》发表了《朱总司令在延安》、《贺龙将军》、《徐老不老》等几篇散文。萧三先在鲁艺，后来在中央文化俱乐部工作。我们也住在那里，那是连在一起的几个窑洞。我到延安后几天，贺龙同志来看我们。他向我说，你不远万里来到延安，你一定很爱萧三。是的，我很爱他。但来延安的原因已经不光是为了爱情，也有政治觉悟。我在瑞典的朋友羡慕我能到延安，到中国革命的圣地去。能来这儿我感到非常光荣。延安的一些领导人，知识分子和群众这样热情地欢迎我，那是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个代表苏联的妇女。萧三多次带立昂和我骑马到枣园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对我们很热情，每一次都请我们吃饭。有一次他说了：“叶华中国化了。”我听后很高兴。但





1955年在北京拍摄的合家照

毛主席和萧三谈些什么，我还是听不懂。萧三也带我到王家坪去看望朱总司令。朱老总会说几句德文。我对他的印象很深，他是个很诚恳很直爽的人。逐渐地我认识了许多延安的领导人。“女大”和另外一些学校、机关要请我介绍苏联妇女和儿童的情况。但是次数太多了，萧三厌烦老给我当翻译。于是我就刻苦地学习汉语。

我在瑞典时，萧三在给我的信中早就说过，在延安不需要照相，要学培养孩子的东西。我就在延安当一些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的顾问，在医院的门诊部接待妇女，教育她们在当时延安的条件下，怎么能养好婴儿。1941年12月我又生了一个男孩子，名叫维加。

萧三一直很忙。他经常做报告，写文章。他还介绍马雅可夫斯基和苏联文学动态。1942年《解放日报》发表了萧三写的《毛

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同年5月22日，萧三听到了毛主席关于文艺座谈会的讲话。1943年任弼时同志要萧三写一部毛主席传来庆祝毛主席五十大寿。毛主席坚决不肯做寿，萧三的书亦只写成片断。但是我知道，每一次毛主席和萧三谈话时，萧三还是记下毛主席的话。后来毛主席也允许萧三一面听一面记了。逐渐地萧三搜集了不少毛主席给他讲的自己的故事。就这样萧三写出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这本书。

有一件事情，是我终生感到遗憾的，就是我后来又离开了延安。这件事不少人觉得奇怪，我自己至今也没有办法把它说得很明白。实际上只是由于我和萧三之间的一些误会所引起的。责任当然在我们两个人的身上。我的政治水平还是不高，资产阶级的皮还没有完全脱下。萧三忙不过来，没有那么多时间（象在苏联）关照我。

我来延安充满着干革命的理想，当然没有想过还要离开它。有些人说我怕苦，这不对。我不止一次地在实践中证明了，我一点也不怕苦。我们几个外国人在延安的生活也不算苦。延安的领导非常照顾我们。因为萧三和我没有把问题摆到桌子上面，矛盾越来越深（尖锐），思想上我们距离就越来越远。我心里很痛苦——他也是这样，但是谁也没开口。1943年夏天我提出了离开延安。去哪里我没有考虑好。我脑子里糊涂。我想最好分开一个时期——以后都会好，萧三同意了我的想法。他想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一直等他说：“你留下，不要走。”似乎他也在等我说：“我不走，我们再试一试。”但是谁也没有说这几句话。我们没有谈离婚，但是为了在路上骗国民党，我们搞了一张假的离婚证，是周副主席亲自签的名。周恩来懂心理学，他大概理解了我

们的心情。这里我应该说，不论解放前或者解放后，我对周总理的印象最深、最深。我和毛主席告别时，他说了：“欢迎你再回来。”1943年11月23日——我带两个孩子离开延安的那一天，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车一开，我想跳下，不走，但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从萧三的日记中能看出来，他心里也非常难过。两个人没有好好说说心里话，结果我们分开了五年零五个月。

我准备去苏联，在路过兰州时，我住在苏联驻兰州的领事馆里。去西安的大卡车是国民党的。他们答应把我和孩子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实际上却把我们拉到他们的司令部去，然后把我們扣留起来，还胡说我是特务。离婚证也没有用。过了三个星期，突然让我们去兰州。一进领事馆的门，我就请求领事馆帮我回延安去。我说，提出离开延安这件事是我的过错。使馆领事说：不行，国民党会追捕你，你要马上离开中国。他还说，如果这几天有苏联去延安的飞机，他可以把我和孩子送回延安。但可惜在几个月内不会有什么飞机，我们只能回苏联去。他还告诉我，萧三寄来了几个加急的电报。是苏联领事把我们 from 国民党的手里救出来了。解放后萧三才告诉我，那时候在国民党的司令部里有我们自己的人。他们向延安中央汇报了我和孩子在西安的情况，还说我当时表现得很好。1944年1月1日，毛主席告诉萧三，我和孩子已经安全地到达了兰州。毛主席还对他说：叶华是个老实人。在以后的五年多时间里我给萧三的无数封信，他直到1949年才只收到两封。

在这些艰难的岁月里，我学会了带两个孩子，自力更生，而且大家身体都很健康。在艰苦的条件下，我的骨头变硬了，现实主义代替了浪漫主义。在杂乱的实践中，我没有失去干革命的理

想，相反的，我的政治觉悟和水平提高了好多。

1949年4月初，北平解放后，萧三跟一个中国代表团到了莫斯科。我们相逢时就知道——今后我们是永远再分不开的。

1983年12月

# 求 师 学 画 纪 实

——徐悲鸿先生怎样教我们学习绘画

## 安 敦 礼

本文是根据我在徐悲鸿先生门下受教的回忆而写的。四十多年的岁月过去了，每一忆及先生的教导，言犹在耳，音容面貌历历在目，似是昨天的事。

## 初 识

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看到上海《东方杂志》某期，在扉页上刊登了一幅彩色版的油画《老人与白马》，作者徐悲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人名用“悲”字的不多见，只知道当时有位戏剧家叫“陈大悲”，徐先生的名字中也有个“悲”字，也是我对徐先生印象加深的另一因。但主要的还是那幅油画，自此，我经常注意报刊上刊登的关于徐先生的消息和他的作品。

我第一次认识徐先生的面目，是他素描集中的自画像。那是一幅赭石色炭笔画，这幅画像形象逼真，神采奕奕。我认为画像一定很像他本人，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我时常想着，这幅自画像怎么画的这样有神气，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本人，向他请教呢。

我在师范学校毕业后作教员，二年中为了投考艺术院校，经过不少坎坷。第一年暑假，蒋冯作战，南路火车不通，我只身到北平。经打听得知，国民党政府已任命徐先生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但他来北京只呆了短短三个月，就辞职而回南京去了。

1931年暑假，我到南京，报考中大艺术系。最后两天考素描。考场设在两个教室。教室中间，各陈列一座大型石膏像，均为二米多高。一是米隆维纳斯像，另一是米开朗琪罗的挣扎的奴隶。主考人来了。我一眼望去，就认出是徐悲鸿先生。他的自画像酷似他本人。他身穿一套淡乳黄色的夏季西服，未结领带，左上兜上缀着一条红绸带，上印“主考”二字。考生们都静静地立在考场里。每人一具画架、画板和一张木炭纸、几根木炭条。徐先生向考生们宣布：每人画一张全身石膏像，头顶离画纸上沿三分，下端也留纸三分，两座石膏像任画其一。我看维纳斯像比挣扎的奴隶像简单，没有胳膊、手，腰间围条布裙，比画奴隶全身毕现，要容易得多，就选定画维纳斯像。写生时间是两个上午。第二天上午，我到另一考场看看，画奴隶像的考生很多，而且画的都很好，使我非常惊奇。入学之后，我才得知，像孙多慈已经旁听徐先生的课一年了，进步很快。有的考生已在美专学习过，又来投考中大的。考试结束时，徐先生宣布，明天上午八时，来考场看公布的各人成绩。我心中觉得很稀奇，考别的课目，都是密封卷，从不公布考生的分数；而徐先生主考的素描课，既是开卷式，又公开公布各考生的分数，这在旧社会考大学是没有的事。我因连日考试很疲乏，南京天气又热，夜晚不能好好入睡，下半夜才睡着。一觉醒来，已日上三竿，赶快跑到考场去。这时看分数的考生，全看罢走了，工友正在把画一张张地放在一处，几乎

就要拿走了。我央求工友，让我看看自己取得的分数，掀到我的画看了分数。本想全部看看，工友有点不耐烦了，只好作罢。在我的记忆里，孙多慈、杨建侯的分数最高。徐先生主考的科目考完就公布试卷和分数，这件事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他对考生一视同仁，按成绩给分数，当众公布，使考生口服心服。在旧社会这不能不算一种很出色行为吧。

## 第一堂课

不久，中大出榜，录取名单分别刊登在南京中央日报和上海申报上。我侥幸被录取了，十月一日开学，我办理了入学手续，被分派到成贤街第二宿舍住宿。一天傍晚，我坐在操场看台上，准备观看球赛，忽听到高喊“号外”的叫卖声。有人买一份，大家围观，始知日帝国主义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大家议论纷纷，球赛也停止了。这时距开学只有十一天光景。大家每天争看报纸，日本帝国主义步步扩大侵占区，而南京政府似乎无动于衷，毫无抗战之意。蒋介石竟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意即先消灭江西的红军，毫无抗战的迹象。东北大片土地，逐渐沦陷，东北人民纷纷向关内逃亡。

开学后，全体学生组织义勇军，每早在操场集合，军训两小时。

这时徐悲鸿先生来为我们新生班上入学后的第一堂课。他身穿蓝土布长衫，金黄色的铜纽扣，他立在教室中央，同学们站在他的周围。他态度非常严肃，十几位同学屏息地静立着，听他讲话。这第一课内容主要是让学生准备绘画用具，如木炭条、炭铅笔、木炭纸、木炭橡皮等素描用品（那时绘画用品全由学生自

备)。接着，徐先生对当前时局发表意见，他满脸怒容，态度十分严肃；他庄严地说：

“这样对东北事变不抵抗，将来，我们非作亡国之民不可！政府‘讳疾忌医’，东北老百姓遭受涂炭，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不知是何居心……。”最后，他气愤愤地用法语讲了几句话。同学们也都忧心如焚。徐先生气愤愤地离开教室走了。我未习法语，徐先生最后讲的几句法语，我不懂。事后问问懂法语的同学，才知道徐先生说的是蒋介石不抗日，违反全国人民的意愿，大骂蒋介石“混蛋”。

徐先生给新生上的第一堂课，是一堂爱国主义的教育课，也是表明他鲜明的政治立场、爱国忧民的思想，这是一堂爱国主义的生动的政治课。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在蒋介石眼皮底下的南京，竟然在课堂上，公开批评蒋介石不抗日，骂他为民族罪人、“混蛋”。这种勇敢、无所畏惧的精神，使我衷心敬佩。这是徐先生给我留下的第二个深刻的印象。

### 三项课外作业

日本侵略军在东北步步紧逼，很快就侵占了沈阳周围的大片土地，并进军山海关，断绝东北军向内地后撤的退路。学校义勇军每天早操练两小时，仍照常进行。当时中大校长朱家骅，是在“五四”前夕，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徐悲鸿先生同时被派往法国留学的。朱回国后，投靠国民党，步步高升，做起大官。一天早上，他到学校操场，站在中央一张大木桌子上，身穿毕挺的西服，足登黄皮鞋，擦的油光发亮。他向全体学生讲话，仅说来看看大家，闭口不谈时局。有的同学向他质问，光这样每天跑步、



立正、稍息，手无寸铁，能当义勇军打日本吗？他结结巴巴地答不上来，尴尬地走下台去。大家都怒目相送。

徐悲鸿先生是每周一、三、五上午来上课，共十二小时。二、四、六上午由助教辅导。那时的助教是1931年夏刚在艺术系毕业的顾钟梁先生，他是以先后同学的态度和我们相处，和同学们的关系很和谐。后来在抗日期间，随校迁重庆后，因肺病去世了。

徐先生在每周上午上课时间，总是早八时准时到班上，从不迟到或早退。他第二次上课时，全体同学应准备的绘画用具，都购置好了。女同学未参加义勇军，穿便服上课。男同学穿草绿军服上课。徐先生见男同学都参加义勇军操练，虽然都是徒手，他也高兴。他向大家说：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他又说：

“我们今后，就是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每个人也应当有一套作事的本领。否则，你们在社会上就不好立足。”

他继续往下说：

“你们是来学画画的，如果画不好画，你们在社会上就不好混了。”

他接着布置学习步骤，先画石膏像一年，再画人体素描一年，以后再转入学油画。他还布置课外习题。他严肃而又诚恳地讲：

“每星期课外习题，有三项重要工作：第一，每周对石膏像写生完成后，一定要默画一张，尽量把你记忆里的轮廓、明暗……等等都背画出来。然后和原石膏像对照检查，有错误的地

方，马上修改。否则，就会永远错下去了。这项工作要坚持一生。这个办法可以避免不对照实物就不能画的毛病。同时默画的东西多了，你就记住很多形象，对于你们日后进行构图是大有好处的。”

他停顿一下又补充说：

“能看着实物写生，画的好，固然不错。若是离开实物，就画不出东西，岂不糟糕？”

他接着布置下去：

“第二，每周每人要画一幅勾线画，中国画叫“白描”。取材对象不拘，外轮廓和内部结构纯用线条勾勒出来。线条不要起伏顿挫，要用一般粗细的线条勾画，不画明暗，线条像细钢丝那样。单用线条勾画物体，外形轮廓和内部质感，都能表现出来，是难度相当大的。这项工作，好比盖房子间架结构。你们能作好单线勾勒各种物体，对作画是大有用场的。”

徐先生接着布置课外最后一个习题：

第三，每人每周要对镜子画自画像一幅。你们要重视画人像，年老人比年轻人较容易画些，年老人面部的特征，显而易见比年轻人多。”

他停了一刻指着同学们说：

“你们二十几岁左右的人，一般面部特征不多，当然也有少数例外。画你们这样年龄的人像，是比较难画的，尤其是对镜自画，更难一些。如果每周作一次自画像——正面、八分脸、七分和六分脸，还可用两面镜子画侧面像。画时要对着镜子多观察，不要一看就下笔。这样能给自己画像了，再为别人画像，就可能有了把握了。”

徐先生着重讲完这三项课外习题后，指着教室墙角那座大穿衣镜说：

“这面大镜子，你们在课外要轮流使用它，使它发挥作用。

他继续又说：

“你们就是自己的‘范人’，只要你一对镜子，就会随画随到，比请别人作范人方便得多，你们看，是这样不是？”

全班同学都静心听徐先生安排课外习题，有的还逐条记在自己的速写簿上，听到徐先生最后这几句话，大家都面带喜悦的表情，顿时教室内的气氛变得既融洽又活跃起来。随即各站在自己选定的位置的画架前，开始了第一幅素描工作。各人心中都牢记着，每星期一要检查每人的三项课外习题作业呢。

### 要以写实功力为基础

徐先生早八时到班上课，一连四小时内，从不休息。学生也很少离开教室。我们班是中大艺术系人数最多的一班，有十六、七人，女同学占一少半。女同学孙多慈入学前旁听一年，在徐先生指导下，进步很快，不仅素描成绩好，在素描画幅上所写的字，也酷似徐先生的字体。她以素描最高分数入学，在四年的学习中，保持了素描“冠军”的称号。男同学杨建侯多才多艺，素描、油画、国画和雕塑，样样精通。徐先生上课时，对同学一视同仁。每堂课，对每人的作业都要细看、修改，并指出优缺点，一连四小时，从不休息。可是，他却设法让学生休息片刻，借此稍解眼睛的疲劳。有少数同学，素描成绩跟不上班，心中着急，也很苦恼，认为自己没有艺术天才，颇为灰心。徐先生得知这种情况，就设法开导大家说：

“什么天才、地才？一个人再有什么天大的才，如果把他关在一间屋子里，什么也不让他学，就什么‘才’也没有了。”

大家一听徐先生向全体讲话，都不约而同地停下笔，静心聆听，眼睛暂时得到休息。徐先生接着说：

“天才是绝对没有的，但我承认人有才智高低之分。才智高的人，可能进步快些；才智低的人，可能进步慢些。才智低的人，如能加把劲，也可能进步快些。”

他举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才智的高低，好比两口铁锅烧开水。一口铁锅底薄，传热快，不一时就把水烧开了。另一口铁锅是笨锅，锅底铁厚，传热慢，但如果加把柴下劲烧，也可能烧得快些。”他停顿一下，让同学思考一下这个形象的比喻。最后好像作个总结似地说：

“你们想想，一口锅烧水开的快，另一口锅烧水开的慢，当都烧成开水时，岂不都一样是开水，可以被大家饮用吗？”

他这样鼓励后进同学，解除了后进同学心中的苦恼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些同学就加倍努力，夜晚还到教室里画，星期天向工友要来钥匙，把自己反锁在教室里来画，同学们积极求上进，坚定了学画的信心。

除了在课堂上的作业和课外规定的每周三项习题外，徐先生还鼓励同学们多观察自己周围的人。光观察还不够，还得把观察所得，马上画到速写簿中，作为各样人物形象的储备，好像你不时向银行存款，以备不时之用。

有一次，一位男同学为一女同学金有彩速写一幅背形。金有彩身材瘦弱，旗袍上穿件黑绒小马夹，走起路来，两肩有些倾斜。这位男同学在她背后，且走且画。徐先生看到这幅背影速写说：

“这是金有彰。”即把那位女同学叫过来，说：

“你看，这是速写你的背影。他挖苦你呢！”

他又郑重其事的说：

“你也挖苦他！”

就表面讲话而言，似乎语含幽默，好像是一句玩笑话，其实是鼓励金有彰也要以周围同学为对象多作速写。徐先生借这幅速写，向同学讲述法国近世讽刺画家多米埃，讽刺国会议员的讽刺画，“多米埃用夸张和变形的手法，把国会议员挖苦得啼笑皆非。夸张、变形是以写实功力作基础的。否则就达不到夸张、变形的效果，也可能弄成奇形怪状，那就走入死巷里去了。”

随后，我们找到多米埃的印刷品，仔细研究一番，从中得到很多启发和可借鉴之处。

## 评 画

这一学期，由于“九·一八”事变，国是日非，人心沸腾，尤其是全国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强烈地要求抗日救亡，纷纷向南京政府请愿。中大体育馆住满了北平各大学来请愿的学生。蒋介石用高压手段，在中大体育馆门前架起机关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押送北平各大学的学生，强迫他们过江到浦口，登上早已备好的闷子车，送回北平。接着上海各大学的学生也相继来南京请愿，由中大出发，向国民政府去，路过成贤街时，被军警阻拦，引起冲突。军警开枪镇压，牺牲几个学生，灵柩就停放在中大礼堂内。中大全体学生于某日晚集合，列队找蒋介石请愿。他东躲西藏，一直找不到他，后来找到他在中央军校。我们整队立在军校礼堂内等候。这时有个穿军衣的什么人，混在我们的队伍

里，被同学们人轰出去。后来蒋介石从后台出来了，随后跟着的是穿长袍，布鞋布袜的大胡子于右任。蒋介石向请愿学生讲的一口浙江奉化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他用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了“反省”两字。大家也不明白是叫谁反省。有位站在队伍最前列，靠近讲台的同学高声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我国大片领土，全国人民要求政府立即抗日救国，而政府毫无准备，你们应当先反省……”蒋介石半转过身体要走，只得说“唉、唉”便下去了。一场夜晚请愿，仍无结果，全体同学只好列队回校。

虽说是国难当头，大家都忧心忡忡，但同学们在课堂上学习，从未稍见懈怠。

徐先生这时已完成他回国后第一幅油画创作《田横五百士》。这个历史故事见《史记·田儻列传》。田横是战国齐氏的后代。秦末，其从兄田儻自立为齐王，不久战死。儻弟荣与荣子广相继为齐王，横为相国。韩信破齐，横自立为齐王，率领五百人，逃往海外一个小岛上。刘邦称帝，遣使者往召降。横与使者往洛阳，行至距洛阳二十里处，向使者说：“我羞为汉臣，刘邦要见我，一是召降，二是处死，今距洛阳仅二十里之地，拿我的首级去见他好了。遂自刎而死。留岛上的五百众士，闻横死，亦皆自杀。悲鸿先生根据这段壮烈的历史故事，描绘田横在岛上与五百从属作别的场面，创作大型油画《田横五百士》。徐先生于1927年回国之际，正值许多志士仁人，被蒋介石杀害。一部分贪生怕死之徒，投降了蒋介石，弄个一官半职，苟且偷生，知识阶层形成两极分化。悲鸿先生根据国内形势，以古喻今，宣扬田横的傲骨，宁愿一死，不屈膝为汉臣。

这幅油画巨制是徐先生归国后，在上海南国艺术学院任教时，开始构思，收集人物形象，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才告完成的。画中人物，均有所本。他的画有许多人像作为素材。把他自己的形象也画了进去，作为五百士的主要成员之一（画中前列，穿黄色上衣的就是他本人）。内中一中年妇女，是借助蒋碧薇的形象。这幅画存放在中大一间小画室里。一天下午，我到他画室里看这幅画，适徐先生也在那里。我立在这幅油画巨制前面，仔细地看。我那时尚未习油画，对画中的鲜亮色彩，大笔触的挥洒，觉得痛快淋漓。徐先生平时不多画风景，而在这幅画中，作背景的秋树林，异常生动逼真。众多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各具情态。我转脸问徐先生，画中人物服装是根据什么画的？

“我参考出土文物、壁画，还有汉画像石刻中的人物服装……”徐先生给我讲解，并继续说：

“光凭这些还不够，又参考古籍中关于汉代服装的记载，再加上我自己的想像……”

“具体的服装呢？”我指着田横的红袍子问。

“这是我借用周信芳先生的。他帮了我大忙，内中人物许多服装，都是从他剧团大衣箱中，挑选借出来的……”

徐先生看我对这幅画看得认真，放下他手中的笔，作暂时的休息，走到我的跟前，亲切地向我说：

“今天我考试你一次，你说说你对这幅画有什么感受？”

对这幅画谈我们感受，我恐怕要交白卷，心中虽是这样暗想，但又不得不回答老师的提问，想了想，硬着头皮回答说：

“我认为您的自画像好。”我指着画幅上那个穿黄衣上身的人物，这样避重就轻的回答一句。

徐先生紧接着追问一句：

“为什么？”

我那时还不懂“主题思想”、“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诸如此类的术语，只含糊其辞地回答：

“我看画得很象徐先生本人”。

“仅仅是象吗？”徐先生这一反问，几乎使我又要交白卷。

“徐先生画这幅画的用意，可以说完全表现在他的面部表情上，这是徐先生在这个场合中的发言。”

徐先生面部似乎没有什么表情，接着又问：

“还有什么？”

“田横像画得很突出”。我退后几步，凝视着田横立像，他是这幅画中的主题人物。

“突出在什么地方？”

“您把田横画得身高超出常人的比例，表现他伟大，尤其是面头部，画得很瘦，颧骨高高的，拱起的手，也尽是骨头。面部表情，虽胸有不屈之心，而外表非常镇静，是否是一身傲骨，而不外露……”徐先生听我大放厥词地谈感受，又问：

“还有什么？”

“那个瘸子画得不好，样子难看。面部又不美，似乎还想在田横告别大众时，说几句话，我觉得不好看……”我指着画面上那个拄拐杖的瘸子说。

“你看过罗丹的雕刻《老娼妇》吗？”

“我看过书上印的照片。我还有一本曾觉之翻译的《罗丹美术论》。这座雕刻，也有人译为《过去的处女》。”

“可以这样意译。美不美？”徐先生又问我。



“啊，没什么美，皮包骨头的老太婆，两个乳房干瘪地下垂着，不美，没有处女的裸体美。”我有点放肆地回答。徐先生并没有生气。

“是呀，老娼妇的干瘪的身躯是不美的。为什么成了罗丹的杰作之一？”徐先生接着说：

“美和丑是相对的，老娼妇之所以丑，是由于她过去的处女美被人蹂躏糟蹋、欺辱而造成的。大雕刻家罗丹寄予她无限同情，雕塑出她的干瘪身躯，唤起人们对她这一类人的同情，也是罗丹代她向社会作了控诉。它的价值不亚于维纳斯……”

“我明白了。”听了徐先生这一席讲解，使我有所领悟，“您画这个瘸子，外表是不美的，他可能是身经百战，和田横共过生死的人。和田横别离时，是要动感情，争着要和田横说几句话，所以把他摆在较突出的位置，是吗？”

“是这样，我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这样一个‘范人’……”说到这里，有客人来了，我连忙告辞。徐先生送我到画室门口，面带微笑，指着我说：

“你今天的考试……。”我看徐先生笑着给我说，我也不拘束地说：

“不及格吧？”

“不，及格倒是及格，是谈你的感受嘛，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呢。”

我向徐先生告别转身走了。心中总是想着老师虚心地向他的学生征求对他作品的意见，在过去时代是不寻常的事。

后来，我才得知，刚才来访的客人是中大文学院院长谢寿康先生，他是同时和徐先生在法国留学的。

次稿，才算完成。这幅巨制，可以说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完成的。也是徐先生回国后，创作的第一幅大型中国画。

### “宁方勿圆，宁拙勿巧，宁脏勿净”

上海“一·二八”抗战，日舰在长江炮击南京城，南京政府与日帝国主义妥协，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十九路军被迫调离上海防地，转移到福建驻防。这个协定，是个卖国协定，人心极为愤慨。蒋介石不抗日的面目，又一次大暴露。

中央大学在1932年3月，淞沪停战后，勉强开学了，学生是陆续回校的。徐悲鸿先生在开学之始，就准时到校上课。他对学生们的素描课，一贯要求很严格。纵然在开学后到校的学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他也坚持按时上下课。对参加义勇军赴沪抗日的学生，到校晚一些，素描成绩差一些，手头功夫生疏一些，他是能原谅的。否则，他是决不宽容的。有位同学为了筹措点学费，回到家乡，作了两个月的教员，才回到学校。由于他作临时教员，很少时间自修，素描功就荒疏了。当徐先生看到他的素描时，觉得没有进步，很严肃地训斥他说：

“你到上海当兵了吗？（意即参加义勇军抗日）既没到上海当兵，为什么素描没有进步！”

全堂同学都听得清清楚楚，各自心中都警惕起来。这位被训斥的同学，面有愧色，无言以对，静听徐先生对他的教诲。事后这位同学加倍努力，日夜练素描功，挽回他失去的两三个月的时间。他本来就是相当用功的学生，经徐先生当面训斥一次，就更加勤奋了。助教顾钟梁先生了解这个学生的情况，向徐先生作了如实的反映。徐先生对学生的态度是明朗的，只要你肯刻苦用

次稿，才算完成。这幅巨制，可以说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完成的。也是徐先生回国后，创作的第一幅大型中国画。

### “宁方勿圆，宁拙勿巧，宁脏勿净”

上海“一·二八”抗战，日舰在长江炮击南京城，南京政府与日帝国主义妥协，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十九路军被迫调离上海防地，转移到福建驻防。这个协定，是个卖国协定，人心极为愤慨。蒋介石不抗日的面目，又一次大暴露。

中央大学在1932年8月，淞沪停战后，勉强开学了，学生是陆续回校的。徐悲鸿先生在开学之始，就准时到校上课。他对学生们的素描课，一贯要求很严格。纵然在开学后到校的学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他也坚持按时上下课。对参加义勇军赴沪抗日的学生，到校晚一些，素描成绩差一些，手头功夫生疏一些，他是能原谅的。否则，他是决不宽容的。有位同学为了筹措点学费，回到家乡，作了两个月的教员，才回到学校。由于他作临时教员，很少时间自修，素描功就荒疏了。当徐先生看到他的素描时，觉得没有进步，很严肃地训斥他说：

“你到上海当兵了吗？（意即参加义勇军抗日）既没到上海当兵，为什么素描没有进步！”

全堂同学都听得清清楚楚，各自心中都警惕起来。这位被训斥的同学，面有愧色，无言以对，静听徐先生对他的教诲。事后这位同学加倍努力，日夜练素描功，挽回他失去的两三个月的时间。他本来就是相当用功的学生，经徐先生当面训斥一次，就更加勤奋了。助教顾钟梁先生了解这个学生的情况，向徐先生作了如实的反映。徐先生对学生的态度是明朗的，只要你肯刻苦用

功，他就热诚地爱护你、鼓励你。同时他有一种美德，就是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徐先生得知这位同学因筹措学费荒废点学业的情况后，认为对这位同学批评错了，过于严厉了，在下周上课时，就当众诚恳地向这位同学道歉，并热情地对这位同学说：

“进步是随着刻苦用功而得来的……。”

不仅这位同学受到教育和鼓励，其他同学在一旁听着，也同样受到教育。同时感到徐先生实事求是的风度，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批评，是难能可贵的美德。他的言行给全班同学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大家受到一次“知错必改”的生动教育。

我们经过一段素描功的锻炼，有一次徐先生指出在习素描功的过程中，在起稿时，用笔方面，要用直线。用笔方一点、刚硬些，要避免软弱无力。要注意画面的“干净”，使精力分散。画面脏一点，不妨事。后来，他总结为三句话，作为习素描的指导思想：

“宁方勿圆、宁拙勿巧、宁脏勿净。”

这三句话是有针对性的，也可说是初习素描者一般应遵循的指针。前两句，我们还能理解，至于“宁脏勿净”，还不能十分理解。画面干干净净不好吗？徐先生本人的许多素描，不都是很干净吗？为什么叫学生的素描“宁脏勿净”呢？当时有个别同学，非常注意画面的干净，画幅空白处，有一点木炭灰脏，就赶快用软橡皮揩掉、耗费一部分精力，不能专注于所描绘的物体。形体描绘准确时，方与圆、拙与巧、脏与净，都是辩证的统一体。初习素描功时，在用笔方面，应首先动用方笔，线条要刚劲的硬些，有生机勃勃之感。线条刚劲，是画面的“骨”，有骨才能附着肉，形象才能树立起来。不要怕拙，巧是从熟中蜕变出

来。画面“脏”不是主要的缺点。“脏”，是初习素描的一种自然现象。因为对形象不能一画就准，因而擦擦改改，改改擦擦，甚至把木炭纸都擦毛了。所以在这个阶段，“脏”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习素描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情况。徐先生提出这一点，是要求大家一笔画的不准确时，要经过再观察之后，再画一笔。反复的仔细观察，反复修改。势必要使画面脏一些。待你观察物象准确了，下笔也比较准确了。脏的问题自然会解决的。这就是“宁脏勿净”的涵义，决不是要使画面乱七八糟，故意弄脏的意思。

后来，徐先生在指导学生习素描时，常常拿这三句话，作指导思想，也可说是他把习素描多年的心得体会传授给学生们的，这三句话成了徐先生指导习素描功的名言。

### “我是趴在地板上画的”

1932年初秋。南京正是不热不冷的好天气。我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去看望徐先生。他那时住在中大附近丹凤街一座民房小楼上，是住在二楼。这座小楼极其简陋，楼梯既陡且窄，一上楼，楼梯就吱吱作响。楼上有里外间。徐先生在外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吃早点。小桌上一半桌面堆着放报纸和杂志。徐先生让我坐在他的对面。他一边吃早点，一边和我谈话。他的早点是半小碗牛奶，一块约有三寸长，三指宽的小烧饼。这时，他的大型中国画创作《九方皋》。第七次稿已经完成。先几天，他在课堂上，曾对大家讲了九方皋的故事，这幅画的第七次稿，我曾看见过。画幅中央画养马人拉着一匹黑色的骏马，神采奕奕，象遇见知己的喜悦心情。养马人有不露声色的内心喜悦，象将荣获冠

军的球队教练那样。我看徐先生住房的条件，连张大桌子都没有，怎样能画这样的画幅呢？我把这个问题提出，徐先生看着我说：

“我是趴在地板上画的。”

我看看地板，凸凹不平。心中想着，这样的地板，如何能画这幅  $351 \times 139\text{cm}$  的大幅画？而且连画七次稿。这时，徐先生已吃完早点，他好象看出我的心意，亲切地给我说：

“一个人要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奋发有为，才能有所成就。有好条件 and 好环境，固然是好，但万不可等待好条件！‘时不我予’，不要把时间消耗在消极等待上。如果好条件一直等不到，怎么办？”

他接着说：

“要用勤奋来等待。勤奋是可以创造好条件的。我画《九方臯》另一涵义，就是鼓励人们要在勤奋中培养自己的才能，伯乐、九方臯才能发现你。”

徐先生接着说：

“九方臯的故事，我在课堂上给你们讲了，这个故事对后代很有影响。韩愈写的《马说》。你读过没有？”

“大意知道一点，原文记不清了。”我回答。徐先生即时背诵头几句：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不要有怀才不遇的郁闷心情，把希望寄托在伯乐、九方臯发现你，主要是看你是否有千里马之才。纵有伯乐再生，而你沒有千里马之才，也是枉然。”

我听了徐先生这一席教诲，觉得自身主观勤奋努力是主要的。他经常教导学生们刻苦勤奋，一有机会就可脱颖而出，展示他的才能……。我把这个意思说给徐先生，他微微点头说：

“是如此，是如此。”

现在再欣赏这幅巨制，黑色公马，膘健体壮，虽带着缰绳，被养马人牵着，两只眼睛几乎要跳出来。真是望穿秋水，渴望得到知己。口微启，似欲作长鸣状。

### 认定自己的目标前进

悲鸿先生自创作大型油画《田横五百士》后，就孜孜不倦地从事国画创作。马是他常画的对象。它如：狮、水牛、鹅、鸭、鸡、喜鹊、猫等，甚至有时也画只小狗。他曾送我几幅国画照片，内中一幅是《群乐》。画面上几只鸭子向盆中取食，一只小狗在旁啃骨头。这幅画题为《群乐》是有画外之意的。当时政府中人物，争权夺利，不顾国家安危，像一群鸭子争食和狗啃骨头，为一大乐事，岂不可悲。此画曾插入他写的《悲鸿自述》一文中，作为附图。先生在这一时期的国画创作有《六朝人诗意》、《三侠》等。前者是借用六朝人诗意，讽刺苟且偷安者之流。后者是描绘红拂与李靖等三人出走途中。这两幅同选人《自述》中，作为附图发表。

徐先生既有中国画扎扎实实的基础和功力，对西画造型又经过八年的刻苦锻炼，因而想创造一种新中国画，以挽救中国画陈陈相因的颓风。他在尝试、探索，如何结合中、西绘画的优良传统，创造出既有民族气魄，又具有时代精神的新中国画，这是他孜孜以求的。他在探索前进中，认为在创新的道路上，所作的中

国画，仅是创新的尝试，是不成熟的。在学生中间，偶尔发现有个别人，临他的中国画，他就立即制止，不让临学他的画。他认为不成熟的尝试，是不足取法的。一是他的自谦，另一是对学生负责。尝试的作品，也可能是不完备的，可是暗中临他的中国画，或吸收他的风格而画中国画的，也大有人在。如陈晓南就临画他的喜鹊，教育系有个湖南籍的学生，常背临他的马，张安治偶尔画幅人物，其用笔造型是摹仿徐先生风格的。

我们当时是专攻西画，徐先生并不宣扬自己的西画如何，如何，让学生临画。但偶尔见有学生临他的西画，也不严加制止。有一次，把他创作的《老人与白马》油画，拿到教室里，让学生观摩。这幅画虽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但我没有见到原稿。这是画在三合版上，篇幅不太大的油画。当我亲眼看到这幅原作时，心中很喜爱。下课后，我就用同样大小的一块三合板，临画了一幅。因为油色不干，放在原作的位置上，把原作翻过来，另放一处。第二天上午，徐先生进教室一眼看见这幅临稿，马上发现不是他的原作，就问同学们是谁画的？他得知是我临画的，就快步走到我跟前，指着我说：“你造假画呐！”这是一句半开玩笑并带有亲切之感的话。但没有严格禁止我临他的油画。1954年春，我去北京参观徐悲鸿纪念馆，同时在场的有陈之佛先生，同学杨建侯、夏同光、陈晓南诸人。廖静文先生陪同我们参观。当我看到《老人与白马》素描稿时，问廖先生，那幅油画呢？据回答说是在重庆时遗失了。我那幅临稿，在十年动乱中，也在被抄家时连同其它油画一同付之一炬了。

这一时期，徐先生对中国画创作是异常勤奋的。马、狮、猫、鸡等动物，是常在笔下出现的。每一画出，社会上对他所作



国画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保守势力对他的中国画是看不惯的。有的说，这不是中国画。有的说，不中不西。如此等等，人言纷纷。当时在中大教授中国画的吕凤子（名浚，丹徒人）先生<sup>①</sup>，曾在课堂上公开评论徐先生所画的狮。他也不否认徐先生在造型上，掌握得很严谨。他很含蓄地说：“徐先生所画的狮，如能在外形轮廓描出一条强有力的线条，那就更好了。”吕凤子先生也是很有才华的，他画的人物和山水画，非常注意笔墨和线条的运用。画幅的题字也自创一格，曾用“凤先生”作为别号题画。他曾约几位同道组织一个画会，取名“穷社”。在宣言中曾指出“穷社”的宗旨是穷其画理之义。他的画不落前人老套，有人评为“怪”，甚至比扬州八怪还过之。徐先生也佩服他的画。吕先生在国画上虽有独到之处，但对吸收西洋画优点，作为改革中国画的营养，还存在若干保守思想。他曾在金陵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谈中西绘画结合问题，文章有“泥洋不化，那是不能使你的眼睛变蓝，鼻子变高”之句。此话是暗中有所指。足见一件新事物的产生，往往遭到保守势力这样或那样，明中或暗中指责的。徐先生并不为这些“评论”所动，他认定自己的目标前进，不倦地和国内守旧势力作斗争。

### “眼神绘好，这画就成功了一半”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西方绘画各种流派，已波及到广州、上海一带。有一部分人，盲目追求西方流行的所谓新派画风，造成

<sup>①</sup> 吕凤子先生是我国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人物、山水、花鸟画均有独创风格。解放后，被选为江苏省人民代表和江苏中国画院筹备委员。著有《中国画法之研究》。再版六次，印数达216,000册，曾由上海印行《吕凤子画集》。于1959年12月20日在苏州病逝，终年74岁。

艺术界思想上的紊乱。尤其是对学美术的青年，有无所适从之感。徐先生对这些形式主义的流派，是深恶痛绝的。要挽救近代中国画，必须师造化，以大自然为师，在造型方面下苦功夫。他倡导首先在人物画方面刻苦锻炼，使人物画在全国艺术界有个普遍的基础。西方绘画在人物画方面，有悠久的传统。中国画虽有不少前贤，对人物画造诣很高，但未普及。如果引进西方诸如“驴尾画家”的作品，徒使青年走入歧途，既不能挽救中国画颓风，又增加新的病症。他极力倡导学生走现实主义的道路，有一次在课堂上，他诚恳地告诫我们说：

“你们在学校期间，要打好画人物画的基础，从写实入手，不取巧，不偷工减料。日后还要画飞禽走兽，不要妄讲什么派、什么主义（指近代西方各流派而言）。”

他接着严肃地说：

“你们的人物画基础打牢固了，离开学校，你们创什么派，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了。总之，现在先不谈那些什么派……”。

徐先生回国后，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了《悲鸿素描画集》。接着编印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画家普鲁东《普鲁东素描画集》。1931年又编印瑞典现代画家初伦的《初伦杰作》，卷首亲笔叙述初伦的生平，并撰写《初伦传略》。在传略结论一段，明确地表明他对西方近世绘画各流派的想法，观点异常鲜明，始终贯彻他主张走现实主义道路的立场。对新兴各流派，有深恶痛绝之感。兹抄录几句：

“近世艺人，欲屏弃一切古人治艺法则，思假道怪僻，以造其至。举其道曰“独立”，曰“创格”。吾见鄙陋，窃鲜其济者。苟有天才，人间岂能有束缚天才之具？若自惧不

足以立，欲矫情立异，变换万象，易以非象；窜改造物，易以非物；昧其良知，纵其丑恶；宣其佞辩，逞其眩惑……”

接着他举出法国新画派的几个代表人物，说他们庸俗卑劣。并用“过激”之词，表示对各流派的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是投机牟利，人格堕落之极。最后他提出“形似为艺术之起码，不料乃为并不能象物者为护符，作为口实……”同时对我国四王山水之陈腐，也加以抨击。认为是“伪”，反“伪”宜莫若真。现在是以伪易伪。

徐先生的艺术观，在这篇《初伦传略》的结论中，阐述得十分明确，立场、观点毫不含糊。他在教学上，同样运用他的这种观点，教导学生。

徐先生倡导写实，并不是自然主义，他描绘现实物象是有所取舍的。他的作品虽是写实。却不是自然的翻版和照相式的写真；而是有取其主要部分，加以适当的夸张，舍去其不必要的地方，作了省略或删除。他对描绘人物方面，教导我们说：

“你们画人像和画整体人物像，描绘眼神是非常重要的。眼神描绘好了，你这幅画就成功了一半。晋朝人物画大家顾恺之，画好人物，恒数月不点睛，就是他在细致构思对眼神的处理。”

他接着说：

“夸张手法是以写实作基础的，但要适当，过犹不及是不行的。描绘人物眼部，要传其神，要把眼睛画的比原来的略大些，这样容易见精神。”

这是徐先生画人物画的心得体会。我们看他的油画和中国画人物，所描绘的眼睛，都比原对象的眼睛略大一些。像《箫声》和其它多幅中国画中的人物画的眼睛，都体现出他这种心得，因

而所描绘的人物，倍显精神。

徐先生又谈到如何画人物的手，他教导我们说：

“人物手的重要性，仅次于眼睛，它有助于人物的表现。一幅人物画，如果把人的手画得不伦不类，整个画就几乎失败了——纵然其它部分画的不错。你们要练习画各样的手势。小幅人物画，手指甲盖可以省略不画，因为它无关手的动作和表情。”

我们同学按照徐先生的指导，在练习画人像时，用这个方法试试，果然有效果。还看着自己的手，练习画各式各样的动作。教室里备有脚的石膏模型，也专练习画脚。

### “独持偏见，一意孤行”

徐先生在完成创作《九方皋》后，仍不遗余力地对创造新中国画，作积极的探索。油画工作，也同样没有丢掉。

1932——1933年之间，他第二次构思创作一幅大型油画。

1931年夏，南京一带，遭特大水灾，连着又遭特大干旱。江南一带，赤地千里，稻田龟裂，民不聊生。反动政府对民间疾苦，漠不关心，置人民生死于度外。同时在“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危急之际。爱国忧民的正直画家徐先生借用《书经》之句“徯予后，后来其苏”之意进行构思。夏桀残暴，人民涂炭，望成汤伐罪，以解救倒悬之苦，人民希望成汤早日到来，若大旱之望云霓。徐先生先在国家危亡和天时大旱两重痛苦的压迫下，取这个题材以古喻今，而创作《徯我后》。这幅巨制油画经过两年的时间，才告完成。这幅创作仍是坐在画室里构思，收集他周围的人物形象而完成的。尚未能到干旱地区受苦受难的灾民中去体验。那时也不同于现在，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画家深

人生活。因而有人对这幅画中的人物形象，有认为是模特儿堆积的非议。以那时的情况而论，画家有忧国爱民的良好愿望，苦心经营，能创作这幅大型油画，表现出画家的赤诚之心，就应当受到肯定和尊敬。他这幅创作，表现他对受苦受难的人民的同情，对残暴的当局予以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这幅画完成后，陈列在他的新居傅厚岗六号的画室里。

徐先生在南京傅厚岗的新居，是一座两层的楼房。楼上是寝室，楼下西间是画室，东间是小会客室。他每天下午无课，就在画室里工作，平时家人小孩都不到画室里去，以免干扰他的工作。

这座两层小楼，是颇为一般的建筑，但比他原来在丹凤街居住的民间简陋的楼房，要好得多了。楼周围有宽敞的庭院，以竹篱为墙。院中养有一对大鹅，室内养有一只法国种的大花猫，这都是徐先生的范本。他的名作《日长如小年》，就是在这一期间画的。我曾在他的画室的画案上，见一张高丽纸，用木炭简单的勾了鹅的轮廓线，尚未落墨。有时他也不起稿，直接用毛笔，挥笔而就。

徐先生全家迁到傅厚岗新居，生活和创作条件，比过去优越多了。但他居安思危，把新居定名为“危楼”。“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日军在上海登陆，日舰在长江炮击南京城，这些事触目伤心，在国家危亡之际，南京政府，毫无抗战准备，却集结大量军队，围攻江西红军，徐先生认为南京不是久居之地。暂时的安居，危在其中。同时他在所作画幅中的题词，也同样表达出这样的心情。1934年冬，他画两只懒猫，躲在松树之下，安卧于危石之上，苟且偷安，莫此为甚。他以此鞭挞反动统

治者醉生梦死，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用愤慨之笔题道：

“颛顼最上策，浑沌贵天成，  
生小嬉憨惯，安危不动心。”

由此足见，他将新居定名为“危楼”，是与当时时代背景有关，绝不是过去一般“文人雅士”自标清高者所能比拟的。

徐先生的书法，很有造诣。早年在上海时，曾得康有为之传，醉心于北碑字体，尤其是对泰山经石峪大字，备加欣赏。那时，他曾有机会见到陈抟的真迹对联“开张天岸马，奇异人中龙”，借来，以三小时双勾临下，珍而藏之。<sup>①</sup>

徐先生在平时，常以“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八个字，表白他的艺术观点，个人的操守。这时他摹写经石峪字体，比原字略大，墨底白字，集此八字，为一幅对联，用黄绫边装裱起来，悬挂在画室的北墙上，非常引人注目。

“独持偏见，一意孤行”。这是大家所熟知的流行成语，常用作对人的贬词。徐先生借用这八个字，表明他的治学立场和处世态度。他和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作不懈的斗争，倡导走现实主义的道路，自谦为“偏见”。但他一生持这种“偏见”，始终不渝，好象顽固的“孤行”其己见。其实他的艺术观点，早向国人明确地亮明过。他早在《中国画改良论》一文中，关于挽救中国画应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融中西绘画之长等等，曾多次表白过他的“偏见”，而且要“一意孤行”。

当我在徐先生画室里，见到新装裱挂起的这幅集经石峪体字

① 陈抟字图南，宋代真源人。后唐举进士不第，遂隐居武当山及华山。周世宗召为谏议大夫，不受。太平兴国中来朝，太宗甚重之。赐号“希夷先生”，著有《三峰寓言》、《高阳策》、《钓潭集》。书法真迹传世极少。后此联勾勒上石，拓片流传于世。

的对联，心中早已知道，这八个字是他身体力行之句。我初看这幅集联，误认为是拓片集字，铁画银钩，几可乱真。我也见过经石峪拓片，字体好像没有这样大。我当时指着对联问徐先生：

“是拓片吗？原拓片字体似乎没有这样大。”

徐先生笑着说：

“是我摹写放大的。”他接着补充说：“我喜爱经石峪字体，曾临写过一个时期，这是按拓片摹写放大。”他问我：

“有点象吗？”

“我猛看认为是拓片集字而成，尤其是墨底很象拓片。”

徐先生笑着说：

“几乎把你骗住了。其实，主要的是这两句话。”

的确，可以用这八个字表明他的治学观点和为人的性格。

时过不久，陈之佛先生也照徐先生的例子同样摹仿经石峪拓片字体，集了一幅对联，也照样用黄绫边装裱起来，悬挂在他的住室内。上联：“众皆福相”；下联：“我亦佛心”。

陈之佛先生是当时在中大，担任图案画和美术史的讲师，是位好好先生，编了许多关于美术的小册子，在上海一些小书店内出版。他不到四十岁就留起胡须，吃素食，平时对人是一团和气。他这幅集联，正表现他的处世为人的态度，和徐先生的集联是迥然不同的。抗日期间，随中大入川，改画工笔花鸟画，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君也”

徐悲鸿先生倡导走写实主义的道路，是以写实作基础，各人还应有个人的特点和风格。他在出国举办中国近代美术展览之前，

作了大量的收集作品工作。他所选拔的作品，要具备民族气魄，并有个人独创风格的作品。一般陈陈相因，毫无生气、没有时代面貌的作品，是不选用的。

徐先生有次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述中国画。他对我国古代有创造性成就的画家，表示钦佩和崇敬。如：顾恺之、吴道子、范宽、马远、仇十洲、陈老莲等。对近代画家，他十分推崇任伯年、吴友如等。他对清代四王山水，猛烈地抨击，认为是全无生气的“人造山水”。不仅没有时代精神，个人风格也谈不上。因为他们不是来自现实和自然，像一个模式打出来的。

接着徐先生对《芥子园》作了评价。他说编纂《芥子园》虽是下了一番功夫，对学习中国画者有一定影响，起到一些启蒙和示范作用。它的致命伤，就是把中国画程式化了，使人不看现实，不师法造化，只在所列的程式中兜圈子，这样如何能画出好画来？这些“程式”是前人观察自然，经过体会，总结出来的，对学画者来讲，却没有这种体会。画树，像什么“介子点”，“胡椒点”，仅仅这样去画树叶，怎么能行呢？我们到大自然、山中、去看看，就拿树木说，你可见到见所未见过的树，闻所未闻的树，岂能包括在一个固定的“程式”中去？我们画一棵树，把树干锯一段，给你做柴烧，也得让你看得出是什么树的柴。徐先生既批评“程式”误人，同时倡导法自然，以造化为师。

他请张大千画幅画，预备带出国去展览。这时张大千在国内已很有名气，张大千喜爱石涛的山水画，又擅长仿石涛的作品，几乎可以乱真。徐先生向他说，请你画幅画，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仿古、摹古，请画你自己的画，就是连你自己的大胡子画上去也可以。



张大千早岁成名，其兄张善孖善画虎。在上海时，曾从著名书画家曾农髯习书法。张大千留一把大胡须，徐先生所说的把他的大胡子画上去也可以，就是请他画有自己面貌的画——要有自己的独创风格。同时预先付给他高达数倍的润笔费。

事隔不久，徐先生正在课堂上课，接到张大千从上海寄来的画件。当即拆封，展开画幅，是一幅四尺宣纸的整幅《荷花》。同学们都围上前去观摩，果然，笔酣墨饱，气势磅礴，不落前人窠臼，有他个人独创风格，是张大千一幅精心之作，非陈陈相因者所可比拟的。

下课了。徐先生把张大千寄来的作品，卷好，包起来，带回家去。他跨出教室时，和同学且走且谈。谈他对现代中国画画家的看法，对广东岭南画派高氏昆季及张大千，都颇为推崇，说居北平的齐白石也是当代了不起的大师。快要和同学分手时，他面带笑容地说：

“我以前到北平艺术学院一个短时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很费周折地请齐白石老人到艺术学院担任教授……”

谈起徐悲鸿先生和白石老人，还有一段轶事。徐先生从法国回来，于1928年10月，曾被任命为国立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到北平三个月，曾有改革中国画的良好意愿，却遭到顽固势力的种种阻挠。他很欣赏齐白石的国画作品，不为前人所拘，自辟蹊径，有独创，有个人风格。老人的工笔草虫，细致入微，而无呆板之弊；大笔挥洒，痛快淋漓，前无古人，为近代中国画坛中的异军突起。徐先生曾以三顾茅庐的诚恳态度，约请白石老人到艺术学院任国画教授。徐先生准备出国展览的选品，当然也少不了白石老人的佳作。白石老人的作品，在北平经常受到保守势力的攻

击。但白石老人并不孤立，前有著名画家陈师曾欣赏他的作品，继有徐悲鸿先生欣赏他的作品。白石老人对徐先生敦聘他为艺院教授，深感知遇，一生感激，引为知己。白石老人曾在赠给徐先生的一幅山水画上题道：

“少年为写山水照，自娱岂欲世人夸，  
我法何辞众人骂，江南倾胆独徐君，  
谓我心手出怪异，鬼神使之非人为，  
最怜一口反万众，使我衰颜满汗淋。”

1928年底，徐先生辞去北平艺术学院职务，白石老人画一幅《月下寻归图》送给徐先生，画上题有如下诗句：

“草庐三顾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  
海上清风明月满，杖藜扶梦仿徐熙。”  
“一朝不见令人思，重聚陶然未有期，  
深思人间神鬼力，白皮松外暗风吹。”

1945年夏，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徐先生即致函白石老人问好，白石老人复信中有这样的话：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君也”。

由此可见徐、齐交谊之深厚。徐先生出国展览，选用白石老人精品数件。

## 因材施教

悲鸿先生平时对学生的课业，要求很严格。但是坚持因材施教，对学生要求并不划一。有个别同学成绩差，进步慢，只要是刻苦用功，徐先生对他们从不作严厉指责，而是耐心地开导和鼓励。对穷学生，只要努力和有上进心，无论校内校外的，都设

法帮助他们。1933年春，中央大学在比国订购一批大型石膏像，如酒神等等，约七、八具。每座石膏像都在二米高以上。运来开箱后，有的手指和细微部分碰断了，需要修理。这时有个青年叫滑田友，把他的雕刻作品寄给徐先生看，并要求帮助。徐先生看他是个人才，就给他想办法，叫他暂时修理石膏像。修理工程不算太大，由学校给他一笔修理费，实际上是设法资助他。后来又送他到法国学雕塑，现任中央美院教授。

蒋兆和在南京失业，徐先生赏识他多才多艺，让他在家中走廊上做雕塑，介绍他为陈三立（散原老人，陈师曾之父）塑像，不久，介绍他到上海工作。在“一·二八”上海抗战开始后，蒋兆和热诚地为蒋光鼐和蔡廷锴画油画像，表示对这两位抗日英雄的崇敬。蒋兆和拟赴北平谋工作，徐先生专函介绍给齐白石，并为白石老人塑像。蒋兆和在北平东城，租了一所民房，开办私人画室，招收学生授艺，得以在北平站住了脚。

徐先生在课堂上，见到谁画一幅好画，或有进步的画，就热情给予鼓励，当众和他热烈握手，表示祝贺。那时男女之间，握手尚不习惯，假若是位女同学画幅好画，他主动来握她的手，表示赞扬。

我们初学油画时，徐先生给我们讲：

“素描是油画的稿子，在起稿时，要当作一幅素描，认真地描绘。动态、眼神、手、脚等，都要仔细描绘出来。轮廓要画准，明暗界限一定要勾画清楚。未上油色时，就是一幅完整的素描。否则，待你上了色，发现细部轮廓尚须修改，那就费劲了。”

我们初学油画，是按照徐先生指导的方法，一笔一笔往画面上摆色彩。这样可以避免油滑无力。

徐先生还给我讲用笔问题：

“中国画讲究用笔，西洋画也讲用笔。不过彼此使用的工具不同，用笔的方法也不同。油画中所谓‘笔触’，也就是用笔。但不要单纯追求笔触。必要的地方，来几笔有力的笔触，可以烘托细部，使整个画面活跃起来。”

回忆徐先生的这段教导，再细看他所作的巨幅油画《田横五百士》，有些衣纹飘带，是用特大号的油画笔，蘸足已调好的色彩，一气扫下来，真有痛快淋漓之感。

一个星期天，潘玉良先生率领我们，乘学校的大轿车到安徽省境内的采石矶写生。这里的长江水被两岸的岩石紧紧夹住，江面显得很狭，流水湍急，相传唐诗人李白曾游此地。岸上建有一座太白庙，塑有一座李白的坐像。庙前是一大片广场，长满青草，群众把它当作牧场。同学们在岸上，就平地取景。有位同学爬到采石矶顶上，把画架支起来，在只能容一人站立的岩石上作画，下临深渊，用鸟瞰式取景，画出两岸石矶和中间的滚滚江流。因为不能久立于陡石之上，又怕风把画架吹倒，经过观察之后，用大笔触描绘了这一景色，突出地表现了两岸岩石的质感，长江的激流。徐先生看到这幅画，立即大加赞赏，并亲切地和那位同学握手。其实这幅画的用笔方法，并不是按照徐先生在课堂上所教我们的用笔方法，一笔笔摆在画面上，而是大笔挥洒，犹如中国画的泼墨法的用笔，是急就式画出来的。由此足见，徐先生并不拘泥他教学生的方法，在写实的前提下，可以选定适合的表现手法。如果他发现谁的画，出现了大毛病，不管是谁，就是平时很器重的学生，也毫不留情地当众指责。1933年徐先生出国，宣扬中国美术，举办近代中国画展览。临时请假半年。我们仍按照徐先生教的路子自修油画课。孙多慈本是徐先生很器重的学生。她

的素描成绩，优异领先。但她的油画平平，在班上并不十分突出。由于徐先生不在学校，使她无所适从。她本人的油画基础，尚不巩固，她画的油画用色完全变为软绵绵的，光而无韵，软而无力。当徐先生出国任务完成后，回到南京，第一堂上课给孙多慈改画时，非常生气，大加训斥：

“怎么画成这个样子！把有骨有肉的活人，画成了一团棉花。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言词之间，声色俱厉。全班同学，鸦雀无声。虽然都各守在自己的画架前，用心画自己的画，却细听着徐先生面训孙多慈的言词，各人心中，也都很害怕。孙多慈站立在徐先生身后，一面看改画，一边隐隐哭泣着。徐先生就是这样奖、惩分明，就是他平时很器重的学生，也同样严格要求毫不含糊。

### 介绍列宾和苏里科夫

徐悲鸿先生出国宣扬祖国现代绘画，在巴黎展出后，曾受苏联邀请，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展览。在莫斯科结交苏联美术界许多知名人士，在莫斯科一次美术界集会上，对客挥毫，作《奔马图》。并向苏联赠送礼品，内中有一套南阳汉画像石刻拓片。苏联也回赠了礼品，是列宁和托尔斯泰的面模石膏像，外表刷成古铜色，还有油画等。他回国后，我去看望他。他指着那两具面模说：

“一路上，下船上船，我都亲手提着，怕损坏了。”

徐先生在苏联看到列宾和苏里科夫的油画，大为赞赏，誉为当代世界著名画家。他选购了列宾的油画复制品多张，带回向国内介绍。

徐先生在课堂大玻璃柜中，陈列了列宾的油画复制品，亲自用毛笔写卡片（那时他把列宾译为“列丙”），向同学们讲解并供同学们观摩。他首先指着《不期而至》，向大家讲解：

“你们看，全画面只画六个人物，各人的情感流露出意外的喜悦，表情各不相同，而且是恰如其分。站立在门口的女仆，其表情也恰到好处，可能她从未见过这位意外归来的主人，呆若木鸡地立在门口。一家人的喜悦和各有各的心情流露于外。”

徐先生着重介绍说：

“列宾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他是西方画坛最卓越的大画家。他不仅在《意外的归来》中，描绘人物内心活动如此之妙，而在其它各幅中，也同样显示出他这方面的才华。”他指着《伊凡雷帝》说：

“这是在心理学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大画家通过伊凡的眼神和动势，表现出他的复杂情绪和内心的不安，描绘得异常出色。”他又指着《给苏丹王子的一封复信》和《伏尔加河纤夫》说：

“前者画了众多的人物，把哥萨克族人的性格，描绘得淋漓尽致，唯妙唯肖，是近代画坛无与伦比的大杰作。而《伏尔加河纤夫》，虽是列宾的处女作，其描绘不同年龄，不同体质，不同心理的状态，已初露锋芒、初显才华。”他离开大玻璃柜一步，向大家说：

“你们不要仅限于研究意大利、法国的名作，也要研究其他国家的名作品，如：瑞典的初伦、英国的勃朗群、荷兰的伦勃朗、德国的丢勒和门采尔……。”

徐先生又强调说

“我们一向忽略对俄国艺术的研究。这次我到苏联去一趟，

看到俄国有许多很出色的艺术家。我们今后研究的对象，面要扩大一点，这才能博采众长。列宾可以说是近代俄国的代表画家，他列于世界著名画家之林，毫无愧色。假如有人倡议，选举近代西方画家，我将投列宾一票，他应当被当选为近世西方画家的首席代表之一”。

这堂课，我们都受益不浅。过去只知道希腊的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及英法的艺术，对俄国的艺术，真是一无所知。徐先生带回俄国艺术的复制品，使我们开了眼界，扩大了视野。

不久，徐先生又把意大利文艺复兴期三位杰出大师的杰作，如米开朗琪罗画的《西斯廷》，拉斐尔、达·芬奇的名作。还有法国巴斯蒂昂——勒帕热的《垛草》，印象派创始人马内的《吹笛子的少年》等，陈列在大玻璃柜中，同样也给我们作了讲解。徐先生不担任美术史教学，但他以具体作品指导学生，从而使学生了解西方美术的发展。

一天下午我去看望徐先生，适宗白华先生在座。他拿出许多图片，让我们看。宗先生拿起达·芬奇作的《莫娜·丽萨》仔细欣赏，爱不释手，徐先生就慨然地赠送给他。并把列宾的名作以及《垛草》、《樱桃与少年》等作品的图片赠送给我。

宗先生和我离开傅厚岗徒步回校时，且走且谈。宗先生手持那幅举世闻名的杰作《莫娜·丽萨》，非常珍惜，他还风趣地说：

“要徐先生的东西，就得及时。失掉时机，也就要不到了。”

宗、徐是在巴黎和柏林建立的友谊，归国后，又同在南京中大任教，宗先生担任中大哲学系主任教授，讲授美学课，艺术系同学常选习他的课。笔者就选习他讲述的美术课达三年之久。有

的裸还重选两次。

我把徐先生赠给我的名作图片，收藏在我的画夹中，不时拿出来欣赏研究。解放后，虽印行了列宾画集，但色彩效果大都失真。后据徐先生谈，他所带回的名作复制品，是当时欧洲第一流彩色复制品。

### “共栖一枝温旧梦，何须红叶寄相思”

1934年寒假，是南京近几年来最冷的一年。假期只有两周，我留校没有回家，留校的同班同学只有两三个人，分住在几个宿舍内。这年冬季大雪，平地达一尺多深，这在南京是很少见的。放假前几天，我同几位同学去徐先生家里，看他的画。画室内徐先生一人伏在画案上，画了两只白头翁，栖在枫树枝上，周围点缀几片红叶。深秋寒鸟，自有一番情趣。这是应某友人夫妇之请，而作此画的。我们去时，徐先生刚在画上题完了字。画上题道：

“共栖一枝温旧梦，何须红叶寄相思。”

题完，尚未用章，适有客人来访，徐先生陪客人到会客室谈话去了。

同去的有位云南籍的同学名杨柳，他先习哲学，后入艺术系学画。此人擅长摄影，对绘画不拘法度，胆大豪放。见画案上，另有空白高丽纸，即就案仿徐先生的画稿。画了一只白头翁，栖于枫树枝上，也添几片红叶，并改原稿题句，写道：

“独栖一枝寻幻梦，红叶何处寄相思。”

画完，大家哈哈大笑。徐先生送客人回来，听见画室内笑声，来到画案前，看了杨柳的仿作，改了原题句，笑着说：

“大概你还没有结婚吧？”又郑重其事地说：



“不要学我的画！”

随后，我们立在徐先生第二幅大型油画《傣我后》之前，仔细观摩欣赏。画幅中有些形象都是我们所熟悉的。甚至都可叫出名字来。这画幅完成不久就有人批评说是“模特儿堆积”。他们不了解一幅人物众多的画，不借助现实生活中的适合形象，是难免要雷同的。西洋画名作中，收集需要的人物形象完成创作，是不足为奇的。

在画室陈列的，还有徐先生的近作——一女模坐像。背景是山野景色。天空中有块白云，远望那朵白云，似乎是冉冉向上升起，在全幅画中起到静中有动的效果。当时我向徐先生说：“这朵白云，添得真妙。”徐先生就这幅画给我们讲述一段话。

“这幅人体画完后，调色板上的脏颜色被利用来画背景。”他指着女模身下的石坡，远山和山后的云层。“在清理调色板时，在剩余的脏颜色中，稍加调一些别的颜色，用画刀抿上去的。那朵白云，也是用画刀抿一下子。”

徐先生画油画，从不浪费颜料，看准所需要的颜料，挤在调色板多少是心中有数。待到画告一段落时，调色板上的颜料，恰恰用完。在清理调色板时，用画刀刮在一起，根据画面的需要，再稍加一些别的颜色，用画刀稍一调和，随即用画刀抿在适当的部位。画完后，调色板是干干净净。我们初学油画时，就掌握不住用色量。在画一段落时，调色板上的脏颜色留下一大堆，非常难处理。

到旧历除夕日下午，徐先生派人通知我们几个留校同学，让在初一上午，到他家里过年。

我们如约到徐先生家里，向老师祝贺新春之禧，并在画室里

浏览徐先生的新作。画室和往常一样，没有什么为新春的特殊陈设。仅在东墙上，悬挂起三幅中国画新作。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画猫的一幅。画面上两只大花猫，一只酣酣大睡，另一只醒来作伸懒腰状，睡犹未足，背景是几朵向日葵。画上题道：

“团圆有愧色，昏昏又一年。”

这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年，日寇侵占我东北四省，仍步步向关内进逼。政府当局，浑浑噩噩，一年一年地过去了，仍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徐先生是位爱国忧民之士，眼看外患日急，而当权者漠然视之。他身居于“危楼”之中，昏昏的一年过去了，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做出什么贡献，虽然和家人儿女团聚在一起生活，实乃有愧。这是徐先生在新春之始回顾过去的一年，自己向自己敲敲警钟。也是向当局敲敲警钟。一年过去了，对抵御外寇，收复失地，救东北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你们做了些什么！这幅画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解放后，我曾写一篇短文，回忆此事。这幅画现时已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了。

中午，我们同徐先生全家一同吃了年饭。当我们告辞回校时，走出画室到大门口，看见大门内挂了一块硬纸牌子，上面由徐先生亲笔向来访者写了三条要求。现在回忆起来，头两条已记不起来了。第三条是“……请勿馈赠”。大概是常有人来访，请谋事或求画，并向徐先生送礼物，所以写出这个牌子，不接收来访者的馈赠。

### 给孙中山先生画像

多少年来，不少艺术界同道，写纪念徐悲鸿先生文章，谈到他的政治操守方面，经常提及的一件事，就是他坚决拒绝为蒋介石

石画像，这里无须重述。他乐于为孙中山画像一事，知之者尚不多。

1934年秋，一天上午下课时，徐先生把我叫到他跟前，轻声说：“今天下午三时，到我家里去，有部车子来接，我们一同出去一趟。”我没问什么事和到哪里去，老师既通知，一定有事，就点头答应了。午后，我准时到傅厚岗徐宅。这时徐先生才告诉我说：“我给孙中山画幅油画像，在交通部楼上，停会车子来了，我们一同去看看。”被约的同学，还有两位。一是扬州人周希杰，另一位，想不起来了。

南京交通部位于中山大道西侧。费时几年才兴建起来，是颇为豪华的一座政府机关大厦。那时刚落成，尚未迁入办公。已去职的前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内定为交通部长。

徐先生和我们三人，同乘交通部派来的一部黑色小卧车，到达交通部新址。二楼上有一间小礼堂，北面墙上，是画孙中山遗像的位置，下面搭成相当高的杉木架。我们到后，徐先生穿上画衣，拿起大调色板和画笔，立即上到杉木架上，对着未完成的画像，开始工作起来。我们三人立在下面，仰头凝视着徐先生工作。据我的回忆，这幅画像是画在墙上的壁画形式，选用孙中山四十多岁时，一幅著西服的半身像，画像工作已接近完成。这幅画像，虽说是根据黑白照片，徐先生却运用他画像的丰富经验，设色非常明快，人物形象风采奕奕，两眼炯炯有神，发出平易近人的目光，刻画出一位终身致力于民主革命的革命家的精神面貌，非一般仅以外貌相似者可比。尤其在眼神刻画方面，显得异常突出。设色爽朗清新，似有吸收浪漫派敷色技巧。我所见到过的孙中山画像，这幅是独一无二的一幅高质量的艺术品画像。

徐先生特意通知我们三人，来看他实际操作，是一次具体的示范教学。我在徐先生画室见过他的多数画像。如：谢寿康大半身油画像，张继的画像，为蒋碧薇所作的多幅油画像，都没有这幅画像生动逼真。画这幅画像要爬在三米多高的杉木架子上，不能退后几步，看看效果，是相当吃力的。徐先生有意身教我们，不要怕吃苦的工作，同时也含有“珍视自己的艺术”为什么人画像的用意。他对民主革命的先进领袖孙中山先生，是怀有敬意的，所以他乐于接受这项任务。

### 从弗拉孟先生习油画

在我们四年级时，除在课堂上画人体油画外，徐先生开始指导我们搞构图。有次，他在课堂上向同学们讲述在法国从弗拉孟先生习油画时搞构图的情况。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员伤亡惨重。就以巴黎而言，许多家庭的老人失去了儿子，年轻的妇女失去了丈夫，遗留下孤儿。可能他们的儿子和丈夫，在战场上立过战功，甚至得到什么勋章的荣誉，但他们的战后生活，是无人过问的。弗拉孟先生看到阵亡将士的身后境况，对他们深表同情。于是让他的学生构图，表现这一主题。徐先生谈到他的一位同学创作这个主题画，非常成功。画面是一间简陋小屋，屋顶已破了一个洞，射进来的阳光恰恰照在床上病中的孤儿，遗孀无可奈何地注视着奄奄一息的病儿。墙角阴暗处，悬挂一幅军人小照，照片下面，挂着一枚在阴暗中发出微弱闪光的勋章。这就是在世界大战后，阵亡将士遗属的生活写照。弗拉孟先生对此画，颇为赞赏，评为全班第一。徐先生谈到这里，夏同光在旁边冷问了一句：“徐先生，您怎么构图的？”徐先生立即答道：“我的一

幅构图是全班最坏的。”

徐先生接着给我们布置构图任务，他举出学校里担水工人，长江岸上的纤夫，街头上小贩……等等。让我们到市面上走走，到长江边看看，先作些速写，画成小幅草图，然后再画成较大幅的油画。下课后，同学们各自进行构思。杨建侯画了一幅打铁的，有的画了打扫厕所的老校工，有的在街头上画了卖蒸馍铺，热气腾腾的一笼馒头刚出锅，白胡须老人在热气中叫卖。徐先生欣赏在叫卖的白胡须老人，当众表扬了这位同学。

徐先生处在旧中国，虽是爱国忧民，同情下层的劳苦大众，对他的学生在进行创作时，指定在这个范畴内进行选题。他在四十年代入川后，画《巴人汲水》和《贫妇》，也是表现他的爱民思想的。但他受时代的局限，并没有深入到劳苦大众的生活中去。只有在解放后，他接触到马列主义学说和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有关文件，才感到过去没有深入群众。在北平解放后一年多的时间，1950年春，中央美术学院正式成立，建院典礼众中大会上，悬挂一幅长条大字，上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徐先生亲自约白石老人写的。挂在礼堂中，异常醒目。这是徐先生在晚年，走上一条崭新的创作道路的开始。

## 画 猪

徐先生平时教学引导同学重视画人体，并不反对在室内画静物和出外作风景写生。他有次因事去上海，临行之前，他对我说：“我去上海几天，顺便给你们买点美术用品，你需要什么？”我想买一盒100色的色粉笔。徐先生回来后，除了其它用品让我分给大家外，一盒60色的色粉笔交给我。我问，为什么不买100

色的？徐先生打开盒盖，指着这些色粉笔说：“你看，我特意选购这种的，是让你画人体和人像用的。”由此足见，他随时引导学生着重画人体和人像。徐先生也偶尔画风景。我曾见他在南京台城，支起画架，画鸡鸣寺秋色。他去庐山，画五老峰。去泰山，画泰山松树。虽是小幅，用炭笔画成，却一丝不苟，非常可爱。1935年春，他亲自领导我们去天目山写生。我因一幅毕业创作的油画未完成，一时放不下手，又以手中不便，和几位同学留校未去。两周后，随徐先生去天目山写生回校的同学张蓓英、孙多慈先后向我说，你没去天目山，徐先生问你呢。待见到徐先生时，他亲切地向我说：

“你这次没去天目山，很可惜。后来知道你没钱了，其实不花什么钱。你是北方人，应当多看看南方的山水。”接着他又说：

“你们河南的嵩山，我曾去过，和南方的山势大不一样。毕业构图是必须完成的，到处处多看看，也是必要的。”他稍停一下，接着说：

“我在法国最后二年，虽然没有停止画画，更多的时间，是到欧洲各国跑跑，既可广见闻，又可得到大自然给你想象不到的启发，这是在画室内所得不到的。”老师给我的这一番教导，我一直铭记在心。

徐先生还倡议，在我班毕业之前，到日本去参观一次。我们曾在校园草地上，开了一次筹备会。徐先生和陈之佛先生都参加了筹备工作，并约请陈之佛先生担任翻译。这事提交到学校当局，发生了阻力，以中日邦交紧张为借口，不准我们东去参观。此事只好作罢。

这年春季，徐悲鸿先生于春节之始，旧历适值乙亥年（俗称猪年），即兴画了一幅《墨猪》，并作题记：

“少年也曾锥刺骨，不徒白手走江湖，  
乞灵无着张皇甚，沐浴熏香画墨猪。”

中国画单画猪于一幅之上的很少，不象画马、牛、羊、狮、虎、猫等动物，可以单独处理在一幅画面上。而徐先生却创一格，在一幅立轴画面上，仅画一只正面的墨猪。

这幅画完成后，曾临时悬挂在画室墙壁上。我见到此画时，是刚画完挂起。这时蒋碧薇也在画室，见我们看这幅画，她在一旁自言自语说：“我是属猪的。”这幅画并未发表，不知怎样传了出去，也可能送去装裱时，在裱画店被人看见而传出去的。南京有一家小报记者卜某，及一小撮宵小之徒，就借故攻讦，攻击该画幅上的题句，“不徒白手走江湖”的“徒”字，是个错别字，因而给徐先生起个绰号“不徒大师”。徐先生得知后，付之一笑说：“不值一驳。这些人连字典都不会查。”这则题词的头两句，正是他对自己少年时代刻苦学习，随父走乡串镇，卖画为生的自写实况。这幅画现收藏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

## 只可画八分

1935年夏，大约在七月底，我将要离开南京，到北平工作。临行之前，向悲鸿先生告别。我带了荣宝斋精制的藏画册，请他挥毫留念。徐先生翻阅一下，全是空白页，随即说：“我不能画在第一页”，翻到中间一页，即挥毫画一幅猫。一匹大花猫，卧在石头上，猫的面部和两只眼睛不仅画得有神，而且像是一个可爱的娃娃面。用拟人法，即席一挥，如果心中无数，是不会刻

画得如此迅速而有神韵的。画后题上“敦礼仁弟永存”字样。徐先生也可能对这幅画较为满意，题上“永存”，是有深意的。这部藏画册内，还有吕凤子先生和友人王青芳的画。另有一位画在最后一页，此人信佛，因题词不当，在十年动乱开始不久，被一位“勇士”当众揭发。我当然把珍藏多年的画册，“敬献”出来。裁开最后一页，作为某人的“罪证”，我随即被大字报围困三天，心想，我这部画册完了。事有出人意料，经本单位的好心人，代我保存，三年之后，托人归还给我了。徐先生题有“永存”字样的画，得幸免于难，保存下来。

徐先生给我作画后，随即写了两封长信，介绍我到北平后，去拜见齐白石老人和杨仲子先生。待到寒假时，我专程去南京，看望分别半年的徐先生。当我走进画室，顿时觉得有些异常。四壁空空，完全变成一间空空荡荡的屋子，过去悬挂的画件等，全没有了，靠门口仅放一具长沙发。蒋碧薇从楼上走下来，接待了我，坐在长沙发上谈话。这时，我简直不知说什么好。蒋碧薇细声细气地说：

“徐先生到桂林去了。”她似乎心平气和慢条斯理地谈了半个小时，我一言未发。我了解徐先生家庭不和。一年前，我来到画室，见到在墙角里摆了一张带被褥的床铺，我以为是临时有客人来住几宿。这时，我回忆那张床铺，是否在那时他们夫妻就感情破裂，开始分居了。又回忆半年多以前，徐先生带学生去天目山写生，蒋碧薇就离开南京，回宜兴娘家去了。徐先生从来没有向学生谈他家庭的事。看到今天的画室，回忆我往日来这间画室不知有多少次，每次都见徐先生伏案作画或写字。这次我来的仍是这间画室，真有人去楼空之慨。事先未接到他的信，不知



他要离开南京，别离之情，在我心中起伏着。在我心不在焉的情况下，蒋碧薇谈了半小时的话，我只记得几句。她表示对徐先生还是很关心的，说他一个人去桂林，没有助手，很不方便，她希望中大同学能去几位……她说话是那么文静、柔顺，对她们夫妇感情破裂一层，好象没那么一回事一样。她可能也心事重重，外表是镇静自若的。我过去虽然常见到她，她有时也去我们教室，我从没有单独和她谈过话。在这样场合之下，我一句话也插不上，不便久坐，就匆匆告辞而去。

次日去看望我的系外老师李毅士先生。老人因车祸，腿部受伤，刚出院在家休养，走动尚不方便。老人坐在沙发上和我谈话。

又得知我的风景画老师潘玉良先生，<sup>①</sup>脱离了中大艺术系教职，只身到法国，定居巴黎，以卖画为生。她的离去，是有多方面复杂原因的。她热爱祖国，热爱艺术。但她的身世、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复杂的家庭关系等因素，迫使她饱含着眼泪，只身离开了祖国。

那天晚上，我住在母校附近的一间旅馆内。思绪万千，夜晚不能入睡。看着我在北平半年来所作的画件，未打包的仍放在我的床头，使我回忆起悲鸿先生经常教导我们的一句“口头禅”：“曲不离口，拳不离手”。也就是让我们画画，每天笔不离手；但又不叫我们每天死画不停。他曾在课堂上详细地说：

---

<sup>①</sup> 潘玉良原姓张，随夫姓改姓潘。早年留学法国，习油画、雕塑。后到罗马意大利皇家美术学院。回国后，曾在上海举行个人画展。1932年被聘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1935年夏离职，再度出国，定居巴黎，达42年之久。她始终保持一位中国人的尊严和傲骨。于1977年9月22日病逝于巴黎，终年78岁。

“你们每天若有十分画兴，只可画八分，万不可把十分画兴都画尽，要留二分，进行思考。经过一夜的思考和酝酿，第二天，你的画兴就可增加到十二分。第二天作画，仍要留二分画兴。否则，天天死画，不加思考和研究，就会变成低能的画匠了。”

这个教导又一次涌上我的心头。但我又想到，每年寒、暑假离开徐先生一个短暂时间，回校第一次见到徐先生时，若不拿作品请他看，他是不高兴的。这次我特意带来了在北平半年的作品，却暂时得不到徐先生亲自过目指教了。只好选出油画两件，粉画一件，面托陈之佛先生代送全国第二次美展筹备处，作为应征作品吧。随后向徐先生作通信汇报。

我在大学毕业半年后回到南京，满想和诸位老师会面请教，不料悲鸿先生投奔桂林，玉良先生远走异国，毅士先生车祸伤腿，使我心中闷闷不乐，感到南京的冬天忽然变得阴森寒冷，心情也随之沉重，不日，冒着小雨加雪，登上旅途，返回冰天雪地的北国故都北平了。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为纪念徐悲鸿先生逝世30周年而写的《一代宗师徐悲鸿》一书中的第三章。标题和小标题是编者加的。）

## 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终生的 罗静予同志

黎 莉 莉

1970年，我还在北京电影学院被迫接受“监督劳动”。1月26日清晨，我被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军宣队告知：“罗静予不见了。”我立刻意识到，长期的精神折磨，被迫无休止地交待莫须有的“罪行材料”，把他的一颗火热的心扑灭了。我哀恸、悲愤，但是竭力控制自己。我当时的处境，唯一能选择的只能表现出强作镇静，泪水往心里流。

在我和静予三十二年的共同生活中，因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虽然相聚的时日并不多，但他的为人处事，他那勤奋刻苦的工作态度，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和他对祖国电影事业的一片赤诚，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忠心耿耿，愿为它而献身，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我怨静予为什么如此脆弱，竟甘心不清不白地倒了下去。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维护正义，被国民党反动派诬陷为“勾结异党，图谋不轨”，曾受尽牢狱之苦，反动派以死胁迫，静予犹能巍然不动。他经受过旧社会的磨炼，也经历过新社会的考验，但是到底禁受不住“文化大革命”的“横扫”和“四人帮”的淫威，如今终于含冤倒下了。

1978年4月4日，文化部落实党中央的政策，召开万人大会，罗静予的冤案也在会上得到平反昭雪。我和子女们套在脖子上长达八年之久的反革命家属的枷锁，也从此得到了解脱。

1979年10月底，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召开时，我遇到与静予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们，他们无不痛惜地慨叹说，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在电影工业、电影技术这块园地上，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个不知疲倦的辛勤园丁了。

罗静予出身在一个贫寒家庭。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少年时期在乡下务农，结婚后，在成都的一所教会办的小学教书，后又到教会办的孤儿院当管理人员。母亲是劳动妇女，在同一个孤儿院当保姆。老两口的收入难以养活六口之家。1925年，父亲因患肺病而失业。在军阀混战的年月里，民不聊生，在一次“跑反”中，母亲忍痛将尚在襁褓中的幼女遗弃街头，竟无人收养，只好又抱了回来。三弟生病无钱医治，因吃了过量的偏方变成了傻子。大哥罗尊荣，16岁考入成都邮政局当邮务生，一家的生活都落到了他身上。静予为了减轻大哥的负担，从孤儿院小学毕业后，乃转入可以免费的锦江公学和少出费用的资属中学，一共才读了初中一学年，最后终于辍学，年仅十四岁就踏入了社会。

静予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统治趋于崩溃，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剧，军阀割据，内战连年，国家民族处于深重灾难的时期。当时北伐正在胜利推进，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烈火，也照到了成都。他在踏进社会以后，立即卷入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静予失学后，没有找到一个混饭吃的职业，无可奈何，他便整天站在书店里阅读各种书刊，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他在《自述》中曾

说道：“幼年失业，立书店中读创造社刊物，瞎作新诗，旧社会折磨不少，浅尝辄止……”事实上，他在阅读中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幻想着有一天能参加革命队伍。1926年，他在成都参加了通俗教育馆创办的少年俱乐部。在那里，党的外围组织把失学和在校的青少年组织起来，补习功课。静予接触到的第一位进步同志就是通俗教育馆的工作人员张子玉，他是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派到成都来的。在张子玉同志的领导下，少年俱乐部的成员参加群众示威游行，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到商店查抄日货，并把日货烧掉。

1927年上半年，他由张子玉同志介绍，参加了CY组织（共青团）。从此，他听从比他年长的同志张子玉、刘坚予、李宗林、柯仲生、杜刚百、张用五、张志和、李铁夫、罗承烈等人的引导和帮助，先在成都替刘坚予同志办的《火星报》跑腿送报，又替报纸画木刻列宁像的底稿。《火星报》被查封，刘坚予牺牲了，静予与李宗林同志（解放后任第一任成都市长）到彭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第七混成旅的宣传队当学兵。在宣传队除学习军事外，还在政治课中了解到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在他的思想中激起了重重波澜。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将国民革命军中的宣传队、学兵队、兵运工作组织等先后解散。静予为了追随北伐革命，四处奔波，上山到邛崃，下水到丰都。有时饿着肚子还要帮人拉纤，在饥寒困苦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这期间，他曾在邛崃第二十四军第三旅当过“小先生”，教战士唱《打倒列强》歌，讲解不平等条约。1927年下半年，他被派到旅长张志和同志在重庆创办的《新社会日报》当校对。此时，张用五、柯介安同志，安排他参加CP（共产党）军事小组的活动。

《新社会日报》被控宣传赤化，遭到查封后，他到涪陵国民革命军二十军政治部当科员。后又辗转回成都，在《锦江日报》、《成都新闻》当校对和助理编辑，最后来到李铁夫同志（当年是刘文辉的副官长）创办的永宁书店（店内只有静予和王仲宣二人），他既当经理，又当店员。这个书店门市出售一般书籍，暗中递送上海地下党的铅印报纸和进步书刊。书店是李铁夫自己出资办的，他怕戴上“红帽子”，不久就停办了。

由于白区左倾路线的错误，江津暴动的失败，进步报纸和书店，均被军阀查封。当时的地方组织不够严密，而革命处于低潮，上级同志不能照顾象他那样年轻的基层分子，永宁书店停办后，上级党组织不曾安排他另外的工作。他征得张用五同志（当时直接领导他）的同意，决定出川求学。出发时，静予的父亲抱病送游子上路，紧赶着滑竿，气吁吁地叮咛：“要认真攻读，待人以诚。”“临难勿苟免，临财勿苟得……”这些话不久便成了贫病交加的老父的遗训。

静予出川时，张用五同志口头授意他到南京玄武湖图书馆去找詹道中同志接上组织关系，但到了南京后，詹道中未能给他接上关系，因此失去了与党、团组织的联系。于是他决定投考不要任何费用的马尾海军学校，又因超龄未能报名。以后，他得知詹道中也失去了组织关系，于是和李铁夫到了上海。在上海遇见了罗承烈（曾任《新社会日报》社长），并得知官质彬（解放后任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总工程师）经张志和的资助在上海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读书。他托罗承烈向张志和请求资助，得到了和官质彬同样的读书机会。这样，静予和官质彬、郑伯璋成为同学，以后他们都长期从事电影技术工作，成为中国电影科技界的骨干。后来，静予毕

业于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和南洋无线电传习所。“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他还未毕业，便志愿参加了十九路军的昆山电台工作，担任无线电机员。在炮火中，他毅然从事报务活动。后因资助断绝，不能复学。此时郑用之（曾任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和王士菁正为当时的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编辑《第五军淞沪抗日画史》，他们便邀他一起来参加编辑工作。当时他还替郑用之办的《新大陆报》做校对和排版工作。《新大陆报》被查封后，他又在郑用之办的《中国新闻社》刻蜡版，半工半读，就这样维持生活。1933年，他进入黄炎培主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英文补习班学习。他通过勤奋的学习，打下了电机工程和外文的基础。

1933年夏，静予走出校门，却没有找到工作。郑用之要他搞电影的“唱片配声”，这就需要用电扩大系统，是和他所学的专业结合的。郑用之派他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无线电部订购部件，做成了配音机。郑用之利用他这方面的专长，把他拉入南昌行营政训处的电影股作配音员，由他和郑伯璋共同操作这部配音机。《孙中山逝世记》的配音，便是最早的一次实际应用。从此他就开始从事电影技术工作。

1935年秋，他被派赴汉口筹建电影制片厂，初具规模时，爆发了“七七事变”。武汉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以后，在郭沫若同志的第三厅领导下，电影股改组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罗静予被任命为该厂的技术副厂长。他除了负责技术部门的工作外，还学习洗印、摄影等技术，并编辑了《抗战特辑》五集。其中有与袁牧之、钱筱章合编的，吴蔚云、郑伯璋、官质彬都参加了这个工作。此外他还编辑了《抗战歌集》，其中有周小燕参加演唱的《满江红》、《长城谣》、《打回老家去》等流行的抗战歌曲。

1938年秋，“中制”厂从武汉迁到重庆，由于电影胶片和其他器材的缺乏来源，同时考虑到利用电影这个武器把团结抗战的号召扩大到海外侨胞中去，“中制”厂指派静予到香港筹组分厂。当时港英当局尚守中立，怕得罪日本人不能以官办的名义在香港设厂，乃改用“大地影业公司”名义，拍摄国语抗战片。同时派到香港的有吴蔚云、钱筱章、黎莉莉和洪虹等同志。在香港的原联华公司演员李清、蒋君超、白露等同志，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当时在香港的欧阳予倩、蔡楚生、司徒慧敏、谭友六、罗茅等正在谋求开展抗战剧运，静予便和他们取得联系。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欧阳老对“大地”的热情支持。为了祖国的前途，扩大抗日宣传，他毅然停止正在演出的话剧，把他所领导的“中华艺术剧团”的全部人员投入到拍摄抗日电影工作中来。蓝马、李景波、孙景璐、杨薇、姜明、童毅、吴景平、戈鑫、奚蒙、李化、谭光友等同志，大多数是话剧演员，初次上镜头，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家不计报酬，不辞辛苦，全力以赴，只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由蔡楚生导演的《孤岛天堂》。该片在国内外上映，曾轰动一时，起到了宣传抗战的作用。此片选定于1939年五一劳动节开拍，那时我已怀孕七个月，北方舞女一角因找不到合适人选，蔡楚生动员我来扮演。我看到许多老朋友对拍摄抗战片如此振奋，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产后一星期，我又继续工作。静予竟忙得没有时间到医院来看望我。以“大地影业公司”名义拍摄的影片，除了《孤岛天堂》一片外，还投产了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的《白云故乡》。并完成了司徒慧敏编剧的《血溅宝山城》国语版配音工作。

静予任“大地”公司经理兼制片人，白天忙于行政事务，晚



上还要装配录音机（由于资金不足，更因为外商垄断成套录音设备，在得到香港中华无线电研究社陶胜百先生协作下，自行装配制造了当时中国的第一台“变积式”录音机），并亲自担任录音工作。1940年夏秋之交，太平洋战争形势紧张，大地影业公司停办了。《白云故乡》是回到重庆后摄制完成的。

1941年，美国电影工程师学会邀请静予去美出席年会，经“中制”厂厂长郑用之同意和当时政府批准，他前往出席，并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与美国拜而好电影机械制造厂合作，在中国设厂制造电影机械设备。他携带了抗日初期“中制”厂出品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热血忠魂》、和“大地”出品的《白云故乡》、《孤岛天堂》以及《抗战特辑》等八、九部各类影片的底片，准备在美国复制放映，以宣传抗战；并争取与美方合作，拍摄抗日影片。此行还带去了由郭沫若题词“银坛巨匠”、“为国争光”，有重庆文化界许多知名人士签名的两幅卷轴，分别赠给卓别林和黄宗霑（因卓别林的许多影片如《摩登时代》、《大独裁者》有力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辛辣地讽刺了德、意法西斯侵略者的咀脸，黄宗霑是中国在美的著名电影摄影艺术家）。静予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计划在美国学习电影工程技术。

这个时期，静予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关心和接见，亲聆教诲。1941年，蒋介石背信弃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总理为了使文艺界了解事实真相，曾邀集文学界、影剧界人士愤怒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一阴谋罪行，我和静予也参加了这次集会。

1941年11月5日，在静予出国前，周总理亲笔写信给静予，对他此次赴美，寄予期望。总理在信中写道：“兄远行不克饯行

为憾。唯祝早达太平洋彼岸，宣扬国光，艺术猛进，至所祈祷！……”行前，“中制”厂厂长郑用之为他饯行，周总理、郭沫若、阳翰笙等同志均在座。席间，周总理谈到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对国民党顽固派搞投降活动深为痛心。饭后，并单独和静予谈了话，当讲到我父亲（静予的岳父）钱壮飞烈士革命经历和光荣牺牲这段史实时，总理缅怀亲密战友，感于抗战受到挫折，忧国忧民，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一再勉励静予要继承父辈的革命遗志，完成先烈未竟的事业。总理对国家的前途和对革命战友的一片赤诚，使静予深受感动。总理在离座时错穿了静予的风雨衣，过了几天才换回来。总理穿过的这件风雨衣，我们一直保存到今天。总理多次谆谆教导，对静予的人生观和实际行动起着重要的影响。

1941年12月7日，静予与翻译员冯天佑乘船去美。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偷袭了檀香山岛的珍珠港。他们所乘的船在航程中本应停泊此港，因尚差两日航程方能到达，幸免于难。此船即绕道到达旧金山市。“中制”厂由重庆运至香港转往马尼拉的全部抗日影片的底片，则滞留马尼拉海关仓库。他们在旅途中虽多次拍电报促使馆将底片转运，但因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已无船航行远东，这些珍贵的资料因菲律宾沦陷，据说落到了日军手中，至今下落不明。

在电影工程师年会上，他作了《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电影》的学术报告。年会结束，因美国参战后一切进入战时状态，有些任务，未能完成。他想回国，既无交通渠道，乃滞留美国。他抱着为祖国电影事业献身的精神，利用各种机会钻研电影工程业务知识，曾去芝加哥考察拜而好厂和狄弗莱厂的电影机械生产技术；

去矮克发厂、柯达胶片厂考察感光材料生产；去纽约的电影机械厂、洗印厂进行考察。因电影胶片制造涉及化工，他又开始半工半读，进华盛顿大学化工系攻读。好莱坞制片厂的一个导演卡泼拉在美国陆军电影处工作，此时正在编辑记录片《为何而战》，已出品《征服与分裂》、《英国之抗战》、《苏联之抗战》等。静予应他的邀请，帮助他剪辑了《中国之抗战》。在滞留美国的四年间，他接受张治中给他的任务，协助兵工署派在华盛顿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委员会的王乃宽，利用租借法案办理电影器材的供应事宜，并参加了美国军事教育片的译制工作。

1942年，张治中因故撤消了郑用之“中制”厂厂长职务，换了吴树勋。1944年，又换蔡劲军（曾任警察局长），这两人都是行伍出身，不懂电影。

日本投降后，他接到张治中的电令，调他回国任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并指示他在美国聘请一名电影顾问。1945年10月底，他和美国顾问贾德汉（好莱坞电影科学艺术学院总干事）同乘班机到重庆。

总理为执行毛主席在1945年8月13日发表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所提出的，往返于延安与重庆之间，日夜操劳，在百忙中，还抽出时间于1946年1月26日，用别名“豪”写信给静予，说：“容暇，当谋面也。”同年2月初，总理和邓妈妈邀约我母亲张振华、静予、我大弟钱江、小弟钱镗（钱一平）和史平（大弟媳）等全家（当时我尚在国外）到曾家岩五十号便餐，在座的还有阳翰笙、司徒慧敏同志。自从1931年我父亲转移到江西苏区后，总理一直很关心我们这个家庭。1941年初，我从内蒙拍完《塞上风云》外景回到重庆，在一次集会上见到总理和

邓妈妈，我向他们汇报了我去内蒙时曾两次在延安停留的情况，表示对那里的战斗生活非常向往。总理对我说电影也是一个重要的阵地，嘱咐我要安心把现职工作做好。他又问到我家里人的情况，我也一一作了汇报。不久，总理亲自安排我的两个弟弟赶上最后一班车送往延安。此时，钱江等从延安到了重庆，静予也从国外归来，这次总理特地约会，是为了亲自向我母亲和全家叙述我父亲钱壮飞在长征途中牺牲的情况。

曾家岩五十号四围，布满了国民党特务，为了避开歹徒耳目，我母亲等先乘“中制”厂的汽车到上清寺，然后改乘总理派我小弟弟钱镛驾驶的他自己的车，到八路军办事处。餐前，总理恳切地对我母亲说，在战争年月里，党对烈士家属没有力量照顾，现在孩子们都成长起来了，应当感到安慰。莉莉也很努力，都在为革命作贡献。席间，总理给我母亲敬酒，慰问她多年来的辛苦，还说到我的两个兄弟今后到哪里工作，可以再作安排，回延安也可以，在国统区工作也可以。我母亲表示，革命总是有牺牲的，感谢总理的深切关怀，希望总理放心。不料，静予参加这次总理的约会，却成了国民党反动派诬陷他所谓“勾结异党，图谋不轨”的一条罪状。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即忙于“劫收”沦陷区的电影企业，企图垄断全国的电影事业。静予接受党的指示，必须支持民营电影企业，扶植进步电影事业，与国民党进行坚决的斗争。于是他奔走于京、沪、渝各地，历尽艰辛，并且担了不小的风险。

静予在国外逗留四年，对国内的情况很不了解。回国后得到郭老、翰老的指示，通过走访旧友，逐渐摸清了情况。当时“中制”厂的进步人士史东山、王瑞麟、官质彬等同志，分别向他介绍

了国内的具体情况和电影界及“中制”厂内的种种动向。史东山在谈到国民党接管沦陷区电影企业时，他说国民党中宣部已派周克去接收各电影公司和电影院；袁丛美与国民党的政治部第三厅第二科科长陶骞相勾结（1940年8月，三厅已改组），取得了接收代表的名义，也已去上海；“中制”厂前厂长蔡劲军已派李钟茵去南京。史东山建议静予一定要在国民党垄断全国电影事业的阴谋中打开一个缺口，使进步电影工作者有自己的一块园地。他们乃商定由史东山先去上海摸清情况。他到上海后很快就给静予写了信，详述“劫收”的种种恶劣行为。信中并附有剪报，其中有袁丛美用政治部名义招考演员的广告等。静予感到问题严重，便将剪报交给国民党政治部代部长袁守谦，并提出质问，上海接管电影企业属谁掌管，是否要在政治部下在上海另设制片厂等问题。袁守谦说，张治中部长请你回国，当然由你掌管接收事宜，上海不再另设厂。静予取得这一指示后，便于1946年2月飞往上海，与史东山晤面。此时，袁丛美正利用“劫收”的民营联华公司准备拍他所编导的反动影片《第五号情报员》，静予采取缓兵之计，暂时任命袁丛美为“中制”厂驻沪办事处主任，受厂长管辖，待有准备后再对付他。

他从上海又飞回重庆，总理在一次和他的谈话中特别提到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阴谋发动内战，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以抵制、破坏枪口对内，使亲痛仇快的反动政策落空为最根本的原则。静予深知肩负“中制”厂重任，在此紧急关头，唯有本着总理的嘱咐，下定决心与电影界的败类周旋到底。

1946年上半年，“中制”厂已复员到南京。在南京、上海，静予在阳翰笙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1946年6月，阳翰笙同志代表党组织在南京郊外灵谷寺和静予、王瑞麟作了一次长谈，对抗战胜利后，特别是政协决议被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后，他们为了积极准备反人民的内战，扑灭抗战期间在人民中发挥了很大威力的戏剧、电影等文化运动所采取的各种残酷手段，作了详细的剖析。反动派为了控制和垄断电影事业，实行“劫收”沦陷区的电影产业、包括民营的私人产业，他们实行检查制度，控制了电影的原、材料，用威胁利诱的手段拍摄反共、反人民的影片以及色情、恐怖的影片……对上述这些问题翰老一一作了透彻的分析，同时还交待了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策略。

翰笙同志说，我们的工作要看政治条件和物质条件，现在国民党顽固派要打内战，国共就不能再合作下去了。再合作，电影厂就要拍反共的片子，我们非但不能拍反共影片，而且还要抵制反动派拍反共的影片。翰笙同志说，我们要破坏袁丛美之流一心要以上海为中心，利用那里的条件拍摄反共影片的计划。静予在接受党的这一指示以后，便在该厂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利用美国顾问贾德汉的名义，拟出改组“中制”厂为纯粹军事教育电影制片厂的建议。1946年5月18日，他见到了陈诚，将美国顾问贾德汉拟就的“中制”厂改组计划交给了陈诚，并鼓吹在南京建立东方最先进的制片厂，要和好莱坞媲美，美国可以提供成套的新机器和新设备。还说上海各厂的设备已经很落后了，那里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的可能，旧厂是会拖后腿的……。陈诚当即同意发还民营联华公司的意见，并下了手令给静予，又亲自批准在国外订购机械以及在南京建立新厂的经费。静予拿到陈诚的手令后即到上海，在徐家汇联华公司内主持了归还联华公司交接仪式，“中制”

厂有汪中西参加，“联华”方面有司徒慧敏、史东山、孟君谋、陶伯逊（原“联华”负责人之一）等人参加，把袁丛美已经霸占的民营联华公司交回到进步电影工作者手里，创办了“昆仑公司”。静予在发还联华公司后，返回南京，袁丛美不甘心失败，写报告给代部长袁守谦，告发罗静予，说不应该发还联华公司。此事因有陈诚手令，他们也无可奈何。

静予给昆仑公司人力、物力支持，将“中制”厂的主要创作人员、技术人员和几乎全部熟练的电影从业员，采取各种方式，先后转到昆仑公司，使他们得以摆脱“官办”制片厂的羁绊。由于昆仑公司在创办之初，经济来源有很大困难，“中制”厂转去的人员，大部仍在“中制”厂支薪，给昆仑公司工作。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条件摄制《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样的进步电影。

在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时，原来在“联华”仓库中找出来的唯一的旧摄影机“独眼龙”已经不顶事了，司徒慧敏同志提出让静予在“中制”厂借一台有声摄影机，是孟君谋同志到南京拿出来的。后来袁丛美知道了，他要追究，静予说是卖给“昆仑”的旧机器，“中制”厂反正要进新机器。刚从印度运到的根据租借法案运来的物资中有大功率摄影灯泡二十五箱和录音器材等，全部交给昆仑公司使用，这些器材都是交给汪中西办理的，并未写借据。

静予感到袁丛美还有可能在上海以办事处主任名义进行捣乱，利用被“劫收”的艺华公司拍摄反动影片《第五号情报员》。乃和王瑞麟同志商议，将袁丛美的办事处主任名义撤消。上海方面的工作，由王瑞麟主持，汪中西作具体工作。袁丛美被撤消职

务后，怀恨在心，他与特务分子勾结在一起，盗用“中制”厂职工名义到国民党江苏监察署和国防部密告罗静予“勾结异党，图谋不轨”和在发还联华公司时贪污八十一根金条等共八条罪状。1946年10月，静予被联合勤务总司令部黄镇球叫去，当场逮捕，送入南京羊皮巷十四号国防部军法处监禁。

在狱中审讯时，他遵从周总理的多次教导，缅怀先烈，下定决心，在任何情况不出卖同志。反动派无可奈何，曾把他陪绑到法场，企图胁迫他招供，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拒不认罪。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他在狱中写诗自勉，“比襟联谊又一年，和风细雨难成眠，山城有雾飞红霞，愿赴银海寻释迦”。他对进步电影事业的忠诚，溢于言表。

静予被捕事件传出后，了解静予的文艺界同志和各方亲友都设法营救他，杨绵仲、寿景伟、陈铭德、张志和、王人璇、方伯齐等通过各种渠道尽力救援，并设法将钱江、钱镛、史平转移到了香港。在“中制”厂工作被袁丛美窃取其名签在密告书上者，拿了图章和签名的样式到法院去否认，董霖和其他同志也纷纷登报否认。“中制”厂进步职工联合签名保释，造成了对反动派的强烈舆论谴责。我在美国一次集会上遇见何应钦时也向他提出要澄清这个冤狱，及早释放罗静予。与此同时，黎锦晖老先生又获悉军法处的大法官对静予的案情并不十分清楚，他在批件上原来批的是：“依法从严办理……”，经过各方面努力，终于把案子拖延了下来，黎老先生则针对控诉书所列“八条罪状”写了逐条批驳的复申书（长达数千言）。后来，军法处在向汪中西、彭介人、史东山、郑君里等查询时，他们都严正地指出这“八条罪状”毫无事实根据。反动派主要是碍于社会舆论，只好作了查无



实据,无罪释放的结论,大法官在判决书上又加了四个大字“事出有因”,出于不得已,只能于1947年8月释放了静予。

静予出狱后,申请辞职未准。五个月的狱中生活,他被摧残得非常衰弱,但反动派仍要他去工作。他本着抵制、破坏的方针,继续做力所能及的事。他在狱中时,“中制”厂正筹划投产反动影片《同床异梦》和《铁》,静予便以种种借口不提供关键的器材。此时,技艺人员已纷纷离厂,这两部片子终于没有拍成。他对南京孝陵卫建厂事宜,则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使它不能建成。

1947年下半年,他因初出狱,对国内战争的形势不很了解,阳翰笙同志约他到上海惠中饭店密谈,对他阐明了敌我军事形势,此时我们已由相持阶段转入反攻阶段。谈话中并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军事上比较有把握,但与其看得快,不如看得慢一点,不能说一两年就能胜利,但胜利是指日可待的。关键是还要多作准备,除非我们再接再厉,坚持到底,敌人是不肯罢休的。

当他和史东山同志谈到自己的处境时说,我不能再在“中制”厂干下去了,这时,“中制”厂已改隶于国防部新闻局。上面决定“中制”厂不改为军事教育制片厂了,他们要以拍摄新闻的速度拍摄反共故事片,我看拖也拖不了,以后的工作势必强迫执行,我们应当有个对策。史东山对静予说,他们既然不放你走,还是先想方设法拖一拖,再作金蝉脱壳之计。你在那里应付比别人去当厂长好,朋友们会谅解你的。在邓文仪三番四次的“训话”下,静予在1947年8月初开始假装肺病卧床,不到厂办公,消极抵制,看事态发展如何,再谋对付的办法。

此后不久,国民党果然又派厂外文化特务蒋里德来厂编导拍

摄《共匪暴行实录》、《共匪祸国记》，静予立即于9月又去上海，约王瑞麟同志一起去看阳翰笙同志。他们在一个清晨到虹桥咖啡店吃早点，这个店晚上非常热闹，这天早晨却只有他们三人。静予此时心情极为不安，他对翰老说，这两部反动影片如果拍出来，是严重失职。鉴于他当时的处境，他想离开“中制”厂，走为上策。三人商量了很久，翰笙同志说，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还得积极破坏他们拍摄反共反人民的影片。于是决定副厂长王瑞麟去南京应付，因为作为副厂长还可以借口推托。这里应当对王瑞麟同志表示敬意，他明知是虎穴，起先也有许多顾虑，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去南京，顶多拚了命，决不能让这两部反动影片出笼。王瑞麟在1947年11月18日从南京寄到上海给静予的信上说：

“此间‘共’片（按指‘共匪暴行录’）严令压迫限期完成，态度不佳，实难忍受。……瑞除一死以谢世人者，实无他途。”王瑞麟当时那种忠于人民，忠于革命，视死如归的精神，至今想起，仍然使人肃然起敬。

我于1947年9月从美国返回祖国后，从上海虹桥疗养院院长丁惠康处弄到一份三期肺病的假证明，静予于10月住入虹桥疗养院。我亲自到南京向邓文仪交了这份假肺病证明书。静予在此期间，翻译了反映英国工人生活的多幕剧本《翡翠谷》，撰写了大量有关电影技术方面的资料。

他在入院后，史东山了解到他又处于困境，况且袁丛美在控诉书中，有史东山等在“中制”厂支薪干“昆仑”厂的工作这一条“罪状”，乃于1947年8月27日和郑君里、王为一三人联名写信辞去“中制”厂编导委员职务。信中说：“闻君又‘违和’”，表达了对静予的深切关怀。

1948年5月，他辞去“中制”厂厂长职务，应英国文化协会之邀，去英国考察电影，并在伦敦照相乳剂专家贝克博士实验室中实习。还顺便到法、荷、比等国考察学习电影技术。

北平解放之初，周总理指示阳翰笙同志通知他回国。1949年4月，他从英国转道香港，回到祖国怀抱，光荣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与会期间，他见到敬爱的周总理，激动得热泪盈眶。总理在他的纪念册上写下了苍劲的七个大字：“为中国电影事业服务”。据郑伯璋同志回忆，总理在一次大会上说过：“罗静予是技术专家，他想搞胶片厂，应该支持他嘛！”从这里又可以看到总理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是何等重视，罗静予只是千万个受到总理关怀的科技工作者之一。从这里还可以看到总理缅怀先烈，培育烈士子弟和遗属的一片赤诚。总理的伟大胸怀，如日月昭彰，而“四人帮”却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甚至变本加厉地对革命干部横加各种罪名，伤天害理地用封建法西斯手段迫害大批有实学的建设人才。和静予一起学习过的三十年代老前辈电影工程学者、中央新闻记录片厂总工程师兼技术管理副厂长官质彬同志，他始终对罗静予蒙受的不白之冤，心中愤懑不平，一提起就激动得坐立不安。当他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定于1978年4月8日在八宝山举行罗静予骨灰安放仪式的通知后，因兴奋过度，心脏病突发，于4月7日去世，终于未能参加安葬仪式。静予的另一个同学郑伯璋同志在参加骨灰安放仪式后写了慨叹的挽诗：“衰年几去八宝山，一周送别罗与官……满堂同志和好友，相逢相对泪涟涟……”他们都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中，甘冒生命危险，作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对我国电影工程有创业之功，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然而无穷的斗争，无尽的迫害，“四人

帮”必欲把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难怪都要老泪纵横，相对唏嘘了。

静予在解放后的岁月中，更加努力学习，更加要求进步，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首先批判自己，深刻检查思想上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以行动表明他主动接受改造的决心。我在他的遗物中，找到一张残损的纸片，上面写着这样的字迹：“……争取彻底改造，掏诚以奉，把心也剝了出来……”。他日以继夜地工作着，但求我国的电影事业能较快地得到建设。解放初期，他被任命为文化部电影局技术处处长，参与筹建北影厂、洗印厂，改建南京电影机械厂，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技术顾问。在保定胶片厂、哈尔滨照相器材厂都有他的足迹。他以全部精力和时间，吞噬着电影工业方面的知识，并且翻译、编写了大量电影技术资料。他为祖国的电影事业奔走国内外，为了掌握基层放映情况，还利用星期天深入各电影院。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如在无休止的审查中，他仍以很大的毅力攻克了俄文。他对工作的主动、热情，精益求精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十二年的共同生活是漫长的，然而我们相聚的时光却是短暂的。在我们相处的有限年月里，他总是伏在案头读呀！写呀！画呀！总结了一天的工作，又为明天的日程作下安排。夜深了，还要读完当天的报纸，看到需要的资料立刻剪下贴好。这些印象在我脑海中是何等清晰，可是我对他的音容倒反而有些模糊。我尊敬他，我们一家人都尊敬他，我和静予从来也没有因为家庭和个人的孤寂而感到遗憾。他偶尔也意识到对我们有些歉然，但是他却说：“时间太少了，要像勤劳的蜜蜂采撷花蜜一样把祖国充实起来，我们不能空着肚子奔向光明啊！”

1960年9月16日，是我们结婚二十一周年纪念日，这天我很意外地接到他从国外寄给我的一首诗。他怎么会记起这个日子来呢？这是二十一年来他第一次主动记起这个日子。我把这首诗一直保存到现在，倒不是因为诗写得怎么样美好，而是一向埋头书桌、专心工作、不大理会个人生活琐事的静予在一生中少有的即兴抒情，因此感到弥足珍贵。他虽然在解放后也经历了不少波折，工作不是那么顺利，但是乐观，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总是向往光明的未来，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联系在一起。

这首诗的后两句是1938年我们结婚时郭老(主婚人)的贺词，前两句是他自己的，诗曰：

二十一载逢喜庆，悠悠长河逐浪波；  
静观宇宙皆自得，珂佩玲珑红旗歌。

(我的学名叫珂玲)

静予的性格是比较含蓄的，他在百忙中却写了这样一首热情奔放、满怀信心的诗。他要奔向光明，可是乌云却压到了他的头上，辛勤的蜜蜂顶不住暴风雨的袭击，终于遭到灭顶之灾。生活的长河确实波浪滚滚，但我们生活在宇宙中却并不都能够悠悠自得的。

他是千千万万受到“四人帮”迫害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一个忠诚于祖国电影事业，紧跟着党，追求光明，奋发图强的知识分子，他愿意献身祖国，却只能落到冤死“牛棚”。多么不可思议！事过境迁，现在我们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极“左”路线造成的冤狱，这个深刻的教训必须记取。我们幸存者要振作起来，争取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 为发展中国体育事业奋斗六十三年

——记全国政协委员徐英超教授

臧 权 刘明哲 王瑞瑄

1980年，在祝贺徐英超教授从事体育教学六十年的盛会上，教育部长蒋南翔说：徐老教龄之长，不仅在中国是唯一的，就是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应当特别提出，孔夫子只有三千弟子，而徐老教育了三代人，有弟子八千之多。这是什么样的贡献？

徐老为了祖国的体育事业，把学生当作自己子女来教育，这是他生平一大乐事。尤其是，他将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全部贡献给党和人民，心里才感到坦然。

他是本世纪的同龄人，今年已经是八十三岁。他从“五四”运动时起，就开始了体育教学生涯，到现在已有六十三个春秋。为了培养接班人，他不知疲倦地调查研究，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为了增强青少年的体质，他通过一系列的观察和试验，总结出的一套适合我们国情的教学规律和方法。

徐老的工作成就和学术观点，越来越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他早年毕业于美国春田学院。1983年8月，这个大学的校长威尔伯特·劳克林给他来信，说那里的许多朋友，都在热烈地祝贺他“做为一个体育工作者”，“作出了持久的卓越的贡献”。以



在祝贺徐英超教授从事体育工作六十年的纪念活动中徐英超（左三）与蒋南翔（左二）、荣高棠（左一）、杨秀峰（右二）钟师统（右一）等同志在一起。

后，这位校长又来信，要他编的一套教材——《体育统计》和《体质考查制度的设计和验证》。同年5月，美国密执安大学体育系主任艾丁登博士，给徐老来信说：“如果有机会或者您的旅行计划允许，我拟邀请您前来美国讲学，并向您请教有关中国全民体育和体质研究的问题。”1984年1月9日密执安大学发来正式的邀请信，邀请徐老于1984年5月赴美讲学。

徐老所取得的成就，实际上是他的“劲骨”、“单骑”精神与党的领导相结合的结果。《新体育》杂志社郝克强同志在1980年祝贺他从事体育教学六十年的会上，曾经有过这样的赠诗：“单骑行跨八十龄，历尽劫波志益铮。长愿新人多挺秀，但教东国早飞腾。青春浩浩芳园乐，劲骨棱棱陋室明。不负江山无限好，再与日月赛一程！”

## 体育能否救国？

徐英超教授从童年到上大学时期，正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世界形势和中国现实，使许多青年警觉到国家的危急存亡。这时候，各种思想，纷然杂陈。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有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到底用什么思想来救中国？怎样观察国家命运和考虑中国问题？徐老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开始把体育和救国联系起来。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走上的是一条走不通的“体育救国的道路”。

徐英超的家乡是北京附近的通县。上小学的时候，他每天路过协和书院，总要停下来看上一番。大操场上的学生，高兴地跑着跳着的运动场面深深地吸引着他。童年时代的兴趣，终于变成了理想。他从北京粹文中学毕业后，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体育科。

1919年，他在高师毕业。这一年，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十九岁的徐英超也参加了。他回忆说：“那一天，在高师，学生要去游行，学校硬是不让。”结果，“还是打着旗子，把队伍拉出去了。”从此，“学校管不了学生，学生倒管起学校。校长、主任不行，就群起而哄之。这样一来，学校反倒好了。不过，那一年的毕业生，北京的许多学校不敢要参加‘五四’的，怕他们又折腾。”这样，工作更难找了，许多人毕业后就失业！

徐英超大学毕业后，第一个找到了工作，去山西太原的一所农业学校任教。1921年，回到北京，在宣武门外河南中学谋得了一个职业。这里，说是中学，其实不过是河南会馆办的一所学堂。只有两套四合院，又窄又小，破旧不堪，要啥没啥，上体育课得到校外的空场去。但是，他没有泄气，终于打开了局面，也



可以说，这是创业的开始。

四年过去了。他自己画图，请来木工，利用一个不用的秋千架，做了一副篮球架，组织起这所学校的第一个篮球队。由于严格要求，训练有方，在体育比赛中一向名落孙山的河南中学，居然争夺到北京市中学篮球比赛的冠军。不曾预料，这场比赛，确乎关系到他在体育界站稳了脚根。比赛胜利了，学校里燃放起欢庆凯旋的鞭炮。从此，河南中学出了名，徐英超也出了名。一个时期，好几个大学、中学，争着请他任教。结果，他还是回到母校——北平师范大学教体育课。

当时，师大体育系已有两位教授，主任是袁敦礼，作为讲师的徐英超，好学肯钻，讲课又好，被袁看中，于是保他去美国留学。袁对他说：“你留学回来，就接体育系主任。”为了节省路费，让他参加中国体育考察团，得以先到德国柏林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然后再取道赴美。

那是1936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奥运会第一场篮球赛，嘲弄般地安排了中国和日本两队。坐在看台上的徐英超，情绪紧张，思潮起伏。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荣辱。一片爱国之情，象火山的岩浆一样在翻滚。可是，自己的同胞还是输了。日本队不可一世的狂欢，外国人鄙视的白眼，他真是悲愤交加，五内俱焚！至今每一忆及，仍感余痛犹存。

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被深深刺伤！徐英超在为“体育救国”之道而咬牙发愤了！奥运会结束后，他横下一条心，发誓要通过体育事业，使祖国繁荣富强起来。他从欧洲横渡大西洋，到美国春田学院，考取了研究生。学到两门主要课程，取得了优异成绩，即《教育统计学》和《体育测验》，获得了硕士学位。他拟

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不料1937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国内普信全无，经济来源断绝，被迫中途停学，只得回国。

回到上海，触目惊心，黄浦江上尽是日本军舰。再到北京，见闻所及，面目皆非，到处是苦难和屈辱。老师大，已经内迁，日伪政府成立了伪师大。有人知道徐英超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特让他的一个同学出面，诱之以财物，惑之以名利，请他到校出任教职。但是，他早已料有此举，便把在天津就准备好的医院假证明，不动声色地递出来：“患心脏病，休息两年。”就这样，他又带着全家，离开敌占区，奔赴大西北。

到了抗战的后方，先在兰州西北师院任教。不久就接到聘书，请他去四川江津筹备体专。那里工作条件简陋，生活待遇差。但是，大敌当前之际，共赴国难之情，使他欣然应聘，即日登程。到体专后，他和同学一起，到河滩背沙垫沙坑，建运动场；又一起抬器械架，自己动手安装。他的汗水、脚印和辛勤的身影，深深留在体专师生的心上。一直到内迁的母校多次来信来电，催促回校任教，他才不得不离去。体专师生，再三挽留，坚不放行。他说：“我去一阵还回来的！”这样，同学们“扣下”他的行李，依依送别，无不深切盼望老师能“早日归来”！他一阵热泪盈眶，感到自己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毕竟为祖国的体育事业，贡献了一点微薄的力量。

好容易盼到日本投降。胜利的喜悦，倒使徐先生的心情更加复杂起来。那兵荒马乱的八年，该有多少难言之苦！师大，从北京到西安，从西安到城固，又从城固到兰州，多么艰难的流亡生活！面对现实，希望何在？苦难是否到了尽头？接收已经变成“劫收”，内战正在变成现实。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国家会变成

什么样子？徐先生在困惑中。

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终于使他对国民党绝望了。多年来，他从事体育是为了救国，但体育能不能救国？徐先生在苦苦地寻求着答案。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另找一条新路，但是新路在哪里？他当时并不清楚，还要自己去探索。

## 解 放 区 之 行

1946年秋，“国立北平师院复员师生赴平团”，路过解放区。这是徐英超教授思想大转折的开始，也是大转变的关键。

然而，行前阻力之大，耳边谣言之多，诚非始料所及。许多人，喋喋不休，振振有词，无非是“太危险”，“行不得也”！学校的一个会计，还请徐先生吃饭，并“特约”一个伪县长，污蔑解放区，大骂共产党，极尽胡言乱语之能事。什么“没有自由，杀人放火，学生失踪，活埋知识分子”等等。徐先生都未为之所动，下定决心，毅然成行。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走？又为什么敢走？徐先生说“穷是可以使人勇敢的”。他一家五口，老伴刚刚故去。物价飞涨，每月工资只发一、二成，最多三成。学生食堂吃不起，只好在家里凑合糊口。有时吃了这顿没有下顿。有一次，他去找院长救急，想借一点，答复是“学校没钱”。徐老火了，质问院长：“我这叫借钱吗？学校欠了我多少工资？”由于朋友周济，才免于挨饿。事实胜于雄辩，弄得教授没有饭吃，谁还看不出国民党经济上的崩溃，政治上的腐败？他认为自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到绿林里去，要么去找共产党。他听说，“杨秀峰成了共产

党”，觉得很奇怪。他们是师大同学，杨是他很熟悉、很佩服的人。因此，早有向往之心，一定要到解放区去看个究竟。

回北京，山高路远，携家带口，路费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只发给还乡费法币五十万元，一些老师又给凑了三十万。如果经西安，由郑州北上，能够通过解放区，预计可以凑合过去。他说：“这是我们全家唯一能走的一条路。”

一群穷学生，听说徐教授要去解放区，也纷纷找来，要求同行。这样，1946年9月2日，大雨滂沱之际，在这位备受尊敬的教授率领下，一支二十九人的队伍由兰州出发了。

一路之上，经西安，过洛阳，到了郑州。郑州是蒋管区，要在这里做好通过解放区的准备。首先，组织起来，作好分工，定出计划。成立“国立北平师院复员师生赴平团”，制团旗，刻团章，派“交际干事”去新乡，到“三人小组”探听消息。两天后新乡来电话：“可能通过”。于是徐教授即刻前往接洽。

据国民党政府代表说：“通过，可以，但不保险，一切自行负责”。再与中共代表面谈，据说：“按现在情况，大概可以通过。这几天没有战事。但是，要先和军部联络。”这样，又过了两天，得到最后答复：“可以通过。”于是办手续，造名册，准备证件，并打电报给西安和兰州的师大同学，说此路可通。离开郑州后，坐几十里路的火车，又走了十五个小时，午夜时候才到新乡。再由这里去安阳。离解放区越来越近了。由新乡出发时，

“政府代表”非常客气，送行上车，一再叮嘱：“大家过解放区，千万不要受诱惑。”到了安阳，兰州和西安来的二百多人也赶到了，立即办完手续。又往当地的“三人小组”接洽通过办法，

开请“中共代表”派人送行。这样，二百多人雇了二十多辆马车，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离开安阳，走五里路就到了火线。前哨的国民党军，有的手里握着手枪，有的手上提着步枪，有的腰中挂满手榴弹。他们很紧张地远望前方。看样子，随时都可能打起来。忽然，中共代表说：“现在相当紧张。大队要停止前进。我们先去探路，取得联络后，大队再走，以免发生误会，开起火来。”于是徐教授和中共代表上了吉普车，由美国人驾驶。车上插着白旗，缓缓前进。据说，此时此地有两种危险。一是因误会而开火。再是触地雷而丧命。经与共军联络好后，大队在陆续前进中没有发生问题。但是，这是双方枪炮相对、随时都可以开火的地带，大家心情之紧张是可以想见的。

大队在危险中前进。突然前方枪声大作，而且越响越紧，机关枪，手榴弹也出来了。中共代表说：“不好，不好，开火啦！我们要赶快转移，向左方躲避。”这时，右方的村子里有好几处起了火。军队在紧急前进中。大队往左走，穿过了两个村庄，才离开了火线。等了三个小时，这场冲突才停止，大队继续前进。过了漳河，天色已黑，他们就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村长给大家安排了住处。这么多人，还没有吃饭，这位村长，就召集全村各家，烙白面饼，煮小米粥，大家饱餐一顿。徐教授深情地回顾说：“那里不过是一个村子，在已经天黑的时候，忽然来了二百多人，竟然能做出这样的饭食，可以说是办法吧！”这就是解放区，解放区就是这样。全队师生到这里，越来越感到陌生而亲切，新鲜而温暖。

一进解放区，就有解放军陪同护送。两个战士对徐教授说：

“你认识杨秀峰吗？他是我们边区政府的主席，听说你们来了，正在准备欢迎。”到了邯郸。（当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冀鲁豫边区的政治中心。）护送大队的人，陪着找到“救济会”，又找到负责人，他们已接到安阳方面的通知，准备好三个旅社，免费住宿。第二天，开欢迎会，由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致欢迎词。他和徐教授是老同学，徐是1919年师大体育科毕业，他是1920年师大史地系毕业。当年两人同在一个足球队。久别重逢，又是他乡遇故知，大有恍如隔世之感。

杨秀峰同志身著土布制服，脚穿家做布鞋，不知道的，会以为是个工友。谁还看得出他曾是留法学生，师大教授？在欢迎会上讲话时，他说：“离开母校多年，今天见到母校同学，好像见到了家人。”当时，徐教授眼睛看着，心里想着，认为斯人也而竟如斯；以他的学问品德，当了共产党，而共产党里竟有这样的人，不能不引起深思。

杨秀峰同志请徐教授到家里作客。一见之下，颇有风趣地说：“你真的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敢来呢！”他的夫人原是通州师范教员，徐教授也认识。她也开起玩笑来：“我们这里，对于知识分子可是要活埋的呀！”徐教授也开玩笑说：“现在我来了，就这么一大块，请随意处理吧！”这一顿很不平常的家常饭，几乎都是在笑语声中度过的。夜深，情深！酒热，心热！送别时，杨秀峰同志满怀豪情地说：“你们不必问，可以随便走走、看看，什么地方都成。这里没有阔老，也没有穷人；没有洋人，也没有洋货。一切请你们自己去评判吧！”又说：“你大可放心，你的学生，一个也少不了。”以后，徐教授到农民家里了解生活情况，到田间地里了解劳动情况。一路之上，但见衣物放在路边，无人看管，

竟是“路不拾遗”。

国民党说解放区“活埋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投奔了解放区？徐教授在邢台参观了北方大学。这个大学分为六个学院，那时刚刚创办，学生人数不多，但在不断增加，许多人甘冒风险来自四面八方。尽管缺少教授和图书仪器，但在内战日紧、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共产党当局还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分子的培养，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什么样的人当校长呢？范文澜。他曾在北师大任教，以后成了中国著名的学者。教务长也是一个行家，叫张清源。他是1931年从北师大教育系毕业。北方大学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过客，举行了感人的欢迎大会，演出了话剧《白毛女》，并一再挽留急于离去的客人。这就是进入解放区前“政府代表”所说的“诱惑”吗？这就是国民党所宣



国立北平师范学院复员师生赴平团部分成员  
1947年摄于北平  
(前排右起第三人为徐英超教授)

传的“随便杀人”吗？原来“青面獠牙”的魔鬼，却是富于人情的斗士。

离邯郸，到高邑，离火线越来越近。前方正在开火，时闻枪声炮声。徐教授带领学生们告别了解放区派来护送的同志，来到了元氏县火车站。上了火车，一个小时，就到了国民党统治下的石家庄。大家兴奋极了，没想到解放区的“冒险”，竟会是这般顺利。一提起国民党的造谣，大家都不禁嗤之以鼻。

最后总算到了北京。在徐教授率领下，这二百多人的队伍，打着“国立北平师院复员师生赴平团”的旗子，整队步行，奔向母校。

## 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

从解放区归来后，徐英超教授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解放区耳闻目睹，大出他之所料；新鲜事物，发人深省。从此打消了他的疑虑，追求进步，勇往直前。他对国民党从失望到不满，以至起而打倒之；对共产党，从怀疑到向往，以至进而参加之。

回到北京以后，徐英超教授“要做一个志士”，他能说就说，能写就写，仗义执言，对国民党口诛笔伐；对共产党热情赞颂。支持学生运动，不搞明哲保身。1948年，国民党在上海召开全运会，给他发来请柬，他断然拒绝参加。因此，反动派视之如仇，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48年4月9日，一百多名暴徒特务，在深夜里进入师大，抓走八位同学。这就是学运史上罕见的“四·九血案”。徐教授看到被捕同学留下的血衣和沾满了鲜血的凶器，看到床上、地下和甬道上的点点血迹，义愤填膺，声泪俱下，亲自发动召开教授会。



严加声讨，最后做出决议：被捕学生“不安全脱险”就“无限期罢教”。大请愿后的当夜，八位同学都救回来了。1948年5月，毕业生请他题词留念。他写的是：“学生时代的正义感是最宝贵的。毕业后，仍要保持这种精神，去改造社会，不要向腐败的社会投降。”“天快亮，更黑暗。”鼓励青年以救国为己任。这在当时的师大教授中，实属难能可贵的。

解放大军兵临城下，敌人狗急跳墙。1948年12月中旬，有一天，校长袁敦礼找他谈话，并给他看了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下达的要求对他进行“密查”的“密令”。看样子，国民党要立下毒手了。袁校长出自多年私交，警告他“悬崖勒马”。于是，二人辩论起来了。袁说：“不要再讲话了，不要再参加学生活动了。”

“你真糊涂啊！太危险啦！”他说：“危险是危险，我咋糊涂？你才糊涂啊！学校不象个学校，竟是国民党的一帮党棍。我们是办教育的，不是做买卖，不能躺下同流合污，要站着改造社会！”结果，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12月23日深夜，徐教授全家在睡梦中被敲门声惊醒，说是“检查户口”的。一开门，十几个暴徒，一拥而入。他们用手枪对着徐教授喊：“不许动！”接着翻箱倒柜，无所不搜，无所不查。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叫他写明：“本户经过检查，财产毫无损失。”最后还叫他签名盖章。于是，拿出绳子，要把他绑走。他说：“请不必绑！我绝不跑，也跑不了。”这样，“前护后拥”，强架出去，押到西单舍饭寺“中裕旅馆”的一个绝密房间里。

当天夜里，特务分子对他审讯了五个多小时，一直到天亮。毒刑拷打，“压杠子”、“灌凉水”，徐教授几次死过去、醒过来。结果，敌人大失所望，什么也没有捞到。

第二天，他被转移到公安局第二分局第一派出所（西城府右街）。先是关在没有门、破窗户的冷屋子里。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被架到另外一个屋里，又开始了长时间的酷刑逼供。脸上嘴上，打得面目全非。更骇人听闻的是，倒背手，吊起来，用脚乱踢，摆来摆去。这样不行，又脱光衣服，用烧红的铁条乱烫全身。直到血肉模糊，昏死过去，才算住手。两天后，敌人又叫他写“坦白书”，他写的却是“绝命书”。徐老在回忆中说：“写完‘绝命书’后，不知为什么，不觉得痛苦了，也不害怕了，反倒轻松起来。”他还满有风趣地说：“真奇怪，人到这样地步竟会如此，真是人生最奇怪的经验！”

1949年1月13日，徐夫人接到校方公函：“兹接华北剿总司令部公文一件，抄录通知如下，即希查照为荷。此致徐英超太太。”附录的公文说：“贵校徐教授被逮，颇受优待，审讯后，如无罪嫌，自当早日释放。”第二天，一个姓魏的官员找他谈话。先是告诉他“可以保释，以后随传随到。”随后，警告说：“一切情形，不得外传，免生意外。”天黑后，就放了出来。

消息很快传开，师大地下党，即派穆静贞（体育系学生党员）、崔泽（体育系学生民主青年联盟盟员）等，前往徐家慰问。劫后余生之人，在白色恐怖下，能得到共产党的关怀，为此他激动得热泪湿巾。当他知道师大地下党通过学生自治会的党员设法营救时，特别是我们的“北京和平解放谈判”代表，曾义正词严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不许杀害徐英超教授”，更抑制不住对党的感激和向往之情。他说：“共产党救了我一条命！”几十年来，历尽艰险，“如今才懂得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

1949年4月9日，师大召开了纪念和控诉“四·九血案”大会。

徐老架着令人望而心酸的双拐，一步步艰难痛苦地走上了讲台。他坚决地表明了争取参加共产党的决心。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而是严峻的生死考验，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飞跃。

他回忆说，在一次次的酷刑下，逼供“共产党的名单”，还叫招认“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做共产党工作。”他都斥之为造谣陷害。但却公然承认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也理直气壮地承认是他带领二百多学生，通过解放区，认为一向传说“杀人放火”的地方，倒是出乎意料的安全、自由。还承认师大“四·九”被捕学生王公宇，释放后去解放区给他来过信，说：“到了一个幸福和自由的地方，”希望他“做青年的一盏明灯”。这封信，徐老被捕时被搜去了，审问时也审问了。他承认确有此事，而且告诉特务说：“这个学生去解放区前，曾找我征求意见。答复是：一、如无危险，先上学不走；二、如有任务，危险也不走；三、有生命危险，立刻就走。结果，走了”

他还回忆说，特务们在酷刑逼供之余，也曾待之以“客礼”，烟茶果点，一概俱全，实际上，软硬兼施，这是敌人惯用的手法，企图诱出体育系学生（地下党员）穆静贞的情况，结果敌人大失所望，恼羞成怒了。他当时想，北京围城时，党是通过穆静贞来和自己联系的。给他看《城市政策》，交给任务，挽留袁敦礼不走。这是很大的冒险，也是很大的信任。“士为知己者死”。因之，怎么受刑也不说。“死就死自己一个人，为个人保全自己，出卖别人，还讲什么正义？还有什么人格？”

1949年7月12日，徐老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当时，大学的教授中，他是第一个。那时候的徐老，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怎么

说就怎么办。越是困难越坚强。

北京解放初，徐老是体育系主任，有些学生很反动，他不能容忍，不是听之任之。于是，流言蜚语，惑乱视听，不外乎背后中伤而已。他说：“当时我很糊涂，竟找到教务长丁浩川那里去辞职。”丁劝告一番说：“这不是个人的事情。体育系是对敌斗争的一个岗位，不能擅离职守。”他说：“当时我不懂，不知道辞职就是辞革命的职。”以后，他到党校去学习，思想上收获大，很高兴。

### 做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

解放后，体育事业呈现出空前未有的兴旺景象。徐老被任命为师大体育系主任。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成立时，他又被选为副主任委员。1950年，他率领中国第一个体育考察团，前往苏联访问。回国后，受党的委托，负责筹建新中国第一所高等体育学校——北京体育学院。“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正是他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也是他毕生为之献身的工作。他把毛泽东同志这一题词，挂在书房里，当作座右铭。这时候他已经是体育学院副院长。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总是念念不忘群众，把办公室搬到学生宿舍。他和学生在一起，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年岁。

五十年代后期，反右派和“反右倾”的斗争，尽管徐老没有什么问题，也受到了冲击。十年动乱中的苦难更不在话下了。但他对党的事业没有心灰意冷，还是埋头苦干，坚持教学研究，提前两年编完一套教材。1965年，又写出了一本学术著作——《体育统计方法》初稿（1981年正式出版）。这本书，创立了一个学科的新分支，他也成为中国第一个专门于这个学科的学者。这一

著作发行后，被公认为体育科学中的权威性著作。全国所有体育院校都开设了这门新课。据美国一位学者给徐老来信说，这本书已经在美国巴森图书馆永久收藏，以供“学生和体育学者使用”。徐老高兴地说：“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是单枪匹马地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懂得‘体育统计’是体育科学中值得研究的一门基础分支。”

1971年他又着手编写第二部学术著作——《论体育》。为了征求意见，自己买纸，请人帮忙，誊写刻印。这本书，有四万字。他以几十年的丰富经验，再加上一系列试验的成果，阐述了体质、健康、工作和年限这四方面的关系。他主张开展体育要从实际出发，要有中国特色，要解决两亿青少年的体质问题。因为这是关系到民族的强弱和国家的盛衰问题。

1979年，徐老在北京体院主持建立了体质教育研究室。把体质教育问题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这个研究室，现在已经成了全国体质教育研究中心。此外，他还兼任北师大体育系名誉系主任，亲自讲课，有时一二百人，不用扩音器，一讲就是两个多钟头。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直到死，能作点什么就作点什么。象牛一样，能拉一些就拉一些，能耕一点，就耕一点。”他有一个“十年规划”，进一步探索增强青少年体质的规律，总结出一套适合我们国情的方法。并通过国家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提高中小学生体质。为了保证实现这个规划，他一直在坚持锻炼，游泳、骑自行车，虽隆冬季节也不间断。按他的“十年规划”，头五年，自己亲自干；后五年，带几个人干。他希望看到中华民族的体质能一跃而居世界之巅。

徐老坚持从实际出发，不经过充分的调查，从来不下结论。为了探索体育与运动、体育与健康的关系，他在北京地区，先后选了十几所中学，作为试点，并到更多的学校去调查。一九七七年，他参观了二十四所中学；1978年，参观了五十三所中学，这都是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

根据丰富的事实和数字，徐老写了三个“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方案，得到了不少体育教师的称赞。在北京第十九中进行的试验，使得这个学校的学生，在体质上有了明显变化，精神面貌也大有不同。大部分学生，能够基本掌握测量方法。体质的普遍提高，也带来了运动成绩的递增。这个在体育上默默无闻的学校，竟然在分片的田径运动会上，获得了女子初中组第一名。由于学生体质有了明显增强，学校体育有了明显的进展，学生高兴，老师欢喜，家长称赞。

徐老根据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试验，写出了一篇论文——《体质考查的实验设计和鉴定》。这篇论文，涉及了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的重大问题。如，一、怎样在中小学促进和监督体育锻炼，以使形成终生的习惯，更好地更长久地为国家工作，有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健康水平。二、怎样知道——也让孩子知道——体质增强的效果。三、怎样搜集两亿青少年体质的数据，以改进体育训练的方法。四、怎样选择简单实用的好教材。

随着体育科学的迅猛发展，徐老又开了一门课——《体质测验和研究方法概论》。他和以往一样，在学术上的追求，仍然是以学生为中心。他认为中国有两亿多青少年，中华民族的希望就寄托在他们身上。正因为这样，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更加勤奋地工作。

1983年他又完成了《体质教育研究初论》。这本书，他用了十年之久的工夫（1973年——1983年），总结了自己六十多年从事体育教学的经验教训，边调查研究，边编写修改。这本书是为师范院校体育系编写的教材，也为研究生研究体质教育提供了大量的例题。对于有志于改革学校体育的同志，也是一本必备的参考书。

徐老高风亮节，遐迩闻名，他为增强中华民族的体质，呕心沥血，奋斗了半个多世纪。晚年，更加孜孜不倦，勤奋著述。堪称为人师表，亦无愧于共产党人称号。

#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

朱蔚伯

## 一、从学徒到教授

王云五字岫庐，1888年生于广东香山县（即今中山县）泮沙村，他自称“出自寒素，原无恒产可凭藉”，但据商务编译所同人了解，他的父亲王礼堂是做外国生意的。王礼堂三十六岁才生王云五，先有的三个孩子都已夭折，所以对他特别钟爱。年幼时，家里不让他多读书，而要他当学徒，学会本领，克绍父业。同他父亲的意愿相反，王云五求知心切，立志以自学为主，依靠各种辞书，又通过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函授学校等，刻苦钻研，广泛涉猎，终于奠定了中外语文和知识的基础。后来他对百科全书和辞典等特别感到兴趣，根源就在于此。

据王云五自述，他十岁来到上海，十三岁就离开那短暂的学校教育，十四岁当了米店学徒，而在十七岁那年就作了教师。后来在中国公学教英文，其时胡适正在该校读书。外面知道胡适、杨杏佛、朱经农都是王云五的学生，仅不过是这一时期的关系。

辛亥革命后，王云五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孙中山先生还派他当江宁关监督（一说是禁烟局长），虽然时间很短，在二、三个月中，他靠贩卖鸦片，搞到了很多钱。后来蔡元培当教育总



长，他转任专门教育司科长、司长，兼总长主任秘书、司长等职。1913年他任北京中国大学教授及《民主报》记者；1916年任督办全国油矿事宜公署编译处长；同年秋至翌年底，任苏皖赣三省禁烟特派员。

王云五宦囊丰硕，回到上海作寓公。后来在北四川路买了一所住宅和大批书籍，用功勤读，想要做一个博古通今的学者。

五四运动掀起了新文化的高潮，广大的青年学生和觉醒了的知识分子追求新知和进步。王云五赶着运动的浪头，罗致一批社会青年和失业知识分子，在他家里搞起地下编辑室来，他给每人二、三十元工资，帮他翻译，译出来的东西就成王云五的书了。这些书各门各类无所不包，王云五把它七拼八凑，出版了一套《岫庐公民丛书》。1919至1920年间，他在上海河南路泗泾路南，开办一家公民书局。可是王在出版界没有渊源，在文化街口站不住脚。眼看书局和地下编辑室无法维持了，想不到柳暗花明，竟出现了他一生中的新转折点。

## 二、从总经理到社会贤达

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的编译所一向由老翰林张菊生主持，1918年以后改由高梦旦任所长。高参与公司大计，在编译所中名望很高。他认为自己只懂日文，不谙西语，不便主持编译所，同时受着五四运动的冲击，急谋刷新编辑阵容，改组编译所。高亲往北京，访问北大教授胡适，请他担任所长。胡在1921年暑假中来了，在编译所坐了几天，主要是察看风色。这时正好王云五的公民书局无法维持，想找胡适搞几本书，用胡适的牌子撑撑门面。胡适于是顺水推舟，推荐他的“老师”担任所长。高

梦旦根本不知道王云五是何许人也，只凭胡适一味吹嘘，说他的老师非但满腹经纶，而且长袖善舞，对任何问题都有办法。高老先生就同意向董事会推荐，聘为编译所长。不久，公民书局收歇了，经胡适从中说项，商务允为作价盘进，王云五又乘机捞回一笔为数可观的资金。

王云五1921年9月16日进馆，月薪250元，当时他是三十四岁。先在总编译部办事，12月，高辞编译所长，王云五继任，薪水加到350元。

王云五接事后的第一要着是改组编译所，把原机构大加扩充，设总编译处和国文、英文、史地、哲学教育、法制经济、数学、博物生理、物理化学、杂纂等九个编辑部。成立教科书、中西字典、百科全书等九个编辑委员会，《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八个杂志社，一个包括国文、英文、算术三科的函授学社和出版部等几个事务部门。据《1903——1930年编译所职员录》所载，在1922——1924三年，编译所进用职工共达266人，创商务建所以来进用新人的最高纪录。

王任所长后，除影印善本、流通古籍的工作仍由张菊生亲自主持外，一反商务的老作风，大量出书，特别是出成套书、大部头书，有的是改头换面以旧翻新，同时在出版、发行、推广、销售等方面挖空心思，尽翻花样。例如出版各种大丛书、小丛书、大学丛书，《丛书集成》、《万有文库》、《幼童文库》、《小学生文库》、《中学生文库》……并实行预约预定，特价廉价，分组发售，分期付款，邮局代收书价，银行代收书款等等推销办法。

1927年7月，王辞去编译所长，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法制组主任兼研究员，在商务仍然挂着《万有文库》

总编辑和东方图书馆馆长的名义。1930年1月，商务聘王为总经理。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商务总管理处迁移长沙，王云五常驻香港，经常往来于香港、武汉、重庆之间，与国民党政府挂上了钩，一跃而成为“社会贤达”，又从“社会贤达”升格为国民参政员、“国大”代表，最后做到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

### 三、“四角号码检字法”与《王云五大辞典》

高梦旦在编译所中有“老少年”的称号，他对一切新事物都有兴趣，敢于尝试，富于创新精神。他认为汉字的部首笔画查字方法不科学，久已致力于革新检字法的研究，获得了相当成就。王云五认为革新检字法与编印字典，改进索引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有密切关系，也大感兴趣。当时社会上已有几种检字法。有位作者把一部以点、线、面为基础的检字法书稿交商务出版，王云五从这书稿中得到很大启发，还从电报书中找到一些窍门。点、线、面是几何学的基本概念，他抓住一个面字。汉字的面主要是四方形的，四方形就有四个角，因此他设想有个以四角为基础的号码检字法。王云五找个借口，把书稿退了。他用从0到9十个号码代表十种基本笔形，想出一个“四角号码检字法”。

四角号码检字法经高梦旦和馆内外人士不断的研究、修改、实验和推行，前后历时三、四年，经过七十多次小修订和三次大修改，从四角又添上第五个附角，最后于1927年底，订出了比较稳定的方案。为了进行试验、检查，以测定其效用，在前后四、五年中，公司全力支持，投入巨额资金和大量人力物力，试编字典辞典、索引目录、档案卡片，还组织演讲会、讨论会、传习班、竞赛会等等活动。1928年6月开办四角号码暑期讲习班，

1930年7月又办第二次讲习班。参加学员大多为中小学教师和机关职员，人数达六、七百人。商务除对学员赠送书籍外，还在讲习期内付给津贴。结业后回到原单位工作，无形中成为四角号码的宣传员。个别学员由商务进用，担任四角号码的研究、改进、推广和编目等工作。

在四角号码检字法形成的过程中，商务投入的资金虽无准确统计，从粗略的估计，公司直接或间接支出的费用至少有三、四十万元。等到检字结构基本形成，并且获得社会重视和好评时，王云五则当仁不让，在检字法前面加上“王云五发明”五个大字，作为他个人的一笔政治资本。

四角号码检字法成熟以后，商务积极加以推广宣传。1928年10月先出一本《四角号码学生字典》，虽是初次尝试，销路却很不坏。利之所在，王云五准备自编一套以他的名字题名的大、中、小型辞典。他仍然用地下编辑室的做法，在家里组织一批年青学生和亲友家属，帮他搜集资料，编订条目，打算成书以后交给商务出版，收取版税。商务对在职同人编辑辞典，向例不许用从价版税办法抽版税，以杜流弊。当时张菊生力持不可，王云五大不满意，愤而辞去编译所长，推荐何炳松继任。王在辞职时，馆里照章发给退俸金1,849元，仍旧请他担任《万有文库》总编辑的馆外职务。

1930年1月25日，商务聘王为总经理，一朝大权在握，争议中的《王云五大辞典》便于同年11月作版税书出版了。其后删繁就简，又于翌年出版《王云五小词典》，再把小词典的词语去掉，精简若干单字，又续出《王云五小字汇》。这些字典、辞典，王云五都是按定价百分之十抽取版税。大辞典一次抽得的版

税达五千元。仓库天天发书，月月结帐，三种字典每年付给版税何止一、二十次。有人向当时的《大公报》投稿加以指责，馆里的答复是“所支版税系照章程办理”。这种“一鸡三吃”的做法，表面上是为便利读者，真正目的无非为他自己掠取版税着想。从下面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商务对版税书的结算比较严格，要等书籍售出才对著作人结付版税。但自王云五辞典抽取版税后，他借口其他著作人对此不满，决定变更版税结付办法。他的辞典一出仓库，即时可以支付版税，不论书还搁在分馆，或在运输途中，他的版税早已纳入腰包。后来无形中造成以推销王云五辞典作为分馆考绩的标准，纵容分馆经理滥添辞典，滥放客帐，给公司的经济和信誉带来严重的影响。

#### 四、推行图书统一分类法

我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已不能适应科学分工日益精细、出版物种类日益繁复的工作需要，更不能兼收中外文不同性质的大量图书。图书馆编目插架，想要中外统一，很感困难。五四运动前后，国内已有采用美国杜威图书分类法的图书馆，但中外文仍然分列，主要由于不少中文著作为外国学科所未备。此外，著者姓名中外异趣，亦不易处理。

王云五任编译所长后，与高梦旦协力改进图书分类。他把国际通行的图书分类法作了比较，认为杜威十进分类可繁可简，排列顺序基本符合于学术研究工作，是最适用于我国的分类法。

他要把杜威分类法加以变更，将中国图书纳入十进分类的相应或接近的号码中去，苦于无法解决。有一天，他发现北四川路

底 183 号自己住宅旁边介乎 184 号之间新盖的房屋，刚钉上 183 号 A 字门牌。他触类旁通，运用编门牌的办法，把中国图书用标注“+”、“卅”、“土”三种附加符号作为分类新号码，排在杜威十进分类法相当或有关号码前面，与原有号码先后排比，可以不断增新，并行不悖。

王云五还把中国著者姓名按四角号码采取四个号码，即所谓简号，与外国人名的 26 个拉丁字母也纳入从 0 到 9 十个号码中，取其四个号码，这样在必要时能把中外著者人姓名排在一起，基本上也得到统一了。

关于修改杜威十进分类法的一套办法，他写成了一本《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在 1928 年底出版。商务的图书馆藏书和图书目录等首先照此分类法编排，作为提倡，后来推行到全国各地，在中国新目录学和图书分类法上发生过一些影响。《万有文库》每一本书的脊封上，也按照他的分类法印上分类号码。

## 五、《百科全书》与《万有文库》

改组后的编译所已经成立一个《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打算编译一部“为国增光”的《百科全书》，在三、五年内出版。王自任编委会主任，下设六个系，系主任陶孟和、唐钺、程瀛章、秉志、何炳松、傅运森都是知名的学者和老编辑。编委会机构庞大，有三十多人，最多时达四、五十人。王云五不以此为满足，还组织能译外文的人和度暑假的大学生，担任馆外翻译。蓝本以英美大百科全书和日本大事典、大辞典为主，照抄直译。当时编委成员已提醒王云五，外国百科全书不尽适合中国需要，有的已过时。王云五不理睬这些，他认为“有胜于无”，一味追求译

稿数量，期其速成。除额定工资外，还给译者超额奖。译者日夜赶工，有人每月拿到二、三百元稿费。这种片面追求数量的做法，必然导致译稿质量低劣，文理不通。想要修订整理，已无从入手，还不如全部重译。百科全书的计划眼看要垮台了，适“一·二八”战事爆发，千百万字的译稿匆匆运入租界仓库，后来有一部分稿子又运到北京。

与此同时，王云五在1927年又倡议编印《千种丛书》。他的手法是把十六、七种小丛书拼凑起来，成为一部大丛书，全部一万万字，分订二千册，三年内出齐。小丛书来源不足，除约稿赶编外，还把许多旧的单行本改版重排，塞进里头。当年11月印发《千种丛书目录》，征求各界意见。后来，王云五灵机一动，将书名改为《万有文库》，从千种到万有，摇身一变，顿时声价十倍，这是王云五的“聪明”之处。

王云五何以辞去编译所长，除了《王云五大辞典》的版税争执，《百科全书》徒劳无功，受到各方指责外，《万有文库》第一集销售不畅，积压大量资金，也是个重大原因。后来运动教育部通令全国大中学校和图书馆一体订购，总算扭转了局势。1934年以后又续出《万有文库》第二集。这部书的情况知道的人比较多，不再介绍了。

## 六、关于《中山大辞典》的种种

在编译《百科全书》失败以后，王云五又得到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资助，办了一所规模更大的地下编辑室。他吸取了《百科全书》失败的教训，经过周密考虑，制订一个颇具雄心的大计划。其目的是为编辑一部媲美甚至超过英国《牛津大字典》的《中山

大辞典》。

编纂《中山大辞典》的计划，据王云五说，是“肇端于不自满与不量力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自己。这个计划也是他“献身出版事业”达到登峰造极的最大努力。他在《编纂〈中山大辞典〉的经过》一文中说，民国十四年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后，编成一种用语体文解释，按四角号码排列的《王云五大辞典》。自此迄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前的九年间，继续搜集资料，作增订之用。初仅三、四人，继增至十余人，搜集的资料卡片达900余万张。1936年，中山文化教育馆理事长孙哲生（孙科）提议利用此项资料，编纂一部空前的大辞典，由中山文化教育馆出资合作，于是提出了编纂《中山大辞典》的计划。

孙科并不是文化人，怎么会王云五的图书资料卡片发生兴趣呢？据说，1936年的春天，孙科偕同林语堂、吴经熊等来到王云五家，王把卡片给他看，单是孙中山、孙科两人的资料就有好几百张。孙科大加赞赏，于是一拍即合。王云五顺利地做成这笔交易。1937年3月20日，王云五以个人名义与中山文化教育馆签订契约，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资助总额为26万元。4月，在静安别墅王云五家后边的几幢房子里成立编纂处，门前却挂着商务印书馆“《辞源》增订处”的招牌。

《中山大辞典》的计划十分庞大，全书五千万字，排成十六开本四十大册，另加索引四册，包括单字（即字头）约六万个，词语约六十至七十万条，分量相当于《辞源》的二十倍。本书的内容如序言中所说，是“集我国单字、词语之大成，无论古典与通俗，辞藻与故实，新知与旧学，固有与外来，无不尽量收罗。”编纂与印刷工作，计划在六年内完成。王自兼总编辑，担任搜罗



图书资料工作，至摘词编订悉委于各科编辑员。平时人数为四、五十人，最多时达百名左右。这些人员除由商务编审部及《辞源》增订处调用或兼任外，主要由王云五自己招募或遴选。

大辞典编纂处的机构性质很不明确，人事不属于商务印书馆编制，却从商务调用很大一部分专业人员，房租、工资、杂费等等，主要由商务印书馆支付。那么王云五是对谁负责呢？他如何开支？怎样报销？这里漏洞很多。使人更难理解的是契约订明：

“编成书稿交商务印书馆按版税法出版，所有著作人方面应得之版税，由中山文化教育馆与计划者（指王云五自己）各占半数。”大辞典是中山文化教育馆出资编纂，由百余人集体劳动取得的成果，何以成书以后版税收入的半数要归王云五占有？

1937年八一三日日军发动淞沪侵略战争，王于10月离沪赴港，大辞典编纂处工作亦即停顿。在此以前，王建议将正书缓发，先以本书“一”字所属各条目整理付排，阅十月而排校完竣。1938年12月在香港出版《中山大辞典“一”字长篇》。一字项下共收词语5,474条，16开本478页，以每页2000字计算，合计约100万字，平均每一条目的解说和例证约200字，而“一”字单字的释义约有11,000字。王云五夸为：“规模之大，自信迈越前古，即世界著名之《牛津大字典》亦不是过。”事实上，王云五就是拿这本《一字长篇》来报销中山文化教育馆给他的26万元的资助。

## 七、所谓“科学管理法”的破产

1929年11月9日，商务创办人之一总经理鲍咸昌逝世。过了三天，宝山路总厂新建的最大印刷厂第四印刷所突然失火，四楼全部焚毁。商务接连遭到重大打击，一时有彷徨失措之感。自19

25年6月上海发行所成立职工会后，印刷所工会和总务处职工会亦相继成立，在党和陈云同志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还对资方展开了激烈的经济斗争。商务印书馆工会成为当时海员、邮政、纱厂等上海七大工会之一。其时，商务当权人物大都是年迈的老先生，对于罢工运动穷于应付，感到十分棘手。董事会拿不出好主意，就同王云五商量，要他当总经理。

1930年1月25日由叶揆初、夏筱芳等持函前往聘请。王要求除每月工资700元外，须月致公费300元，还允许让他公费出洋考察。董事会全部接受。2月2日，他先到馆就职，3月初出国考察，至9月9日回国。王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出去的时间很短，不过六个月零二天，但是经过的地方有九国，参观的公司工厂有四十几家，咨询的专家有五六十人，访问研究所等团体也有几十处。在美国约两个月，其他英、德诸国各二、三星期。”

王云五考察回国，即于9月8日到馆视事。他的第一炮是改组总务处机构，设立研究所，原机要科改为秘书科，原人事股扩充为人事科。聘潘光迥、陶希圣，调刘聪强为总务处秘书，在总经理室办事。王并改订总务处章程，目的是以“总经理主持一切事务。”跟着就召集全馆重要职员，发表谈话，宣布推行所谓“科学管理”法的计划。

10月，研究所成立，王云五自兼所长，聘朱懋澄为协理兼副所长，聘孔士谔等八人为研究员。11月中，研究员第一次出马，与印刷所工会及总务处、发行所、编译所三个职工会的代表16人举行座谈会。会上提出“能率委员会组织草案”交代表们研究，目的是为促进工作效率、提高劳动强度开辟一条道路。工会经过研究，于12月中联合提出一个对案，即所谓“工职四会十九条提

案”。接着，王云五组织工厂管理员训练班，规定除印刷所各部主任领班得自由报名听讲，印刷所所长及工会各介绍十人参加外，余从全体工友中考取100人，进行训练。后来，王在开学式讲话中强调本班学员将来所负责任之重大，隐含着对车间主任和领班人员的直接威胁，顿使人心浮动，造成紧张和对立情绪。1月16日，王答复工职四会代表对案时，公然提出现行法律与命令问题及公司管理权问题。到了年底，资方又举行全体职工总调查，印发详细调查表，限期填写。

1931年1月8日，资方突然公布王云五亲自拟订的“编译所编译工作报酬标准试行章程”26条，自1月10日起试行。报酬标准大意是将编译工作分为著作、翻译、选辑、校改、审查五类，其计酬办法大致是：著作、翻译两类分为八级，每千字2—8元；选辑工作分为五级，每千字0.50—1.50元；校改工作分为六级，每千字0.50—2.00元。并订出编译人员每日生产的定额。审查以时间计算，每小时的定额为15千字—20千字。王云五把脑力工作者当作机器看待，企图把编译所的月薪制度逐步改为工业生产的计件制，激起编译所全体员工的极大愤慨，群起反对。印刷所、发行所职工亦纷纷响应。编译所推郑振铎、郑贞文、胡绍绪、杜亚泉等为临时代表，与王云五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郑振铎起草宣言，陈稼轩写呈文，在报上发表。宣言中有：“王云五不独为同人等之公敌，亦社会之公敌，……庆父不去，鲁难未已”等语。韬奋先生亦著文对编译工作实行所谓科学管理，提出疑问。1月15日编译所员工召集全体大会，资方暗中叫来军警，加以阻止，斗争益趋于白热化，引起社会注意，舆论界也给劳方以有力支持。王云五看见形势逼人，自知理屈，所长何炳松对此亦

无能为力，不得不接受社会局调解，打起了退堂鼓。

1月23日，资方宣布撤回“报酬标准试行章程”，却又伪善地说：“试行章程原系一种奖励章程，不料引起编译所同人种种之误会。公司不愿以完全善意之奖励，转使误会为恶意，故决定即行撤回。”云云。一场所谓“科学管理法”的戏剧性的斗争，不能不以王云五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作为科学管理神经中枢和工人训练班参谋本部的研究所，也陷入麻痹状态。不久，这些重金聘请的专家，辞的辞，走的走，研究所也无形解散了。

“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发行所于1932年8月1日复业，王云五仍任总经理，李拔可、夏筱芳任经理。公司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响亮口号，以博取社会同情。王在复业后的关键性措施是：成立总管理处以代替总务处。其目的是把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尤其是商务传统上认为极关重要的生产机构，一向由几位创办人即所谓教会派者掌管，而现在的生产部、编委会、出版科、制版厂、印刷厂等已全部抓在王云五亲信手里。这是商务人事方面的重大变化。王云五撤销编译所，其动机显然出于报复和泄愤，以洗刷他实施编译工作试行“科学管理”遭到失败的奇耻大辱。撤销1902年建立的编译所，其结果使商务历来以自己编书为主，同时组织社会力量广泛联系作家的编译方针消失了。编译人员的队伍从事变前三百余人减少至编审六人，编译十一人，力量非常单薄，暂时只能依靠外稿，借重外力，使工作十分被动。

为了分散工人力量，王云五把上海五个颇具规模的印刷厂（仅米利机一项就有单色、双色的近80台），改组成三个小型工厂，分设于三个地点，使工人彼此脱离接触。工厂生产设备只够

自己印书，再无余力发展对外业务，从而抛弃了商务创业以来以印刷支援出版，以出版发展印刷的传统方针。

## 八、《东方杂志》复刊之小公案

《东方杂志》自1904年创刊，至1948年底终刊，前后45年，共出44卷817期，为我国发行较早、刊期最长的综合性杂志。最初以“启发民智，联络东亚”为宗旨，所以名为《东方杂志》。先由徐珂（仲可）主编，廿四开本，月出一册。当时系仿日本《太阳报》和英美Review形式，从报章和宫门抄等收集材料，摭拾成篇，无甚特色。1910年第七卷起，由杜亚泉主编，改为十六开本，内容和形式有一定的提高和改进。1920年第17卷以后，先由陶惺存、后由钱经宇（智修）主编，改为半月刊，年出二十四册。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时，由胡愈之、郑振铎等编印一本《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这一期的销数达十万份，曾引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提起刑事控诉。

迨至1932年，《东方杂志》出到第29卷第三期时，“一·二八”事变突发，商务总厂全部被毁，杂志亦暂告停刊。

是年8月，上海总馆复业，王云五聘胡愈之主办《东方杂志》，当年10月即告复刊。胡愈之于1914年10月廿一岁时进馆，在编译所工作了很长时间。从进馆的第二年起，他就为《东方杂志》写文章。胡愈之与王云五约定，杂志由主办人包下来，编辑由主办人聘请，文责由主办人自负，与王无关，商务只负责经费和发行业务。这样做的用意是不许王云五干涉内容，保持杂志的坚定立场。复刊自29卷第4期起开辟了“东方论坛”，着重报导国内外形势和政治经济，介绍苏联经济建设并增设“妇女与家

庭”、“教育”、“文艺”等专栏，内容焕然一新，杂志销数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新高峰。

1933年新年号特辟“新年的梦想”一栏，除刊登《梦想的·中国》等文章外，同时登载《梦想的个人生活》征文142篇，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这里没有直接骂国民党的文章，只是对国民党政府有些讽刺，却吓得王云五惊惶失措，他开始对杂志内容进行干涉。胡愈之当然不会答应。他对王云五说：“当初不是说定杂志是包给我办的吗？要看稿子不是等于不包了吗？”王云五食言而肥，他说：“不包就不包罢。”于是事情便闹翻了，胡愈之一怒而去。

王云五把《东方杂志》交给李圣五。李在接办后的30卷第7期发表了孙科的《我们需要何种宪法》一文，以及一大堆讨论所谓宪法的文章，把这一期《东方杂志》几乎搞成一个宪法问题专号。李是汪精卫的人，他在1934年新年号登了汪的《自述》一文。其后，《东方杂志》移港出版。1938年12月汪潜离重庆，在河内发表宣言，响应近卫三原则。李要在《东方杂志》发表汪精卫的《大无畏精神》一文，商务当局不同意，李遂于翌年辞职投汪，做汪记汉奸政府的教育部长去了。王云五就是这样把杂志拱手交给国民党反动派和汉奸，给《东方杂志》三十多年得来不易的信誉，沾上了一大污点。

李去职后的《东方杂志》，在香港由郑允恭主编，其后在重庆复刊，由苏继顾主编，至1948年12月底终刊。

## 九、功亏一篑的《丛书集成》

王云五的一位广东同乡收藏第一部殿版《古今图书集成》，

商务本来打算购进，影印流传。在事未经谈妥之前，中华书局捷足先得。王云五非常气愤，乃与董事长张菊生商量，另编一部综合性的大型古籍丛书《丛书集成》，抢先发售预约，以与中华竞争。

《丛书集成》是怎样搞的呢？可以说是《万有文库》在古籍基础上的翻版。王云五选定宋元明清著名丛书一百部，以实用与罕见为标准，以各类齐备为范围，用淘沙见金、贯珠成串的办法，将百部丛书中的六千多种书，去其重出，共得4,100种，（书名相同的选用其版本较好的）分为541类，编成一部“丛书的丛书”。它的组成部分是普通丛书80部，其中宋代2部，明代21部，清代57部，专科丛书12部（包括经、史、医学各2部），小学3部，目录学、艺术、军事学各一部，地方丛书8部，其中省区与郡邑各占4部。

《丛书集成》的选书、编目、撰述、校订等工作都是王云五亲自主持，严守秘密，工作进行得很快。在王的直接监督下，有丁毅音、张越瑞等相助为理。断句工作主要委托馆外加工，所以质量不高，谬误百出，有时几成废品，使助理人员叫苦连天。丛书4,000册编成4,000个号码，也是出于王云五的主观武断。本书进行中的严格保密，连登广告也是由有关人员到王云五家去编排设计。在登报发售预约的前一天下午，才在馆内宣布。目的是与中华书局争先，给中华筹备在前的《古今图书集成》一个措手不及。资本主义同业之间业务竞争之烈，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丛书集成》涵育着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在当时确有实用需要和参考价值。1935年5月开始预约，原定自当年年底起，每半年出书一次，至1937年底出齐。后因上海局势紧张，出

书进度缓慢，到“八·一三”事变发生时，已出书七期，共3,062种，3,467册。未出的还有1,045种，533册。这部书的底本因遭受战事而散失，现在不易补印，上海古籍书店在1963年初曾建议补印，并编印一本《丛书集成初编目录》，根据商务预约目录和后来的出书情况，把4,107种书的名称、作者、所属丛书、卷数、册数、书名号次、已出未出等情况，一一查明载入，费了很大劳力。本书未出部分的书，商务曾登报公告，办理登记及退款手续。有人说，《丛书集成》因战事停顿，只出了一半，是不符合事实的。

## 十、荐“贤”自代 弃商而官

王云五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在1942年1月从重庆飞往昆明，主持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滇黔办事处。1944年3月，又任国民参政经济建设策进会经济建设组驻会常务委员。这一时期，王云五对蒋介石异常卖力。在他的《回忆录·七十年与五味》一文中有一段自鸣得意的叙述。他说，参政会同人对于出席该会的共方代表多予敷衍，我独于某一场合对共方之蓄意破坏统一，首先严词指斥，载在参政会纪录。其时王云五的得意杰作不再限于“脍炙人口”的“四百万”（四角号码、百科全书、万有文库、丛书集成），而是有了大发展，大奔头的政治活动，特别是参加“参政员访英代表团”赴英访问，给他一个驰骋讲坛，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访英团由王云五、王世杰、胡政之、杭立武、李维果、温源宁六人组成，于1943年11月18日出发，1944年3月19日返抵重庆。归途分为两路，王云五与杭立武等三人兼访近东土耳其、伊



朗、伊拉克三国。在访问期间，王云五作了一、二十次演说，开了几次招待会，觐见了英王、王后和伊朗国王，访问了英首相邱吉尔、外相艾登和上、下两院并会见了拉斯基、威尔斯、赫胥黎、张雪楼等名流学者，替蒋介石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据他自述：“起程前忽患疟，恐家人及同人关怀，不以相告，日服规那丸，照常工作酬应，及抵印度后始告同人，因以知野蛮的身体毕竟抵抗力亦顽强也。”是的，王云五五短身材，肥头胖耳，步履矫捷，确实有着顽强的抵抗力。我们共事多年，没有听说他患过什么病，可是人们不禁要问，当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飞往延安调解国共关系时，王在启程前一天忽患感冒，以致临阵脱逃，不去延安访问。那时候他的抵抗力何以消失净尽，起不了一些作用呢？史久芸在他的自述里有一段话：“王云五在重庆时已被蒋介石看中，利用他无党无派社会贤达的招牌来勾结英美，打击共产党。他那次没有与黄任之等同访延安，我起初认为他是临时患病的关系，现在怀疑他是另有作用的”。

访英回国后，王云五到处演讲，大吹大擂，以抬高身价，还把日记材料和演说稿等整理编次，交商务赶排出版，先出中文本《访英日记》，再出英文《访英日记》和《战时英国》，后又续出《英文访英日记》学生注释版，不久再出《旅渝心声》。每种书都大登广告，重印多次。

抗日战争胜利，王云五于1946年4月28日从重庆复员回沪，总管理处同时迁回上海，驻沪办事处即日撤销。总处机构参照战前组织，指定了各部负责人。

5月，王云五辞总经理职，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他说投靠蒋政权是被王世杰、吴铁城硬拉去的，其实全是假话。总经

理职务先由经理李拔可暂代，后由王推荐国民党CC系朱经农继任，9月到职。10月间，新出版一本吴经熊译的《蒋介石手订圣咏译义初稿》。接着商务召开1937年以后的第一次股东临时会，作出《九年来的报告》，并发表新总经理人选。其时李公朴、闻一多两教授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身死，蒋介石背信弃义的反革命两面手法已暴露无遗。接着，非法的“国民大会”也开场了，朱经农竟然把伪国大非法制定并于1947年1月公布的伪宪法视为宝货，拿到商务来出版。他特地在静安寺路制版，印刷厂成立保密车间，由他的儿子朱文光做监印员，秘密进行摄影和印制工作。同年8月印出一部硃墨两色套印的线装大本《中华民国宪法》，同时还出版平装本和英汉对照本，大事宣传，给商务在出版事业的活动中，盖上一个可耻的烙印。

尤其荒谬的是朱经农利用兼任编审部职权的便利，把刘峙、薛岳一伙人搞出来的两本反动透顶的“围剿”新四军、八路军和篡夺胜利果实，向美国主子邀功论赏的《绥靖纪实》（谢声溢编）和《抗战纪实》（赵曾传等编）偷偷拿到商务出版，每种各印500部。其时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解放了豫西、陕南，在黄河以南建立了新解放区。将近1947年底，上述两书已印好，正待排上“每周新书”的广告日程时，才发现这一严重事件。当时的经理兼供应部长李伯嘉，以事出意外，也感到焦急。后来决定，除留出几本样书外，两书全部销毁，一本没有售出。商务历来不敢出版旗帜鲜明的进步书籍，但也不肯出版极端反动的反共书籍。朱经农已把商务拉下水去，为国民党政府效劳。胡愈之在一次讲话中曾谈到：“商务从创业开始，标榜‘改良’，虽然不是最前进的，但是还不很落后。商务的资方尽量

想不卷入政治浪潮，但是还没有企图把商务作为一个反革命的堡垒。王云五进入商务以后，就拿商务作他的政治资本，是促进商务走向衰败，反动的起点。”

1948年10月间，国民党教育部指派朱经农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国开会。他向董事会请假，董事长拿不定主意，就向陈叔通先生请教，叔老认为这是请他动身的时候了。因此坚决不准请假。朱经农不会放弃出席联合国这个“美缺”，只得向董事会辞职。

### 十一、穷途末路的哀鸣

大陆解放后，王云五遁迹香港。他重理旧业，在北角英皇道379号开设香港书店，同时还办了一个华国出版社，出版反动书籍。“华国”二字是中华民国的暗射，他以华国名其出版社，决不是眷念祖国，而是念念不忘日薄西山的蒋家王朝。

香港书店的经理是王云五的妻弟徐永昶，以经售华国及台湾出版的书刊和欧美原版西书为主要业务，还贩卖国内奸商及破落藏书家盗往海外的善本古书，攫取暴利，而美其名曰流通古籍。王脱离商务后，如同折了翅膀的秃鹰，无论在经济上、经营上，以至推广宣传等方面都已失去了凭藉，所以这家书店只如昙花一现，不能不与公民书局同其命运。

华国的出版物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王家老铺的热门货，诸如《王云五综合词典》和《王云五小字汇》，王鹤仪的《简明中学英汉字典》和《英文法作文字典》，王学哲的《现代汉英词典》等等。第二类是王云五老本行《小百科全书》的借尸还魂，例如《汉译今世名著菁华》20种，主要系东拼西凑，节译英美论

著和专刊，每册以四万字为度的小册子。《少年自然科学丛书》12种，每种五千至一万字。第三类是华国出版社的压台戏，如：叶青著《世界往何处去》，仇子奇著《南京变色一年记》，杜勒斯著《战争或和平》，朋海姆著《共产主义行将崩溃》，根室著《在铁幕之后》，兰恩著《出卖波兰目睹记》，匈牙利共产党叛徒柯司勒的《狱中记》，以及《苏维埃怎样管制思想》、《苏维埃帝国主义》等等。从这些人名和书名，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内容是什么货色。

王云五在香港混不下去，于是跑到台湾去寻出路。在风云变幻的宦海中载沉载浮了几年，最后还是不免于垮台。从他在1963年11月写的一首诗，可以看出他悲愤抑郁的心情：

良朋满座终须散，笙歌永昼夜难连。

此日挂冠恰到好，再留不值半文钱。

1965年4月

## 回忆韬奋同志对我的教育

凌其翰

### 《时事新报》事件凝友情

韬奋同志比我大十一岁，第一次他和我通信时，我是二十一岁的青年，我始终把他当老师来尊敬。

1927年9月上旬，正当上海黄浦江上乌云弥漫，恶浪滚滚，“四·一二”反革命逆流异常猖獗之际，我侥幸地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牢笼，乘前往马赛法国邮船出国。在船上，我遇到一位从香港上船，到西贡上岸的越南青年，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法语，痛诉法帝国主义对越南人民压迫和剥削的残酷情况。他谈时声泪俱下，我也不自觉地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我就写了一篇短文，控诉法帝国主义并给予严厉的谴责。这篇短文在上海《时事新报》附刊《青光》栏用我的笔名“寄寒”发表，此事竟引起上海法租界当局的强烈反应，向《时事新报》馆追查我的真姓名。适韬奋同志兼任《时事新报》馆秘书，特按照我留学比利时卢万大学时的地址写信给我，对我此举奖勉有加，并聘我为《生活》周刊的旅欧特约通讯记者。从此我就用“寄寒”的笔名，经常为《生活》写通讯稿。每隔几个月，《生活》就把积累起来的稿费汇给我。从此我利用汇来的稿费，添购我所需要的专业参考书籍。直到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提早回国以赴国难，我于布鲁塞尔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考试后，就匆匆返国，才真正有机会认识我在留学时期不断通信，神交达四年而从未见过庐山真面目的韬奋同志。从此得以亲聆教诲，倍感振奋！

### 帮助我办《申报月刊》

1931年12月，我刚回国不久，上海《申报》主人史量才就聘我为《申报》总管理处秘书。当时史老板有中国报业托拉斯之称，他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深得各方的赞同。为了纪念《申报》诞生六十周年，他要我筹办《申报月刊》。我没有办报的经验，既没有编辑的经验，更没有发行报刊的经验，除了请教我敬爱的韬奋同志外，实在无法可想。果然，韬奋同志对我真正有求必应：在编辑方面，他建议我去请教胡愈之同志，胡愈老就推荐俞颂华先生为月刊的总编辑，俞颂华先生是与瞿秋白最早出访苏联的人；在发行方面，也是他特地从《生活》周刊社办理发行工作的人员中，挑选出一位富有发行经验的人员担任月刊的发行工作。后来，俞颂华先生还先后推荐黄幼雄、吴景嵩（笔名杜若）两位同志加入月刊的编辑部。《申报月刊》就是这样创办起来了。《申报月刊》创刊号，又称《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创刊》，内容除了十篇《申报》六十周年纪念文外，有胡愈之的《动荡中的世界政治》、张明养的《半年来的世界》，艺术作品有茅盾的《林家铺子》、巴金的《沙丁》等。

### “可惜这里没有中共朋友”

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中，韬奋同志领导《生活周刊》

社同仁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将士进行救死扶伤的工作，此外他还邀集朋友，发起一叙餐会，当时参加叙餐会的，根据我的回忆有：邹韬奋、戈公振、胡愈之、毕云程、王志莘、杜重远、李公朴、陈彬如、吴颂皋和凌其翰。在上述十人中，韬奋同志已于1944年在上海流亡中逝世，杜重远先生则于1945年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所杀害，李公朴先生则于1946年在昆明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这三位前仆后继，都已先后成为新民主革命的先烈；但也有堕落成为历史垃圾的。这个叙餐会我记得只举行两次就不再继续。它是用叙餐的形式进行的时事座谈会。韬奋同志在叙餐会上发言严肃认真，每次发言总是带一句“要是中共的朋友在这里提供他的看法，那多好！”或者说：“可惜这里没有中共朋友提出他的看法”等等，他向往中共溢于言表，我对他的话留有深刻难忘的印象！

### 灾难岁月 海外重逢

1933年是上海文化界，特别是进步报刊多灾多难的一年。《申报月刊》创办不久，《申报》日报因评“剿匪”的文章触怒了蒋介石，他下令封锁《申报》的发行，使《申报》遭受很大的损失。于是史老板一面派秦墨晒往武汉见杨永泰，一面又派我到南京去见何应钦，继而又回上海见市长吴铁城。终于在惠中、一品香等旅馆，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派来的人员之约，同他们相周旋，亲自领教了这些党棍的欺骗、讹诈卑鄙无耻的伎俩！

1933年初，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了。我曾应该同盟之约，到八仙桥青年会公开演讲英、美、法各国的民权斗争史凡三次，因为讲的内容属于旧民主的斗争史，没有触犯国民

党当局的忌讳！

同年6月18日，传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杨杏佛先生被军统特务暗杀的消息，大家为之吃惊。同年7月，韬奋同志不得不流亡海外，开始遍游西欧各国并考察苏美两国。我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也感到不宜久留，就于是年9月向史老板辞去《申报》秘书的职务。并摆脱了东吴法科、上海法政学院等校教授兼职和律师的业务，于是年11月，应新任国民党外交部常务次长唐有壬的推荐，为国民党驻比公使馆二等秘书，偕我妻康素以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去做国民党的外交官了。

我到布鲁塞尔才三个月，即于1934年2月，偕康素以竭诚接待我俩由衷钦佩的韬奋同志（详见韬奋著《萍踪寄语》二集游比杂谈之一、之二），海外重逢，倍觉亲切！

我二次出国刚满一年，即传来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自杭州返沪途中，被军统暗杀的消息。这是去年6月杨杏佛被暗杀后，军统在上海一手制造白色恐怖的继续！

### 从待机而动到联名起义

1935——1938年这三年时间我同韬奋同志脱离了接触，留下了空白，而韬奋同志就在这段时间内表现得轰轰烈烈，震动全国。从组织救国会起到七君子被捕入狱等等。我藏身于南京国民党外交阵营内，只得暗中遥祝胜利并寄托我的无限的关怀。1939年春，三年不见的韬奋同志忽然密遣生活书店某同志到重庆涨秋山馆国民党外交部来访，说是生活书店有大批书籍从上海辗转运往广州湾（当时还是法国租借地），计划从那里运进西南各地。他希望我与法国方面密商，由法方给予照顾，务使这批进步书籍能



逃脱国民党特务检查的控制。我对韬奋同志的嘱托，当然不能等闲视之，立刻与重庆法国大使馆我熟悉的法国外交官密商，结果终于满足了韬奋同志的要求。而更使我引为欣慰的，就是会同韬奋同志脱离接触达三年以后，居然又能接上了关系！

1939年十月革命节，我出席了重庆苏联大使馆的招待会（招待会的时间是上午十时，借以避免日机到山城空袭）。在会上我遇到久别的韬奋同志，尽管喜出望外，仍抑制着我的感情，以避特务的耳目。他退出前向我微语，邀我立刻到他家共进午餐。他住在学田湾，离苏联大使馆不远。于是我就到他寓，韬奋夫人沈粹缜同志开门迎迓，引我到一个小圆桌旁与韬奋同志面对面坐下。桌上已摆好两副碗筷，由沈粹缜同志端出她自己烹调的三菜一汤。我和韬奋对坐，一面吃，一面谈，而沈粹缜同志则不参加共餐，好让我们两人畅谈无阻。他与我谈生活书店遭到国民党特务种种压迫和摧残的情况，他更义愤填膺地与我谈他的南洋公学同学，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对他怎样利诱威逼的情景……

1940年十月革命节，我又参加苏联大使馆的上午招待会，又遇到我敬爱的韬奋同志，他又邀我到他家午餐，又由夫人沈粹缜同志开门迎迓，又由她端出她亲自烹调的三菜一汤，又让我们对坐共餐而自己不参加，好让我们两人畅谈无阻。韬奋为我谈这一年来他主持的生活书店受到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压迫和摧残的情况，以及徐恩曾怎样咄咄逼人地压他向国民党投降。他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并决定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以便出外流亡……

这时，我向他请教，他想了一下郑重叮嘱我：“你仍可留在国民党外交阵营里，以后待机而动。”

三个月后，即1941年2月25日，他出走香港，以后他就过着流亡生活……到1944年7月24日，万方景仰的韬奋同志因患耳癌症，医治无效而在上海与世长逝！

我和韬奋同志两次十月革命节，特别是1940年十月革命节的会晤可算是永别前的会晤，而他要我继续留在国民党外交阵营里，以后“待机而动”可算是他永别时对我的临别赠言。

1948年我被蒋介石调出国，使我有了弃暗投明的机会。1949年10月10日，我参加了国民党驻法大使馆全体同仁联名通电的起义行动，实践了1940年十月革命节韬奋同志对我的赠言，而这时韬奋同志已逝世五周年了。

## 胡愈之同志早年活动的片断回忆

朱光潜

说到胡愈老，我在幼年时对他就很景仰。当时我在家塾里阅读到的报刊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愈老那时就已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还不是编辑，而是打杂，境遇很苦。但我把他的工作当作我的理想，准备走他的道路。我曾通信投考商务印书馆的学徒，想趁此既可以学习又可以从事文艺活动，接触一些新思想，弥补乡村教育的贫乏。但是我没有被录取。

1923年我离开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和匡互生、夏丐尊、丰子恺等人转到上海，与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陈之佛、刘大白、夏衍等商妥，成立了一个立达学会，在江湾筹办起立达学园。此后和胡愈老接触就日渐多起来，他给我的印象是刻苦耐劳，勤勤恳恳。我们这一批人对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政治现实和教育情况都深为不满。

立达学园办起来之后，1925年我去欧洲留学，和胡愈老差不多同时出国。他到法国，进巴黎大学学习法文和法国文学。我赴英国，先后进爱丁堡大学及伦敦大学学习。英法只隔一个海峡，过海只要花几个小时，所以我同时在巴黎大学注册，时常过海听法语课并看望胡愈老和其他朋友。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常和他们在巴黎会面交谈。

胡愈老住在巴黎的拉丁区（大学区），在旅馆里租了一间很宽大的房子，房租每月约六百法郎。在当时的穷学生中这是很少有的。我住在巴黎郊区一位裁缝工人家里，每月房租只需三百法郎。胡愈老宁肯节省饭钱，往往到街头站着吃一种“鱼餐”，那是炸小鱼和土豆（而正餐则要花好几元）。他在吃的方面极其节省，而使住房宽敞一点，便于上课及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接待巴黎文化界各国人士。

我每逢进城上课，都要去看胡愈老。当时和他住在一起的是陈诚的弟兄陈忠恕，此人也很勤奋好学，保持着书生本色。胡愈老待他很好，可惜陈死得很早。

在我的印象中，胡愈老的大衣口袋里经常塞满报刊，大半是国际政治活动动态或是世界语方面的报刊。世界语和国际政治这是他当时最关心的两件事。他在巴黎很活跃，同各国左派留学生接触较多，并且开始研究世界语。胡愈老是在中国最早提倡世界语的，对世界语在中国的发展功劳很大。当时胡愈老和共产党似乎尚无直接关系。他有个弟兄叫胡仲持，是共产党员，我是回国后才见到的。胡仲持对他可能有一定影响。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大半都有无政府主义色彩。中法大学校长李石曾是勤工俭学运动的领导人，也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在中国传播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人物之一。

先前我们同匡互生等在上海创办立达学园，名为“学园”，就是要把学校当作劳动基地，这也是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记得筹办立达学园时，我曾经陪匡互生跑到北京找过李石曾，并由他介绍见到了教育部长易培基、副部长黎锦熙，得到他们在经费和道义方面的支持。在立达学园之上还有上海江湾的劳

动大学，这所学校的名称就把劳动生产的宗旨明白地标明出来了。

当时我们不满旧军阀统治下的旧教育，认为要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就必须改革旧教育制度，争取青年一代，所以还办了一个刊物叫做《一般》（即后来的《中学生》），由叶圣陶、夏丏尊主持。《中学生》至今由叶老的儿子叶至善任编辑，还在发挥教育青年的作用。胡愈老从立达学园创建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立达学园这一系列活动的大力支持者。

胡愈老是我生平最敬佩的一位老友，我一直把他看做治学做人的榜样。他年纪比我还大一、两岁，身体也比我稍差，可是工作头绪比我多几倍。他从容不迫地处理着多方面的繁重工作。我每逢想松劲偷懒时，一想到他的榜样，就提高了自己的勇气。

（邹士方整理）

## 关于杨荫榆之死

廖辅叔

杨荫榆这个名字，对于没有读过鲁迅的《华盖集》的人来说，大概是相当陌生的。六十年前她却是留学日本和美国，掌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大权的著名人物。经过女师大那次风潮之后，从此销声匿迹。我却因偶然的机会，听到了她的下落。那是五十年代初，我与杨荫浏同志及曹安和同志同在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工作。曹安和同志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师大音乐系，杨荫浏同志的名字又与杨荫榆的同一个字辈，他们又都是无锡人，于是好奇地问他们是不是一家。答复是肯定的，但不是嫡亲而是远房的同宗。我这个人很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当即再问一句，这个人后来怎么样？曹安和同志说，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杀了。我当时一惊，但因为忙着别的事情，没有继续谈下去。

最近我走访了曹安和同志，希望能得到更具体一点的材料。

曹安和同志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大姐，她听我说明来意之后，喟然一叹，说，这个人其实不失为一个好人，就是太古板。例如她在女师大规定寄宿女生如果需要外宿，必须有外宿所在地的负责人出具证明才能得到批准。诸如此类的清规戒律当然就引起了追求思想解放的女生的反感。积怨已深，一触即发。在那次风潮中，他得到“老虎总长”章士钊的支持。鲁迅对当时的反动统治者

和刘荫榆进行了笔挟风雷的挞伐。杨荫榆因此下了台，回到了苏州乡下。“以后她还有过些什么活动？”我再问一句。曹大姐说，她虽是无锡人，却定居在苏州，她们平时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一无所知。只知道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苏州之后，奸淫抢掠，无恶不作。有一天杨荫榆在街上看见日本兵行凶杀人，她忿然上前干涉，日本兵蛮不讲理，她声称要找他们的官长，制止这种野蛮的行为，于是跑进了日本的指挥部。到她从日军指挥部出来之后，日本兵立即追上去，把她乱刀捅死了，并把她的尸体投到河里去。曹安和同志说，这是她1946年随同音乐院从重庆复员到了南京，再回无锡探亲的时候听她父亲说的。曹老先生还说，杨荫榆始终是她那书毒头<sup>①</sup>的脾气。

杨荫榆死于日本侵略军屠刀之下，她的死给我们的启发是：光就一时一事不可能对一个人做出正确的评价。即以女师大的那次风潮而论，当时支持杨荫榆的有我们最尊敬的科学家，反对杨荫榆的人中有的在抗战期间却做了汉奸。中国历来有所谓“晚盖”的说法，意思是用后来做的好事来掩盖先前做过的坏事。杨荫榆处理女师大风潮的所作所为，当然是错误的，但她的晚年为抗议侵略军的暴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发扬了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见危授命”这句话可以说是杨荫榆盖棺的定论，虽然她身后也许根本是无棺可盖，呜呼！

---

<sup>①</sup> 书毒头系无锡、苏州一带口头语，即指书呆子。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童公学

叶 弥 诚

我于1914年2月考入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办的华童公学预科，于1922年6月毕业，1932年9月又回到华童公学担任英语教员，直到1943年8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公共租界后，英籍校长罗勃离校为止，前后计二十年。在该校时，我与英籍校长和教员接触甚多，现就耳闻目睹，亲身经历，写成此篇。

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1904年11月12日设立第一所华人子弟学校——华童公学。顾名思义，华童公学系对西童公学而言。当时公共租界工部局早已设立西童公学男女校各一所，专收公共租界外籍纳税人子女，编制仿照英国中等学校，以培养学生报考英国大学为目标。

1916年以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共设华人学校四所，专收公共租界的纳税华人子弟。这四所学校就是华童公学、育才公学、聂中丞公学、格致公学。专收男生，不收女生。入学年龄一般在七、八岁，至十七、八岁毕业。这些学校实际上是英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大本营。下面我就记忆所及，在学制、课程、行政管理、中外教员待遇等方面，列举事实说明。所引的数目字，因记忆关系可能略有出入。



## 一

这四所华人学校，仿照英国中等学校的学制，包括小学、中学（称预科、正科）共九年。一般居住上海公共租界纳税的华人子弟，读满小学三年级（即预科）的，经过入学考试，即可进入正科。

这四所华人学校，名义上是为纳税华人设立的，但学费高昂，非一般靠工资收入的家庭所能负担。1904年至1919年学费每人每学期二十元；1920年至1922年由二十元增加到四十元；1922年至1930年每人四十八元，较上海当时私立学校高出一两倍。（当时食米每石价格只有三元至六元。）

学校所收的学费，1904年至1919年，规定只收英商或美商银行所发的纸币，不收当时中国人所通用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纸币。因此每年春秋二季开学前，学生家长纷纷在上海虹口小钱庄，将中国纸币换成英币或美钞。这些小钱庄，大事投机，勒收手续费，往往缴付二十元学费，换成英币、美钞，却要用二十一元的中国币。

学校里从学生、教员直到校长所用的一切书籍和文具，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必须统一由工部局在伦敦订制（上面印有上海工部局中英文字样）。有时上海国产品质量较好，价格较便宜，但校长命令不许采用。统一由英商伊文思书店到伦敦代购，其价格要比中国制的高出十倍以上。当时学生家长只能忍受这种剥削。

## 二

这四所华人学校的培养目标正如在招生简单上说的，“本校

训练学生为上海公共租界公民。”其意为：培养的人才，只能在英国统治下的公共租界工作，为英帝服务。

这四所学校，由最低班到最高班，即预科三年正科六年，共九年毕业。最高班（正科第六班）学生参加“英国剑桥大学高级就地考试”（1916年改考香港大学考试）；低一班的学生（正科第五班）参加“剑桥大学初级就地考试”（1916年改考香港大学初级就地考试）。初级考试不及格，不得升级，即不能升入最高班。高级考试及格后，工部局学校发给毕业证书。毕业生极少数进入大学，大多数由校长介绍就业。校长所介绍的职业，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低级职员，或巡捕房口译员，或上海的外国商行的低级雇员。二三十年后，有的升为高级译员或买办，毕生为英国人效劳。因此在学校训练过程中，特别注重外国商行用的英语。

### 三

课程方面，华人学校各校均分中文、英文两部份。中文课程包括读四书、《左传》、《古文观止》和中国历史地理等科目，用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的教科书。在一所有学生四百人的学校中，只有中国教员十人，其中大多数是前清的秀才（这些人埋头于“四书”和写八股式的文章），很少有受过新教育的大学毕业生。

除了中文和中国历史地理外，其余课程包括文法、作文、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地理、音乐及体育等科目。全用英语讲授。英语教学内容着重于替洋商服务的一套应用文。英国文学教古典文学及诗歌；书目按照剑桥大学或香港大学考试所规定的文学作品。例如司高特的《十字军英雄记》、司蒂文森的

《金银岛》、莎士比亚的剧本、麦高米的散文等。

数学教学要花八九年时间，专教英文度量衡及英国币制的应用题。英国度量衡币制，是世界各国中最复杂的计算制度，不以十进位（例如4法丁=1辨士，12辨士=1先令，20先令=1镑；16两=1磅，2240磅=1吨，12吋=1尺，3尺=1码，1760码=1英里等），计算麻烦，学生浪费脑力，花八九年的时间，做这种习题，对中国来说毫无实用价值。但这是剑桥及香港大学考试题中的主要部分。物理、化学、不过读读课本，背诵原理；实验室规模小，学生很少进去。这种设备，为装饰门面而已。外国历史地理，注重精读英国本土及殖民地的史地，宣传英帝国的伟大，使学生盲目崇拜英帝国主义。

各科所用的教科书，全部用英国原版本，书价昂贵，每学期课本及练习本需要四五十元。这些课本，都是英帝国主义死硬派所编写的，他们宣传中国文化落后，世界上落后民族需要英帝国主义统治等概念，以达到英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的目的。

英国课程大部分由英国教员担任，一小部分由中国教员用英语讲授。一个学校英国教员约十五人至二十人。这些英籍教员，是由上海工部局驻伦敦代办处在英国各地选拔那些最富有殖民主义思想的人到上海来担任的。这些人在上课时，结合课本的内容，积极宣传崇英思想，进行奴化教育；终日教学生讲英语，忘记祖国语言，说这是莫大的“荣誉”；说中国政府落后，缺乏办教育的能力，办教育非由英国人主持不可，培养学生以做中国人为耻的洋奴思想。

在华人学校里，每周学生上课四十学时，名为中英并重，但中文教员教的中文课程不到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的课程，均

由英国教员担任。

在音乐课里，教的是英国国歌，唱“上帝保佑国王”及英国流行歌曲，此外还有校歌。四所华人学校，同用一校歌，校歌里有“服从指挥”一句，意即做学生时以服从为主，将来毕业担任工作时，才能具有指挥和领导下级的能力。在各科教学中，英国校长特别着重叫中国学生服从外国教员，养成中国学生盲目崇拜英帝国主义分子的习惯。

华童公学每日上课以前，全校师生齐集大礼堂。师生到齐后，校长才走进礼堂。全体师生起立，等校长走上讲台，全体师生才能坐下。校长用英语报告时事或校务，由一位中国教员口译成汉语。报告完毕后，全校师生同唱英国国歌或其他的英国歌曲，然后师生进教室上课。中国学生经过八九年学习，会唱不少的英国歌曲。但对当时中国的一般流行歌曲，却不会唱。

#### 四

工部局各华人学校，实行校长独裁制（最初称监院，后改称校长）。校长由英国人担任。教务训导由校长一人主持，训导的职务除校长外，有学长八至十人协助。学长是校长从最高班学生中选拔组成的，负责维持全校纪律和秩序。对一般违反校规的学生，校长给以记过的处分，重时施以体罚。情节特别严重的，由校长开除。所谓校规及学生守则，没有具体规定。学生是否违犯校规，只凭校长一时的喜怒断定。

华童公学自1907年起至1933年止，由英国人康普担任校长。这人粗暴无比，经常殴打学生和勤务员。我亲眼看到康普在上课时，打学生耳光。康普喜怒无常，不可捉摸。他对中国教员，说

话很不客气，教员挨他的骂是司空见惯的事。可是他对待外籍教员，尤其是英籍教员则迥然不同，态度和蔼，爱护备至。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华童公学适逢康普休假回国，希廉代理校长。最初他不肯宣布停课，后因学生全体缺席，只能暂时停课。高班学生在校外活动，纷纷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领导的罢课游行宣传。最高班学生中，不乏叛徒，有人把学生活动的情况，私自向希廉汇报，希廉一一记载在校长日记册里。运动末期，多数学生回校上课，尚有少数学生坚持罢课。希廉召集全体高班学生谈话，说什么“学生不必参加政治活动，全国罢市罢课没有意义。”等等，并规劝全体学生回校上课。运动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就大考和放暑假。秋季开学康普休假期满返校，希廉在离校前把五四运动和学生政治活动的事向康普汇报，并建议处分这班参加学联活动的积极分子。康普调查后，召集少数高班学生说：“你们曾参加过上海学联，严重违犯了校规。学校宣布停课，你们就应该在家复习功课，参加示威游行和其它政治活动，是不应该的。我们的学校，只需要你们好好读书，政治是学生不许过问的，你们既已违犯了校规，我只能告诉你们一句话，就是将来你们最高班课程修业完毕时，我不能认为你们毕业，我不发给毕业证书。”康普这种做法，非常毒辣，他不敢开除这班积极分子，而用不发毕业证书来威胁学生。

## 五

中国教员与英国教员虽同等资格，担任同样工作，但工资却相差达三、四倍，兹举例说明：

英国校长最低工资每月700至900元，最高的可达1500元（折银

两计算的)。每隔五年每月加薪250元。服务满五年，全家大小回英国休假，头等舱往返川资，统由工部局支付。休假期限十个月，1927年起改八个月。休假后，换发聘书一次。其它待遇包括汇兑津贴、医药津贴，子女津贴，免费宿舍，免费汽车，并享受退职储金。（每月规定扣工资百分之五，工部局扣百分之十，共百分之十五，存银行年息五厘复利，服务满二十年的人员，退职时一次可拿到数万元。）此外退休后，每月拿半薪退休金，至死为止。

英国教员规定亦分等级：

第一级教员，英国大学毕业后另考取教师文凭者，工资每月最低600元，最高1200元，每隔五年每月加薪200元，每五年全家乘头等舱回国休假，换发聘书一次。其余各种津贴，退职储金，退休后每月拿半薪等办法与校长同。

第二级教员，英国训练学院毕业，工资每月最低500元，最高1000元，每隔五年每月加薪150元，其它待遇办法与校长同。

第三级教员，规定持有英国教育部教员证书的，工资每月最低450元，最高900元，每隔五年每月加薪100元，其它待遇办法与校长同。

以上各级教员及校长，统由工部局发给聘书，规定上述各种优厚待遇。

中国教员分教英语课程，和教中文课程两种不同的待遇。两种教员都无聘书，又无一切津贴待遇，随时可以解雇。中国教员工资每月最低60元，最高300元，按年增加5至10元。

外籍有聘书的教员，有病除免费医疗住医院外，代课教员工资由工部局支付。中国教员有病医疗费用自理，告假一周以上

的，代课教员工资，由中国教员本人承担。

其它不平等待遇尚有：

外籍教员使用数间富丽堂皇的教员休息室，每人用一写字台，夏天有电扇，冬季有电炉及暖气设备。中国教员十几人合用一小间教员休息室，设备简陋，数人合用一长桌，作为备课之用。

厕所亦分中外。外籍教员的厕所，有卫生设备与暖气；中国教员的厕所，是一个土式的，与全体学生共同使用。

英国校长康普及罗勃等，宗派主义思想严重，在选择中国籍英文教员时，他们常常雇用工部局华人中学的毕业生充任；对国内外大学毕业生，他们在教员缺乏时，不得已也雇一两名。但外来的英文教员，总与英国校长格格不入，校长与他们处处为难。校长每月检查工作和听课时，站在教室后面，遇到中国教员英语发音与他略有差别时，他便大声阻止该教员发言，上讲台亲自接下去教课，并责备教员的业务水平不够，吹毛求疵地恶意批评，使中国教员很难堪。故外来的中国教员，总是不能长时间在华童公学教课，如林王霖、王成栋、张德褒、袁朔等，在华童公学至多教一两学期，就自动退职了。至于本校毕业生，康普及罗勃则另眼看待，遇到在教学上犯错误时，不过批评两句，也就完事，并不象对待外来的教员那样的苛求。英国校长这种做法，用意深远，他们要从自己培养的大批毕业生中，选出忠实于他们的人，以便长期地维护他们的统治。

我是旧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毕业生，圣约翰大学是在美国纽约州立案的大学，毕业生与其它美国大学的毕业生在美国是享受同等待遇的；但1932年我到华童公学工作时，列为第二级中国教

员，工资150元，按年增加12元，并无其它的津贴，与外籍教员第二级工资相比，相差三、四倍。

英美籍教员待遇也不同，康普是英帝国主义的死硬派分子，他在教学中，总说英国伟大，教育办得好；有学问的人才能取得英国大学的学位，他认为美国大学学位，随便给与无学问的人；英国大学的博士、硕士，能代表人的学术水平，美国大学的学位，不能代表人的学术水平，一文不值。康普对待华童公学的英美籍教员，很有区别。英国教员除有聘书外，待遇优厚，校长对这些教员，格外尊敬；美籍教员是不发给聘书的，工资比英国教员低一倍，无其它津贴待遇。康普常说美籍教员教学效率太低，不能称职。结果许多美籍教员教了一二年，就被康普停了职，改用英国籍教员代替。这种例子很多，据我所知，如侯恩、皮安思等美国籍教员，都因受康普的不平等待遇，工作了短时期，就脱离华童公学，到教会大学去担任教授了。

1936年冬季，有位教英语的中国教员周某因学校不供给宿舍，家住在离校较远的地方，每日乘公共汽车或电车到校上课。有一天进校门迟到两分钟，罗勃校长命令周某暂时停止职务，以便向上级请示如何处理迟到事件。事件发生后，周某的妻子直接向工部局申诉，她是英国籍，上级同意周某恢复工作，罗勃无法，只能让周某继续教课。而外籍教员迟到，每日有之，甚至有迟到一两小时的，罗勃也不加以批评。待遇如此的不平等，中国教员实无法再容忍下去了。

工部局华人中学，校历规定除寒暑假外，中国节日如端午、中秋、国庆放假，外国的圣诞节、耶稣受难日、复活日也放假。1904年至1920年每年5月24日，英国帝国节日也放假一日。在放假的前



夕，英国校长说明：那日是英女皇维多利亚的生日，在英国本土及殖民地都举行盛大庆祝会；并说维多利亚是英帝国最伟大的女皇，并吞印度，攫取非洲，建立英帝国；在说明时，竭力灌输奴化思想。1921年以后，因工部局有外籍董事反对，那个日子各华人中学才停止放假；但英国教员和校长缺席一日，功课却要由中国教员代上。

## 六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1943年3月工部局各校英籍校长和教员们，全体被日本军关到集中营。四所华人学校，校长由中国副校长接任，由日本控制的工部局领导。1943年10月，日本军部要在这四所男子中学抽合格的学生参加军事训练，准备与新四军作战。四所男中校长（华童公学林步基，育才公学刘崇本，聂中丞公学黄仲苏，格致公学胡祖荫）和女中梁校长集会讨论，不愿与日本人合作，决定全体向工部局辞职；但华童校长林步基却反对，不愿辞职，甘愿替日本效劳，执行抽壮丁的指示。结果除汉奸林步基以外，其余四位校长全体辞职离校。林步基执行了日本的方针政策，时时向日本军部秘密汇报校内情况；对进步学生监视甚严，不许集会及参加抗日的活动；逼迫教员和学生拥护“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等“以华制华”的侵略政策，并参加公祭汉奸汪精卫等游行和集会。

## 我的舞台生活（七）

艰难岁月

袁世海

### 五十八 铁蹄下 处境凄凉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芦沟桥点燃了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火。平沪交通处于半瘫痪状态。我们所乘的是沪——平最后一次列车，我和李宝樾坐在软卧车厢内，不时地望望窗外，紧张而又恐惧。时间是那样难熬……

误点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终于驶进北平前门火车站，结束了这次使我们心惊肉跳的旅程。

走出车站，我不禁吸了一口凉气。变了，眼前一切都变了！繁华的前门大街变得死气沉沉、一片萧条。各家商店都收起了五颜六色的招牌，店门紧闭。往日的茶摊和高声喊叫的小卖，如今已不知哪里去了。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小铺面，半掩店门维持营业。路上行人稀少，到处是一袋袋堆在路口准备巷战的沙包，歪歪斜斜贴在玻璃上的防震纸条，往来巡逻的警察。我俩匆匆分手，急忙奔向各自的家。

我走进院里，见母亲正在屋门前做饭。

“妈！”

母亲闻声回首看见了我，立即放下手中菜铲说：“哎呀，可回来了！谢天谢地！”母亲说着眼圈红了。

“我也着急！芦沟桥离北平太近，怕家里出事……”

“唉！别提啦！那天早上四点半，天将蒙蒙亮，轰，轰的大炮声把我们都震醒了，弄不清是哪儿打仗，听跑声离咱们不远。你哥哥说，跑吧，我想着，往哪儿跑哇？听天由命吧！八点多钟，炮声算是停了，西屋你虾米海大哥也拉不了车啦！说是日本兵炮轰芦沟桥。十一点多，炮又响起来啦，你哥哥跑回来说，看到别人家将棉被堵在窗户上挡子弹，我和你二姐赶紧缝布裤，将被子也挂在窗上，这几天都乱哄哄。我担心着，真若打起仗来，把你截在外面，咱们一家子，是不是还能见……面……呀？”说着，妈妈语声哽咽，流下了眼泪。

正说着，一股糊焦味冲进我们的鼻子。“锅！”一旁听得入神的二姐喊了一声。跑过去一看，还用说，锅里的菜烧糊了。

“几天都没有吃到菜，今儿你哥哥好不容易抢着买了点，又烧糊了，真是……”母亲一边端锅用菜铲不住地翻搅那发黑的豆角，一边惋惜着。

“糊就糊着吃吧，回到家啦，吃什么都是香的。”我高兴地说。

“那就凑合着吃吧，这一斤豆角比平时涨出好几倍，倒掉太可惜。唉！米也涨价，面也涨价，仗打起来，就更不知会怎么难哪！”

北平沦陷后，无数难民，露宿街头，饿殍满地。投机商乘机猛抬物价。家家户户人心惶惶，戏院虽是恢复了营业，谁还能有心思看戏？为了生活，盛藻哥和我等强打精神演出，但上座率极差。

第一场戏给大家开了钱，盛藻哥和我白唱。再唱，连底包的钱也开不出。只得停唱。在此期间，日军侵华的战火已经弥漫全国，上海、江南一带战火纷飞，更不可能到外地演出，终日困守家中。

为了不致蹉跎岁月，我每天清晨去坛根喊嗓，在院里练练功，下午去盛藻哥家中。他的家在前孙公园西口库堆胡同，离我家相隔一箭之地，来去很方便。我们对全本《三国演义》——从桃园三结义起，到诸葛亮七星灯借寿斩魏延止——如何分段演出，如何搭配人员等想法进行商讨。这些想法，后来陆续得以实现，先后排演了二十余出三国戏。

《桃园三结义》至《打督邮》，李盛藻饰刘备，李洪春饰关羽，我饰张飞。

《孟德献刀》至《温酒斩华雄》，李盛藻前饰陈宫，后饰刘备，高盛麟饰华雄，我饰曹操，李洪春饰关羽。

《许田射鹿》、《论英雄》、《斩车胄》，李盛藻前饰董承、后饰刘备，我饰曹操。

全本《祢正平》（祢衡号正平）从骂曹起至斩祢衡止，李盛藻饰祢衡，我饰曹操。

《马跳檀溪》至《火烧博望坡》，李盛藻前饰刘备，后饰诸葛亮，我饰张飞。

《汉阳院》、《长坂坡》、《汉津口》，李盛藻饰刘备，李洪春饰关羽，高盛麟饰赵云，我饰曹操。

《舌战群儒》至《激权激瑜》、《临江会》，李盛藻饰诸葛亮，我前孙权、后关羽。

《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李盛藻前饰鲁肃，后饰诸葛

亮，最后赶关羽，我饰曹操。

《六出祁山》包括《庸良关》、《天水关》、《骂王朗》，李饰诸葛亮、我饰姜维、王朗。

数日来，家中生活费用入不敷出，我去南京等地所得的些许余款，亦将用尽，看看时近腊月，一家人正在暗暗焦急。

一天，盛荫哥兴冲冲来到我家，他迈进门口就喊：“三弟，号外！号外！哈尔滨、沈阳两个地方的戏院联合约咱们去演出一个月！”我高兴极了，忙追问：“什么时候去？”

“正月初一在哈尔滨华乐舞台打泡！”

“太好了！”

“且慢！愚兄还有下情回禀！”

我用手将桌子一拍，伸出食指和中指指着他说：“慢慢地讲来！”我们心里一时兴奋，竟将台词搬出来。

“哈尔滨、沈阳是属‘满洲国’，那里市面很乱，便衣、警察成堆，动不动就打人，饭馆、戏院前后台都混着便衣，不认识的人，不能多说话……”沉默片刻，我说：“咱们唱咱们的戏，少说话，别招惹是非……”

谁都清楚，闯关东，冒风险。可是开锣唱戏，挣钱养家，是大家的迫切愿望。最后，还是咬牙应承了。母亲不放心，让哥哥也随我们去，好互相照应。

## 五十九 冒风险 关外谋生

为到东北演出，文杏社组织了一个二十余人的小队。其中有盛藻哥和他的琴师魏铭、鼓师刘富溪师兄，陈丽芳（青衣）和她的琴师陈鸿寿、鼓师张老，其余还有小生江世玉、二路老生李宝

橐，小花脸高富全，另有三个管事：徐盛昌、王慎之和盛荫。

我们从北平乘火车到塘沽，换乘海轮到大连，再转火车至哈尔滨。李香阁到大连码头迎接我们，并热情地办了接风酒席。宴会上他动员我们“抢顶帽子戴”——也就是在此地抢时间加演三场。当时，虽正处年底上座率最低的当口，居然卖了三天七成座。大连宏济舞台是二千人的大剧场，七成座的收入，剧院、剧团三七分帐，双方获利加倍。我们除应得之份，每人还多了些“杂拌”钱（杂拌是过年时一种混合蜜饯果脯），皆大欢喜。于是启程前往哈尔滨。

冬季的哈尔滨是一片冰雪世界，所有的建筑都着上了皑皑素服，放眼望去，凄怆、肃穆。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群黑黢黢的乌鸦在低空盘旋，忽而落在附近几棵大白杨树上，将树枝上晶莹的积雪踏下，随后发出几声“哇，哇！”尖叫……

我们在一家旅馆内安置下来，谁也没敢去大街转转，都安分守己地坐在房间里闲谈。

忽然推门进来一个人，他将我们打量了一下，又将床位扫视一遍说：“你们从哪疙瘩（东北方言，意思是哪里）来呀？”

我们见来人身穿羊皮袄、黑坎肩，头戴一顶黑皮帽，挺神气。眼睛还四处鳖摸，听话音挺硬，难道他就是便衣吗？大家都有些紧张，嚅地都站了起来。王慎之抢先一步，拱手作揖：“我叫王慎之，请您多关照！我们从北平来。”

“你们在哪疙瘩唱戏呀？”

“同乐舞台，您有何贵干？”

“你们有衣服啥地，我求（取）走。”他要我们的衣服？这是什么规矩呀！

“您的贵处是……？”王慎之胆怯地强笑着问他。

“咱是洗衣局的，咱洗的衣服又便宜又好。”

啊！这简直是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我们扑腾一下都坐下了，笑哇，几乎笑闭了气。

且喜，我们的演出营业甚好。海报贴出，三天打泡戏的票很快售完。几天过去，我们的心情相对地松弛了一些。

哈尔滨分道里、道外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道里十六道街，干净、整洁，绝大部分是俄式的高大建筑。饭店、咖啡馆、鸦片馆、舞厅比比皆是。道外是中国百姓居住的地方，又简陋，又脏破，我们看后，不禁感慨万分。

我和哥哥去道里游逛，经人指点，我们走进一所公园。听说里面有个立等可取的照相馆，我想到远在北平的母亲，在思念千里之外的游子，就和哥哥每人花了二角钱照了一张像片，连同平安家信，一并给母亲寄去。

在这里，我也交了一位好朋友。那是在我们演第三天打泡戏《群英会·借东风》的时候。离开演的时间不多了，专管后台的徐盛昌师兄，发现没人化黄盖的妆，连连大声地问了几句：“哪位演黄盖？”我们带的人有限，当地戏院的演员与我们配合演出。

“从北平请的角儿来演呀！”

坐在衣箱上养神的一位搭了话，盛昌师兄见他那剃得光亮的头，就知道准是位演花脸的，就向他走了过去：“您演……？”

“曹操。”

“不！误会了，您演黄盖吧！我们世海弟宗郝寿臣的路子，他演曹操。”

“那好，那好！”他听罢就匆匆地勾起黄盖的脸谱。

开戏后，黄盖上场了，盛昌师兄找了一位当地演员了解，才知道此人名叫小鸿庆，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年铜锤架子花脸。他不肯扮演黄盖主要是因为东北演此戏受南方的影响较大，曹操的表演很少，均由一般的底包演员饰演。所以才出现刚才的局面。

及至我穿好服装，我的化妆和服装引起了他的注意，我在场上表演，他始终扒开台帘看戏。《回书》一场刚结束，我回到后台，将头网摘下，喝水休息。

“贤弟，佩服，佩服！演得真好！请问，你演的这出戏，完全是宗郝寿臣先生的路子吗？”他问。

“略微学点皮毛吧。”

“您将剑眉、三角眼改成……这叫……？”他仔细地看着我勾的曹操脸谱。

“这叫单眉、细眼。”

“红开氅、相巾改成红蟒、相纱，有气魄。曹操一出场就给人与众不同的感觉。统领八十三万人马的曹丞相气魄出来了，……怎么想的呢？”他看着我穿的服装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问我。他肯于琢磨的劲头，感动了我，我破格地话多起来。

“演曹操这出戏，改穿红蟒、相纱，是郝老师改的。他怎么想的……我们科班的肖长华先生教我演全本《三国志》时，《群英会》这一折的第一场原是操练水兵，曹操身穿红蟒、头戴相纱。

《回书》是第二次上场，所以换穿家常的便服——相巾、开氅。现在，头场删去，曹操还穿便服，气势不够，我想郝老师是为此而改的。”

“有道理，有道理，唱和身段也加得好，观众多欢迎啊！年



青有为，贤弟，你前途不可限量！”他说着索性搬来一把椅子，我看他坐下来准备畅谈，忙提醒说：“咱俩都得听场，千万别误了。”他点点头接着说：“我们东北演曹操的戏都比较粗糙，没有你这种演法，去年言菊朋老板来这里演过《阳平关》，曹操也是你们富连成一位叫孙盛……”

“是孙盛文吧？”

“对，对对，是孙盛文。他演的曹操也是很细致，很讲究。”

“当然啦，盛文哥是手把手教我的师兄，我演《阳平关》也是他教的。”

“太好了，以后，你能给我说说吗？”

“说戏，没问题，好不好的您多包涵吧！”

后来，他对我在艺术上向他倾囊而倒，很是感谢，我对他的好学精神也很佩服，互相结下了友谊。临别，他送我很多东北特产，我也将一预备用的相纱留给他做为纪念。

## 六十 入骗局 横遭欺诈

十天演出顺利过去，我们受到了观众极热烈的欢迎，也受到内外行的一致赞扬。戏院经理很高兴，一再要求续演一期，我们的管事一再推辞。最后，经理坚持要求续演三天，管事仍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只得不欢而散。

为什么管事们不同意在哈尔滨续演呢？因为他们一心想早日返回大连赴李香阁之约。李香阁曾说：“望沈、哈结束，早返大连。春暖花开日，上座率会更好，肯定会有好钱赚。”这些话，吸引力很强，王慎之等考虑：大连宏济舞台是容近二千座位的大剧院，只要上七成座就加倍得利。再次返回如能维持半月，就相

当哈、沈一个月所赢，而且哈、沈两地都是给定数包银，比不上三七分账沾光，因此坚决推却哈尔滨的要求。万没想到这一推辞，酿成了灾祸，吃了大亏。

原定的末三天演出，海报没按常规刊登临别纪念的广告，就已引起我们的纷纷议论。两天后，海报公然复登我们曾演过的前三天打泡剧目。我们对此实难理解，问了两位管事后才知海报是经理单方作主刊登的。我们很恼火，就请管事去质问他。

经理对管事说：“你们的演出，观众欢迎，续演是观众的一再要求。跟你们商量，你们不同意。我不敢把观众惹恼哇！这也是事出无奈，多包涵！多包涵！”。几句话，就将王慎之、盛荫打发回来了。事已至此，他们想尽量别把关系搞僵，对付演三场，好早日赴沈。于是回言劝说我们。盛荫挨个请求，大家只好勉强应允。

可是，万没料到，刚演完第二场戏，海报上又登出再续演三天的剧目。大家找管事质问：为什么经理又强行续演？为什么加演的两场戏份钱拖着不付给？二位管事也很生气，安慰我们，让我们先上场演出，他们去找经理评理。直到戏散了场，我们吃过了夜宵，他们才回到旅馆。

盛荫一句话没说，呜呜地先哭起来。“你别哭，到底怎么回事？”大家焦急地追问着。

“唉！”王慎之长叹一声，委曲地说：经理说啦，他们花了一万元，把咱们从北平接来，难道就这样，也不答谢一下就走吗？咱们在这个剧场演出，剧场主要演员都停演了，他们当老板的不忍心看着这些演员耽误了正月的好买卖，把这三天的收入照顾给这些演员了。还有剧场里的人，底包、龙套，上上下下百十

来人，为咱们辛苦了半个多月，同行同伙也该照顾。续演三天的钱就是为照顾这些苦伙伴们的……”

其实这些鬼话不过是他们敲竹杠的借口罢了。我们没等王慎之将话说完，就愤怒地嚷起来。有人劝大家静下来，让王慎之把话说完。

“是呀！对这种无理要求，我们俩一听就急啦！哪肯答应呢？一直谈到这会儿，几个钟头啦！最后，经理变成枣红脸，说：‘广告是登出去了，票也卖了，如果你们执意不演，我不勉强，到时候观众起来闹事，还甭说砸了戏园，就是碰坏一个茶碗，也朝你们说！’他说完就走，把我们俩给焊在那儿啦！怎么办呢？我们对不起大伙呀，盛荫越想越委曲，半路上就哭了……。”

太欺侮人啦！这窝囊戏说什么也不能再唱！”

“越唱，他们越觉得咱们好欺侮！”

群情激奋，大家拍桌、跺脚地怒吼起来。世玉拍着口袋说：“说死我也不唱，车票钱我还有，我这就坐车回家！”他转身就去捆铺盖。当时还有几个人也去收拾行装。房间里乱成了一锅粥。

扑通一声，盛荫双膝跪在地上：

“我求求……求……听……我说、说……吧！”盛荫已经泣不成声。

屋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个人过去将盛荫拉起来。

“有话慢慢说，犯不上跪下呀！”

“我……我……说……”他哽咽得语不成声。大喘一口气，才又接着往下说：

“我们无缘无故为他们白唱六场戏是窝火，若是硬抗，再出

点事儿，就更难办了！咱们在这儿人生地不熟，找谁说理去呀？谁又能替咱们说话呀？……这件事是我给办砸了，我对不起兄弟们。事到如今，没别的路可走，我只求兄弟们帮帮哥哥，权当是给我唱几场搭桌戏，我给大伙跪……”他泪流满面，说着，又要下跪，被大家急忙拦住了。

见此光景，我们的心，一下子就软了。搭桌戏是演员遇到天灾人祸时同行们尽义务帮助唱戏，是演员穷途末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们这些演员大都是一师之徒的师兄弟，怎能到此刻撒手不管呢？

王慎之也作揖哀求：“有补哥几个的那天，有补哥儿几个的那天！忍了吧！忍了吧！大家求个平安！”

异乡的孤客，别无他路，大家只得强压怒火乖乖地白演六场戏。

戏，总算演完了，盛藻哥、陈丽芳先行一天赴沈，给当地有权势的人物去送礼、拜望。晚间，经理前来送行。他若无其事地给我们道辛苦：“辛苦，辛苦，大家辛苦！我们剧场的弟兄们，让我向大家致意，有劳各位的关照……”我们一肚子的火气，哪里听得进他的这套。没人去搭理他，只有王慎之和盛荫与他搭讪。

晚间，他们走后，我们无事早休息，睡得正浓时，“砰！砰！砰！”，“老三开门，老三！”我被敲门和喊叫声惊醒，迅速下床打开房门。盛藻哥用手绢捂着脸，扑进房门，趴在床上痛哭，陈丽芳跌坐在对面床上，浑身打颤，面无血色。盛荫双手抱头伏在桌上，一语不发。

“你们这是怎么啦？为什么没上火车呀？”

“出什么事啦？快说！”大家被搞得莫名其妙，预感到祸事的降临，急急地追问。

原来，他们刚走到车站入口处检票，就见几个军警向他们走来。

“谁叫李盛藻？”

盛藻哥见他们一个个横眉立目，气势汹汹，连忙应声“我”。

“啪！啪！啪！”军警一句话没说，走上前来，伸手就抽了盛藻哥几个嘴巴。盛藻哥被打懵了，盛荫忙过去将他扶住，质问军警：

“你们为什么打人？”

“为什么？问问你自己，你他妈的给脸不要脸！想走？没那么容易，我们哥儿们的钱也不是容易挣的？”

“戏箱子不能给你们运走，都给扣下！”说完扬长而去。

盛藻哥三人受侮而回。

盛藻还在痛哭不止。他从小天赋条件好，禀性聪明，身体又瘦弱多病，在科班里，叶春善师父对他特别另眼看待，七年时间没碰过他一手指头。此回无端地受到这样的欺侮，他怎能不失声痛哭哇？

其他几个房间的人也被惊动过来了，大家气愤填膺。我们几个青年人拍桌、跺脚，大声疾呼，怒斥军警，急着去找军警们评理算账。年龄大些的先生们，除去摇首长叹外，还要安慰盛藻、劝阻我们不能采取行动，以免事态扩大。

正在乱成一团的时候，那位经理匆匆而入。

“诸位受惊了！诸位受惊了！”他拱手在屋内转了一圈说，“事情我都听说了，怪兄弟我照顾不周，我给诸位赔礼道歉！”他

又连作了三个揖。

“他们无理打人，不能容忍，欺侮咱们官地面没人吗？哼！”说着，他满面怒气，又捋胳膊、又挽袖子。见我们无人搭言，顺手摘下头上戴的皮帽子，搔了搔头皮，又换了另外的腔调：“不会呀？戏票早就送去了，关照过啦！”停了停他又接着说：“诸位若是信得过兄弟，我就去找他们评理。诸位是我约来的，他们这样无理，以后，我还有什么脸面再去北平邀角儿呀？”他这番话，我们并未深信。但总算是句公正话。对于他肯出面与军警论理，我们颇有感激之意，期望着强龙能压地头蛇，出出这口恶气。

经理走后，我们好容易才劝盛藻哥止住哭声，让他洗洗脸。

上午十点，盛荫、慎之二人去找经理听回话。中午已过，两人才像泄了气的皮球，无精打采地回来了。大家一再催促，盛荫兄双眉紧锁，长叹一声，说：“经理说，军警们嫌戏票送得少，上司看了戏，他们没看到，因此怒打盛藻。军警们扬言不看足戏，不给赔礼，不许我们离开哈尔滨！经理替我们与军警达成协议：要我们更换新剧目，加演七场。请车站的军警和家眷看足、看够。余下戏票卖出，用这笔钱筹办酒席、礼品，赔礼道歉！”

“你们答应了吗？”我迫不及待地追问一句。

“太欺侮人了，我们哪肯答应呢？好家伙，经理马上就变了脸。他说，你们若是答应，就帮到底，你们不认可，也不强迫。不过，事情就只好管了。是直接再找军警辩理，或是另请高明出面调解，你们哥几个自己拿主意吧！”

大家虽然都很气愤，但是，也都清楚，这些家伙，依仗日本

人的势力，为非做歹，无所不为。他们打盛藻，就是威胁我们，不服嘛，他们还可以抓，可以任意给你戴个“莫须有”的罪名，置人于死地。

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只得加演了几场戏。每天，他们只付给我们饭钱。最后，我们又出钱请军警们吃了“赔礼饭”，才上了火车。

火车开动了！大家异口同声地喊出：“哎哟！我的妈呀！咱们可离开这儿啦！”

## 六十一 离虎口 幽困大连

沈阳共益舞台的半月演出，也很受欢迎，孙楼东（楼东是当地对戏院经理的称呼）点名要求我演《连环套》。我们一行人中没有武生，他特约了一名当地女武生陈麒麟，此人扮相英俊，身高威武，嗓音也很洪亮。几次说戏，我将剧中节骨眼的细致表演给她讲清楚了，演出较圆满。

王慎之等为补回哈尔滨的亏损，奔回大连的心更切了。可是，他们没考虑到两次演出间隔太近，观众对吃“回头饭”并不感兴趣。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以致陷入更狼狈的困境之中。

我们星夜兼程地从沈阳赶到大连，第一天打泡戏是四成座，并且一天天下降，至第五天，天降大雨，剧场内不足百人，被迫停演。

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发愁之际又起风波。

我们在大连居住的小旅馆，房间内比较洁净，但后窗户与对面房屋的窗户相对，中间间隔仅两米宽的一条狭窄胡同，互相可以看到对面房内的一切，稍高的说话声也都互能听到。我们的房

间与一个便衣特务的外家相对，那个女人浓妆艳抹，妖里妖气，酸声酸语的讲话声刺激神经。晚上，她们一群不三不四的人聚在一起，抽、喝、赌，整夜吵闹不休，扰得四邻不安。李宝樾心中闷气，趁那“女妖”一人在家的时候，打开窗户，朝她说了几句不太中听的话。得！这一下可捅了娄子啦！

晚上，演出后，大家正在休息，李宝樾、江世玉、高富全和管箱的童树金四个人凑在一起打麻将牌。他们又说又笑，玩得正开心，听见有人用脚踢房门，误以为是自己人开玩笑，李宝樾叫嚷着：“再踢门，看我不责打你八十军棍！”话音没落，门被踢开，闯进两个人：一个日本警察，一个便衣。四个人一句话没来得及说，就被带走了。

事情发生在夜里十二点左右，我们都在熟睡中。第二天清晨，不见他们来吃早点，以为是夜里打牌，早上贪睡。盛荫、王慎之慌慌张张来“报”，他们拍着大腿叫道：“糟了！糟了！越怕出事，事越多，他们几个昨天夜里打牌，被日本小衙门逮走了。正托李香阁去说人情。将他们保出来，需要给送去五十元钱。快，快，大家凑凑吧！”连五十元都需要凑吗？岂不知在哈尔滨分文不挣，干耗了半个月。哈、沈的包银在北平就都付了，大连不仅没挣，住店等开支还要赔钱，此时人人手里都没什么钱了。凑齐五十元，我也随着去到小衙门接人。

钱送去，人释放。

“哎哟！我的三哥呀！”世玉见了我，捂脸大哭，“昨天夜里，把我们带进小衙门，没人审也没人问，就让在屋里跪着，直到把我们接出来。膝盖疼，腿酸麻，好忍受，就是……就是不知日本人要使什么样的‘王法’，深怕明天把我们拉出去枪毙！”他



哭得更伤心了。……

这点小事，哪里能会枪毙呢？其实不然，日本军国主义将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屠杀无辜的中国同胞，有如铡草，卖国求荣的汉奸、洋奴仗势欺人，草菅人命，无法无天。稍有不慎，无妄之灾就会从天外飞来。

铁蹄下谋生，难哪！虎狼之地不可久留，我们急于返回关内，怎奈囊内一空如洗，盘费皆无了。

## 六十二 显身手 响名天津

发愁之际，文杏社听从李香阁的建议，给天津大戏院的经理人李华亭拍去电报求援，幸好他们同意接我们去天津演出，并即刻寄来路费。于是我们乘海轮赴津。

天津中国大戏院，有一座屈指可数的新型大剧场，其舞台突出旋门之外，演员声音全部射向观众席，使这个容纳二千多观众的剧场中最远的座位，也能清晰地听到从舞台上传来的声音。据李华亭讲，这是周信芳先生亲自设计的。尚先生也为此剧院慷慨资助全套戏装。其中，不仅是全新的靠、蟒，而且，有十套贵重的翎子、狐狸尾。为了感谢他们的援助，休息室内挂着他们两帧照片，一帧是周信芳先生在《追韩信》中的剧照，一帧是尚小云先生在《相思债》一剧的剧照。像是印在玻璃上的，十分精巧。

当年，我和盛藻哥随富社去天津演出，虽给天津观众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但天津大戏院孟少臣经理认为我们这二十余人的小团体实力相对较弱，支撑不起天津大戏院的演出。为了更有把握，特从北平约来侯喜瑞、叶盛兰、孙盛武三位师兄协助演出。

第一天打泡：《群英会·借东风》。侯喜瑞饰黄盖，盛藻饰

前鲁肃后诸葛亮，叶盛兰饰周瑜，孙盛武饰蒋干，我饰曹操。

这是我出科后第一次与侯老同场演出。侯老饰演黄盖，“起霸”的工架气度磅礴，念唱充分发挥了黄润甫老前辈的特长。他运用平调、“沙”音强有力地喷口念出“二十年前摆战场，恰似猛虎赶群羊。光阴似箭催人老，不觉两鬓白如霜”四句定场诗，观众两次轰动。尤其是念末句时，用手捧起雪白的白满（胡子一种）托于双臂，身体微微几晃，将老将军的自豪和老当益壮的神情体现得恰如其份。好！好！我不由得自内心连连赞叹。不愧当代著名架子花脸。

我意识到这次与侯老同台，有如小巫见大巫，遽然产生一种少有的胆怯心理。

我穿好服装去候场，看到几个专串后台的戏腻子（指专在后台讨好演员，讲些贬低别人的言语，求欢心，借机听蹭戏的闲人。）围在侯老身旁说短道长。我从他们中间穿过，向侯老点头以示敬意。

“喝！您快瞧，他的脸谱、扮像都是郝寿臣的路子！”

听见从背后传来这些别有用意的话，我反而一扫自卑感，增强了自信心：没什么了不起，台上见吧！

观众们不太熟悉我这个小青年，但当他们听到我使用高高的六字半调，响亮地唱出“每日里饮琼浆醺醺带醉”时，热烈的掌声淹没了“醉”字的尾音。这是一句普通的、并无花腔的西皮摇板，但是一改原来架子花脸音平、低调的唱腔，揉进畅快的特点和洪亮的鼻腔共鸣音，有着比较浓郁的郝派韵味。

曹操中计，误斩蔡瑁、张允，斥责蒋干是“书呆子”、“一盆面浆”的神气与唱、做相协的表演，以及最后无可奈何的转

身、背手、叹息的动作，均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仅十几分钟的一场《回书》，就形成了全剧的高潮之一。后台也被震动，纷纷挤在上、下场门观看。就此我在天津一炮而红。

接着，《青梅煮酒论英雄》、《胭粉计》等剧目均受好评。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与侯老同演了《闹江州》一剧。

一天，星期日日场，侯老、盛兰、盛藻合演《黄鹤楼》。连日演出顺利，海报误登带三江口水战，谁也没发现。戏结束，观众不退场，无休止地鼓掌，叫嚷要看“水战”。这是张飞的重场戏，扮演张飞的侯老，“闯帐”之后，即卸脸回旅馆休息了。及至请回，他说“水战”属南派的演法，从未演过。这下可麻烦啦！观众不罢休、场上难开锣，经理团团转，奈何？奈何？

李华亭看见我也在后台看戏，抓住我去找侯老。

“干脆！您二位合演一场《闹江州》，张飞改李逵，观众一样地欢迎喽！”

侯老欣然同意。他饰李鬼，我饰李逵，侯老的演法与科班的演法无异，我们略略对了对词即粉墨登场。观众闻知欣喜之至，全场气氛极热烈，我这个小青年也跟着侯老沾了光。

十二天演出圆满结束，哥哥随盛藻回京，我被天津大戏院经理留下续演一期。我与章遏云合演了《霸王别姬》、《得意缘》、《棋盘山》等戏。我的声誉亦非当年和她去南京时可比，就是扮演《得意缘》中一个一般角色——狄龙康，都有着热烈的碰头好。

（袁菁整理）